炎黄春秋

第5期
2013年

“百年宪政”的认识误区

反思“工业学大庆”

“劳教问题的决定”出台前后

施义之谈李震之死

苏俄的新闻审查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目 录

春秋笔

1 “百年宪政”的认识误区 ……郭世佑

亲历记

6 “劳教问题的决定”出台前后 ……晏乐斌

9 反思“工业学大庆” ……毛华鹤

15 清华批斗王光美的一个细节 ……王广宇

访谈录

17 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王保春 王文耀

24 我所知道的李震之死 ……施义之 口述 陈枫 整理

一家言

29 陈水扁这面镜子 ……李洪林

31 “两类矛盾”理论在中国的实践 ……王也扬

人物志

38 卢作孚最后的日子 ……赵晓铃

往事录

45 1949年前后中美错失建交机遇 ……高 放

48 新四军生活追忆 ……郑青如

51 我的家人在大饥荒中饿死 ……时学爱

53 毛泽东批评《文艺报》“文也不足”之后 ……阎 纲

怀人篇

57 田汉对我说的心里话 ……韩 淮

59 熊十力二三事 ……阎秉华

62 我的两位吴老师 ……章 明

争鸣录

63 “林彪信稿”的本来面目 ……余汝信

文荟苑

65 我按毛泽东文艺思想创作 ……韶 华

70 《讲话》前后的延安戏剧 ……王克明

品书斋

76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硬伤 ……施滨海

81 读《苏共亡党之谜》 ……王 进

古今谈

83 古今“罪己诏” ……侯宜杰

海外事

86 苏俄的新闻审查 ……李玉贞

顾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蠡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资中筠 凌 云
展 江 徐小岩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 放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谆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 思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社长助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编 辑 吴 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黄 钟

总 经 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 行 部 孔 屏(主任)
办 公 室 王海印(主任)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 琼
秘 书 长 吴 思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8元 全年定价 96元

本期：终审 杨继绳 执行主编 黄 钟 校对 英 进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百年宪政”的认识误区

○ 郭世佑

如果说清朝最后12年乃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段之一，那么，1905年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年份之一。就在这一年，日俄战争宣告结束，君主立宪的日本打败君主专制的俄国，矢志推翻清朝的中国同盟会却在东京宣告成立，曾经亲手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授意光绪帝，一边宣布废除延续中国1300年的科举制，一边破天荒地派遣载泽等5名大臣，远航东、西两洋，专程考察外邦宪政，并于次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于1908年8月承诺以9年为限，推行君主立宪，举世瞩目的《钦定宪法大纲》也随即出台。再过3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催发辛亥革命的高潮，清朝“万世一系”的君宪计划成为泡影。及至民国奠基，易主频仍，宪法文本不断翻新，宪政之果却一再难产，至今未曾到位，知识精英的宪政呼声时隐时现，不绝于途。自晚清宪政考察团出访至今，100多年过去了，江山不可复识，宪政之梦却萦绕神州，无时或释。回首近代先贤筚路蓝缕浴血奋战的身影，难免令人感慨万千。

近年来，从媒体到学界，“百年宪政”的话题经久不衰，歧义纷呈，见仁见智在所难免。

一、“百年宪政”之说并不确切

除开网络作者不论，史学界对晚清大臣考察宪政与《钦定宪法大纲》讨论较少，法学界与思想界却谈得很多。

严格地说，“百年宪政”或“宪政百年”的提法过于简约，易伤其义而有失确切。它很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好像早在晚清时期，我国就有基于“宪法之治”的宪政了，这就容易给历史化妆，美化晚清，徒添对反清革命志士的抱怨。如果从历史的真实层面出发，顶多可以称作“宪政思潮百年”与“宪政规划百年”，“预备立宪百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晚清宪法大纲也罢，民主大旗之下的宪法也罢，都是文本而已，宪法不等于宪政，纸上得来终觉浅，行动才是最后的审判长。若以历史的真相而论，清末年间不过是“预备立宪”，并非“立宪”。姑且不说清朝的预备立宪与民国时期的临时约法、“洪宪”“党宪”等历史版本之间有何时空关联，也不论民国之后的宪政场景究竟如何，仅就宪政的本义而言，“百年宪政”云云，还无从谈起，但百年前的准备工夫倒是有据可查。

还有学者喜欢把清朝的预备立宪称作“清末宪政改革”，也不够严谨。不仅因为清末预备立宪并不等于宪政，而且不妨注意到，立宪之预备属于原创性的从无到有，还不存在改不改它的问题。与其称“宪政改革”，还不如叫“专制改革”更准确。概念的模糊不清最容易出现价值评判的偏差，掣肘学术思考的深入。

另有部分法学研究者将“宪政百年”的时间上溯到1901年，把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在狼狈逃亡途中发表“新政”上谕的时间误作预备立宪的启动时间，尤欠准确，该年毕竟未见预备立宪的影子。不过，倘若从清理预备立宪的源流着眼，以1901年作为一个重要起点倒是未尝不可，唯论据有所不同。戊戌钦犯梁启超的名文《立宪法议》就在这一年问世于东瀛，迅即传入国内。梁氏在此文中，环视地球各国的三种政体，分析各自的利弊吉凶，用通俗明了的语言说明立宪与民权之必要。他说：即使世世代代都有圣明如夏禹、商汤的君主，但国家很大，需要假手官吏；官吏却很多，而且“天下上圣少而中材多，是故勉善难而从恶易，其所以不敢为非者，有法以限之而已；其所以不敢不守法者，有人以监之而已”。至于谁来监督官吏的守法情况，梁启超的结论唯有人民：官吏所为，事关人民的切身利益，人民不会

包庇贪官；人民还不是少数，耳聪目明，官吏骗不了他们。“是故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而得之也”。

就在这篇文章里，年轻的梁启超还根据日本的立宪经验，郑重建议：

一、皇上诏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国；

二、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

三、创设立法局，草定宪法，编译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颁布天下；

四、确定行宪时间。

有趣的是，连梁启超自己也没想到，清朝稍后的预备立宪步骤竟同他这位戊戌钦犯的设计差不多，差别仅在于，梁氏说派遣三人，慈禧却派了五人；梁氏建议“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后来就大大缩短，朝廷先是不肯定期，到了1908年，迫于梁启超、杨度等人领唱的“速开国会”之声，才宣布以9年为期，在“光绪四十二年”实行立宪政治。再过两年，迫于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与资政院的竭力请求，再缩短3年，宣布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

《立宪法议》发表前后，思想活跃的梁启超还一度与孙中山协商合作，赞同暴力救国，实行民主立宪，提议以光绪帝为总统。基于种种原因，与孙合作未果，梁启超除了继续致力于宪政理论的启蒙宣传外，将主要精力转入立宪团体的组织，成为首屈一指的清末立宪运动之旗手与推手。其影响之大，声望之隆，远出乃师康有为之上。梁氏对民权学理的思考之深与著述之丰，亦明显高出勤于武器批判的孙中山等反清志士。

二、“政改亡清”之说易生误解

平心而论，慈禧太后虽然识字不多，但脑子聪明，也有魄力，作为嫔妃出身的女人，她是成功的；但作为主宰中国命运近半个世纪的早期现代化的当权者，却是糟糕的，她的胸怀还装不下偌大一个中国。这还只是清朝悲剧的一个方面。当爱新觉罗皇室在她的导演下，衰败到了清朝末世之时，已经找不出几个比慈禧更强的能人来。在她死后，无论是摄政王载沣，还是隆裕太后，都比她更糟。

当年日本天皇拿出宫廷经费的十分之一资助海军，文武百官纷纷仿效，日军以中国为假想之敌加紧备战时，慈禧却用光绪帝的生父奕譞提供的海军经费，享受颐和园的景致，还在日军横扫辽东之后，赏戏三天过她的六十大寿，这就是差别。甲午战败与《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激发全国上下的变法热忱，慈禧也不例外，但是好景不长，慈禧却把这个变法的机缘变成帝、后权力格斗的牺牲品。戊戌变法横遭镇压之日，便是守旧势力日形猖獗之时。当以反洋教、驱洋人、废洋务为目标的义和团活动在山东和直隶地区迅速展开时，年近古稀的慈禧太后得知康、梁等人得洋人庇护而迟迟不能归案，又风闻西方驻京公使要她“归政”，便默许义和团团民涌入京师，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八国联军则以保护使馆及外人安全为由，血洗京师。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开头的。当慈禧指使义和团盲目排外，为八国联军严惩中国制造借口时，满族贵族把持的皇权就开始丢失神圣的光环，人心思变就在所难免。当刘坤一、张之洞等南方督抚不顾朝廷的诏令，拒不派兵声援北方，还与西方领事协议“东南互保”时，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还找到美国代理国务卿席尔，要把惩办庚子“祸首”慈禧、载漪同惩罚中国人民区别开来。致力于武器批判的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在当时就能感觉到，1901年之后，同情支持其革命者明显增加，骂他“乱臣贼子”者却已很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慈禧太后才对随从坦白：“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不得不决心改弦更张。还等不到返京，她就借助于光绪之口，启动“新政”，先从兴实业、练新军、办学堂入手。随着“新政”的铺开，来自政体的障碍日益明显，加上日俄战争的刺激与反清革命运动的压力，慈禧才下决心把废除科举制与预备立宪提上议事日程。

清末“新政”比戊戌变法的力度更大，固然更能体现统治者的决心，但是，此时此刻的清朝却是困难重重，不改不行，改也未必有效，可谓为时已晚。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民生凋敝，国库空虚，财力难当改革之任。地方官吏为了搞新政，不断加重旧税，增设新税，遭来民怨与社会冲突，增加“新政”的阻力。

第二，“新政”不但没有整饬腐败问题，反而变本加厉，贪官污吏趁机再捞，既增添“新政”的难度，也败坏“新政”的形象。

第三，政治衰败的统治者难以驾驭和消化某些“新政”的成果，乃至种瓜得豆，朝廷对地方督抚负责编练的新军就存在失控的隐患。

蒋经国于1987年7月14日宣布解除“戒严”

更为严重的是，慈禧死后的载沣等人不仅强行镇压席卷全国的国会请愿运动，还愚不可及地抛出“皇族内阁”，羞辱那些积诚罄哀的请愿者，把他们推向反清革命的阵营。

近年来，思想界与学术界流行一种论点，认为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力量并不强大，清朝是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中翻船，在预备立宪中冒险葬身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清朝不去启动政体改革，不搞预备立宪，就不会迅速垮台。前年6月，辛亥百年纪念的国际热潮涌动之初，澳门基金会与孙中山基金会在澳门举行“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国际研讨会，有位台湾前辈的主题报告也在强调类似的论点，我在当时就直言不讳：历史的过程远比结果更复杂，历史研究切忌用结果去推导过程，过于充当事后诸葛亮，在紫禁城的光鲜外表下，清朝皇权岌岌可危，已是不刊之事实，至于预备立宪是在什么背景和压力下开始的？如果清朝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谁能保证它能继续维持下去？还有，慈禧死后的载沣等人为什么一定要把席卷全国的国会请愿运动强行镇压下去，还愚不可及地抛出“皇族内阁”，羞辱那些积诚罄哀的改革者，把他们推向反清革命的阵营中？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追问的。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个统治者不是顾及自家的存亡而轻易拨动政体改革之弦的，即便是现任的不丹国王也不例外。“政改亡清”之论，容易产生误导，徒增当今政改的阻力。

近年来，学界还时常出现辛亥革命不该搞、革命添乱的抱怨之声，把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与军阀混战的种种恶果都归咎于孙中山等人的暴力革命，沉湎于清朝预备立宪的承诺与历史想象，把“告别革命”的现实情怀提升为历史观，这些都是离开清末历史场景的主观臆想与过度演绎。既然清朝统治者拥有丧权辱国和压制人民的权力，人民自然就有奋起反抗的权利。杜亚泉等人当年就看得清楚，曾经手沾戊戌六君子之血的慈禧太后之所以放下傲慢的架子，同意派人出洋，专程考察外邦宪政，为预备立宪做准备，就是因为除了日俄战争的结局带来的舆论压力，还有中国同盟会等暴动反清的政治压力。如果没有孙中山等人坚持不懈的浴血精神，清朝会不会启动立宪准备？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能否保证清朝完好无损地维持下去，保证中国不乱，“光绪四十二年”的立宪就能包你满意，这些问题恐怕都是未知数。只要稍微查阅梁启超在清末最后三年发表的见解，就不难知道，上述脱离晚清实际的猜测要想说服孙中山的论敌梁启超，都是不大可能的。环视古今中外，任何组织起来的武装暴动从来都不是心血来潮，历史的进程也不是任何单个力量的选择所能决定。唐朝末年的黄巢起兵是如此，清朝末年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三、坎坷前行的宪政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环境在较大程度上延续于帝制覆灭之后的民主时代，民权政治的工具性诉求，民权与国权的此消彼长，加上“以党

建国”“以党治国”的苏联模式对孙中山革命实践的影响，还有蒋介石的“假党治之名，行独裁之实”的训政，在制约着民国以降的宪政之旅，蒋介石还失去过抗日战争全胜之后的宪政建国之良机，然而，民初《临时约法》所承载的“主权在民”之理念与民主立宪的新法统之框架臻于确立，历经风雨而不倒。

在海峡两岸的政、学两界与教科书中，近代民主革命先驱与三民主义理论的构建者孙中山先生几乎是唯一毫无争议的历史伟人，而三民主义理论的精华不是别的，就是民权主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既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也得益于世界政治文明遗产的滋养与世界民主潮流的启迪。即使在孙中山病逝之后，这份世界遗产亦曾坚如磐石地经受过德、意法西斯与极权主义的挑战。1940年10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著名的德吞（Dayton）演讲时就指出：“我们决心要用我们的人力和财力，去抵抗并击退这种外国的阴谋和宣传，以及地下战争的诡计，这种阴谋诡计和宣传，发端于欧洲，而现在却明显的企图进攻太平洋这边的各民主国家。那种宣传反复宣称民主主义乃是没落政治制度。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民主理想，和我们民主自由的传统，都是过去的事物了。我们绝不承认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我们是有前途的，而他们所走的方向，却是退向古埃及王国的束缚的方向，是退向中古黑暗时代的奴役的方向。”

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并非流于主义的层面，而是从制度建构入手，明确地提出了可以实际操作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并以“宪政”作为国民党人为之奋斗的执政目标与价值境界，比起康有为笼统地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阶段来，要具体得多，也实在得多。唯其如此，无论是古代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还是近世洪秀全、杨秀清的“奉天讨胡”，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比往昔以暴易暴的“汤武革命”胜出一筹。原本为乃父蒋介石的威权与光环所笼罩的蒋经国后来之所以能在海峡两岸好评如潮，就是因为他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最忠实的信徒，是胸怀宽阔的政治家。正是蒋经国当年默认异党密谋的“圆山之会”，成为台湾地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契机，才有开放党禁与政党轮替的民主实践。台湾宪政的价值并不限于台湾本身，它足以表明：中国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行民主政治，无需像香港那样“借腹生子”。另外，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的民主理念并非不可通融。

中国大陆经过近30余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人民的物质生活大大改善，国家的地位得以提升，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成就。相比之下，政治体制的改革过于迟缓，宪法所规定的许多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宪法所应限制的公权却日趋膨胀，许多党政官员用各种方式侵吞国有资产，买官受贿，拼命敛财，还垄断行业资源，与民争利，形成某些操纵市场竞争的利益集团，甚至还借土地开发等名目，强夺下层民众的宅地资源，官民冲突持续加剧。为维系秩序，应该排除干扰，力行宪法。

强力维稳体制理当回到宪法的轨道上来。唯有还政于民，用选举制取代任命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民求官而非官求民的现象，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

四、“薄王事件”蕴含丰富的宪政研究资源

还在1922年5月，由胡适起草，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就国家的政治改革提出过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飘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这三项要求简明地表达了知识精英与广大民众的期待。

2012年的薄熙来、王立军事件震动了中国与全球，它暴露了以不受制约的权力营造的地方王国之强大。窃以为，“薄王事件”的宪政研究价值

并不亚于党风党纪与刑法的研究价值。薄与王究竟是怎么步步高升的？为何随心所欲？有谁管过他们没有？凡此种种，恐怕都值得追问和反思。只有从昂贵的学费付出中提炼智慧的苦水，把宪法与法律当真，才能对得起纳税人的劳动与无辜者的伤害，还有历次宪法起草者与修改者的心血。

“重庆模式”的神话从出笼到破灭，都能让我联想起美国近代史上的那个伊斯曼（Max Eestman）。此人曾因为反对美国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两度受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明确主张美国应当提前准备与英国并肩作战，如果仅仅在经济上援助英国，那就无异于“替身作战”，还很不够，在他看来，二战乃人类历史上唯一的民主主义与极权专制之间的较量。他还经过一番研究，把德、意两国代表的极权主义归纳为20个特点：

1.狭义的家国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

2.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的政权；

3.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4.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5.“领袖”是一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同于一个神；

6.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7.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8.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9.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10.使人民限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11.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

12.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

13.政府计划的罪恶；

14.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

15.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

16.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17.不择手段的鼓励人口增加；

18.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到处滥用；

19.禁止工人罢工及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20.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制。

只要把这位美国作者70多年前对极权主义的归纳对照薄、王渲染的“重庆模式”，可知自由、民主是何等珍贵，实行宪政是何等紧迫。

毫无疑问，从反右、文革到其他冤案错案，从毛刘之争、毛林之争到薄王闹剧，重要的不是谁管谁与谁关谁，而是如何尽快落实宪法赋予的人民权利，让人民用选票来逐步管理各级有权者，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五、宪政的客观条件已基本成熟

宪政既是治国成本最低的方式，也是一个国家与国民的脸面。不同的国家固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与国情，需要采用不同的宪政模式与民主标准，不过，维护民权与限制公权则是任何宪政国家和地区不可逾越的基本原则。民主与法治乃人类共有的世界文明遗产，人类的某些惰性只有通过法治来限制，别无他法。

时常有人说，人民的民主素质还不高，如果突然推行民主制，只会带来社会动荡。此论乍看起来很有道理，实则经不起推敲，至少还需回答以下疑点：

一、怎样提高人民的民主素质？是靠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来提高，还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步提高？

二、64年来，各级党政机关究竟为提高人民的民主素质做过哪些实事？提高了多少？时常鼓动民众对自己唱颂歌，这并非只是薄熙来的个人行为，它究竟是在提高人民的民主素质，还是相反？

三、人民的民主素质不高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既然许多地方的村民都可以参加村委会的选举，那么，大城市的市长与重点院校的校长为何就不能通过选举产生？

较之晚清时期，今天的国情却已大不相同，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远不如清朝末年那么大。

首先，清朝是一个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皇朝，它以防范占全国人口多数的汉族作为基本国策，满汉矛盾不仅始终存在，而且随着晚清的衰

“劳教问题的决定”出台前后

○ 晏乐斌

【编者按：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明确提出，“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处理办法之一就是“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各省市应即自行筹备，分别建立这种劳动教养的场所。全国性的劳动教养的场所，由内务部、公安部立即筹备设立”。随后，云南、四川等地创建了中国首批劳教场所。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各省、市均应立即着手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均应立即着手筹备试办一个相当规模的劳动教养机构”。随后各省市相继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比如，湖南省于1956年2月组建湖南省陶家湾劳动教养所，开始收容、管教第一批劳动教养人员。1957年7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并提出“搞个劳动教养条例”。同年8月3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本文作者参与了该决定的起草工作。】

1954年11月至1957年12月，1980年6月至1983年3月，我先后在公安部劳改局八处、公安部劳教局工作，两次经管过劳教工作。1954年11月至1957年7月，劳改局没有设立过劳教工作机构，当时的劳改局八处主要掌管刑满留场就业人员的管理教育、生活卫生、福利待遇等方面的

败与丧权辱国的加剧，反而日益突出，满汉之间互相猜忌，互不信任，满人担心改革会把权力改到汉人那里去，汉人则把满人当作“外国人”（孙中山语），总觉得它没有改革的诚意，不怀好心，只能推翻。今天的中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其次，自湘军问世以降，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开始削弱，新军时期尤其是如此，今天的中国却是党军一体，并不存在此类后顾之忧。

第三，晚清时期国库空虚，负债累累，新政的经费投入有限，时常捉襟见肘，今天的中国却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已有明显改善，人心思稳，而不是人心思反。

第四，教育普及、交通发达的程度已大大超过晚清时期，并不容易把宪法之治变成暴民之治。即便是生活在闽北浙南崇山峻岭的畲族人民，也是村村连公路，通邮政，还有电讯与网络互相联通，可以说，全国范围内已基本没有信息的死角。这给宪政的实施提供了便利。

不仅同清朝末年相比，宪政之施已不存在那么大的政治风险，即使同孙中山、袁世凯与蒋介石主政的时代相比，既无列强侵凌之外患，亦无军阀混战之内忧，尽可励精图治，稳步前行。如果同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时代相比，亦当大增宪政之信心。比如，毛泽东时代的信息相对闭塞，冷战环境亦不允许从容思考，胜利者的自信容易根据并不对称的信息与战争思维，产生错误的判断，政治运动越动越乱。过去的政治失误可为后人的成熟张本，改革开放30余年的物质财富已为原本脆弱的国力奠基，大学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知识的社会化与全球信息的普及化，均乃提升国民素质的有效资源，今非昔比。

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说：“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的人是那些努力寻找他们想要机会的人。如果找不到机会，他们就去创造机会。”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机遇与挑战，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担当与成功。■

（作者为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业务。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之后，劳改局八处就增加了劳动教养工作业务。在这之前，公安部和公安部劳改局没有设立过劳动教养工作机构，也没有开展过这类业务。

1957年7月，公安部与内务部共同商讨、研究，“为了将游手好闲，违法乱纪，不务正业，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就收容劳动教养问题”，在公安部北京西单西拴马桩招待所召开了劳动教养问题的全国会议。开始，公安部副部长周兴、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参加了会议，公安部劳改局八处处长何一零和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会议。会上，周、陈两位副部长传达了上面有关指示，并都在会上讲了话，还播放了刘少奇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为什么要搞劳动教养”的录音讲话。录音讲话中就收容劳动教养的范围提出了一些规定。会议开了6天。会后，就收容劳动教养问题，两部联署向国务院作了报告，我参加了两部向国务院报告的起草工作，并同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的一位同志共同参与《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不久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通过审议，以国务院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提出了申请。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对下列几种人收容劳动教养：

一、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犯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二、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三、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能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四、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的、转业安置的、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在这个《决定》出台之后，公安部将劳动教养的管理工作分在劳改局的八处，该处既负责对刑满留场就业人员的管理教育等工作，又负责劳动教养场所的设置和对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教育、生活福利待遇等方面工作，以及有关对劳教人员管理、教育方面方针政策的制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公安、民政部门成立省、自治区、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到了1959年各地增加了劳动、财政部门参加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工作。

劳动教养的性质，该《决定》明确地说：“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行政强制性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这一“强制措施”直接决定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命运：

一、1955年4月至1956年，第二次全国开展的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内部清理运动中尚未处理的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内部不适当，也无适当办法处理他们，就将他们送劳动教养；

二、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全国划定右派中一部分送劳动教养场所；

三、按照《决定》规定的四项劳动教养收容范围，以及随后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公安机关破获的反革命案件、各种刑事案件中，不够追究刑事责任，放回社会不放心，怀疑对社会有危害的人，自1957年8月至1983年的二十五六年里，收容劳动教养的人，不少于500万。

四、1983年8月至1987年1月，全国开展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三次严打战役中，对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而收容劳动教养的，不少于100万人。

按照该《决定》，对“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或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但在实际执行中，民政部门只是挂了一个名，实由公安机关作出劳动教养的决定，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劳动场所的管理，场所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看守武装的调配，经费开支等等，全由公安机关一家负责。对于“在劳动教养期间表现不好或有破坏活动的延长一至二年”的规定，实际执行中有延长二至三年的，其延长的批准权限，也是公安机关。

有这么几个例子。1982年12月，我与同事

罗思阳同志，跟随公安部副部长惠平到贵州省考察、调查劳改劳教工作。我与罗二人在贵州清镇县中坝劳改劳教农场工作了30多天，该场向我反映了一个姓陈的女劳教人员的情况。她原是贵阳市二中高中三年级学生，因与同班的一个男生多次发生性关系被学校开除，送贵阳市公安局劳动教养三年，1968年进入该场劳教，又与男劳教人员多次发生两性关系，被两次延长劳教各三年，加起来长达9年。到1977年解除劳教，又被“留场就业”，我们到该场考察调查时，她已30多岁了，还是个单身。我调阅了她的档案，并找她谈了话，问她为什么屡教不改，难道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开始，她默不作声，脸无羞色，抱无所谓态度。最后她说：“身体需要才这样。”我认为对这样的女性，不能采取如此强硬措施对待，是不是应从她的身体病态去考虑和给予身体治疗？对她劳动教养长达9年，最后还留在该场“就业”下去，这不太残酷了吗？

1981年8月、9月，我同公安部劳教局的关树青处长和王爱民同志三人到黑龙江省考察劳教工作，在佳木斯市的集贤县劳教所考察期间，该场向我们反映一个姓叶的女劳教人员，说对她处理重了，多次申诉，无人过问。我调阅了她的档案，并找她谈了话。她原是集贤县城关镇一个街道办工厂的职工，因与一男职工通奸，被人发现。另一次与另一男职工通奸，又被发现，被工厂开除，因作风不好送集贤县公安局劳动教养三年。事后我向该所建议，请他们为她代为申诉。结果如何不清楚。

9月间，我们三人最后来到哈尔滨市公安局设在松花江边的市办劳教所，该所向我们反映一个姓王的劳教人员的情况。我详细看了这个人的劳教档案，他原是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一名无业人员，因他人拉拢参与了盗窃一家工厂的零部件，在哈尔滨市公安机关侦破之后被刑事拘留，该局在送市检察院起诉时，因是从犯，又未分得赃款赃物，检察院不予向法院起诉，可是公安局认为他是惯犯。但说他是惯犯，案卷里却没有具体犯罪事实，最后送他劳动教养三年。在劳教期间他多次申诉冤枉，后又以“无理取闹”罪名，决定延长劳动教养二年。我们离开后，后来听说此人告到检察院和法院，为其作了纠正处理。

有一个时期，劳动教养机关的设置随意性很大。按照《决定》第五条的规定，“劳动教养机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建立劳动教养机关的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可是在实际执行中，自1958年狠抓阶级斗争以来，全国多数省、自治区一度将劳动教养机关扩充到地市一级，有的省还下放到县一级，有的县设立有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将那些所谓“大法不犯，小法不断”，或“群众认为是坏人的人”也送劳动教养，以致不经县政府批准或是“政府委托的部门批准”，县以下的公社，也非法办起了劳动教养队。据我姓孙的同事提供的数据，公安部办公厅1958年底对全国14个省不完全统计，这种非法的公社办劳教队，共强制收容了300多万人。

时至今日，这种违背法治原则的劳教制度，应该彻底地废除了。■

（作者为公安部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黄　钟）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　　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反思“工业学大庆”

○ 毛华鹤

“工业学大庆”是怎样兴起的

大庆会战进行到1963年下半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虽然在石油行业内部早已轰轰烈烈，但在其他行业仍鲜为人知。会战指挥部对外称“萨尔图农垦总场”，下属单位称“农垦分场”。曾发生过有的职工冬季穿“杠杠”棉工作服回家探亲，走出火车站即被警察误以“劳改逃犯”拘留的故事，就是当时的生动反映。

1963年10月下旬，国家经委和东北局经委在大庆召开“东北地区基层工业企业经验交流座谈会”，这是事先派工作组到现场调查后做出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有东北地区大型国营企业的厂长，国家经委、东北局经委的专家与负责人，共100多人。会议由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谷牧、东北局经委主任顾卓新主持。

按照会议的安排，会议代表先轮流参观了20个基层单位，包括钻井队、采油队、施工现场、集油站、家属缝补厂以及“地宫”、油库、新建的炼油厂等等。然后，由副总指挥兼生产办公室主任张文彬汇报“三年石油会战进展情况”、副总指挥陈李中汇报“油田地面建设，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情况”、会战指挥部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宋振明汇报“坚持基层岗位责任制情况”以及副书记吴星峰汇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情况”。通过这些参观考察与听取情况汇报，与会代表反响热烈。大家称赞大庆石油会战是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项创举，赞扬大庆工人艰苦奋斗精神，以及在科研工作、生产管理上取得的成就与经验。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余秋里从北京赶来作了一个简短发言，反复强调大庆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

这个座谈会的情况很快传到北京。国家经委决定宣扬大庆事迹与经验，指定康世恩作报告。康世恩带着我进北京帮他撰写与整理这个报告。1963年11月6日，康世恩在国家经委召开的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上作了这个报告，反响也很热烈。接着，11月19日，余秋里以康的报告为底本，略加增删，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汇报。12月，石油部党组正式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汇报提纲”。12月24日、28日由彭真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先后由康世恩、余秋里向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领导干部数万人又作了汇报。

1963年12月25日，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1964年2月5日，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肯定了大庆的经验。从此学大庆的热潮在全国展开。据说，毛泽东听了大庆会战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说政治局的同志都到大庆去看看。后来除他本人和林彪没去大庆外，其余的政治局成员和当时党政军界的头面人物都视察与访问过大庆。有的还不止一次。周恩来就曾去过三次。文化大革命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视察过大庆。根据原石油部副部长、原大庆油田党委书记陈烈民在本世纪初回忆：“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号召后，全国共有125万多人次到大庆访问。”我记得从1964年到1966年文革前，到大庆的参观访问者每天都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大庆油田临时建设了两个巨大的接待站。组织数百人的接待班子，好吃好住免费招待川流不息的参访者。

“鞍钢宪法”与大庆经验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做了评价。他指出：“这个油田的建设，

厂），它们都是建国初期苏联援建的。它们的管理都是照搬苏联的一套。我们的石油生产虽然搞上去了，但我们的这套办法跟苏联的不一样，会不会得到与会老大哥认同着实心中无底。当他听到赞扬时也兴奋异常，还谦虚地说：其实，我们的这一套无非是老老实实地按照“鞍钢宪法”办事而已。

何谓“鞍钢宪法”？它是1960年3月毛泽东对“鞍山钢铁公司”一份调查报告的批示。这份调查报告是中共元老、工运领袖李立三在鞍钢蹲点调查后写的。毛的批示指出办好企业有五条要求：政治挂帅，党的领导，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这五条即“鞍钢宪法”成为当时和此后几十年办好中国工业企业的根本大法。

那么，大庆主要经验是什么呢？它全都写在1963年11月6日康世恩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作的报告里。我至今仍大致记得，这个报告共写了九条经验：（一）革命精神，（二）科学态度，（三）群众运动，（四）“三基”工作（基础工作[质量、设备]、基本功、基层岗位责任制），（五）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六）严细作风，（七）思想政治工作，（八）机关革命化，（九）全面关心职工生活。这九条经验，有六条是讲政治讲革命化的。讲技术讲管理讲生活的只有三条，而这三条也多是从政治角度讲的。

拿“鞍钢宪法”（五条）与“大庆经验”（九条）比较，何其相似乃尔。不用细说，“大庆经验”简直就是“鞍钢宪法”的亲生嫡传与具体化。

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回头路

世界工业企业管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管理、科学管理、现代管理。第一阶段传统管理始于18世纪下半叶手工业工场时期到19世纪末。所谓“传统”就是小生产者传统，其标准就是凭经验，师带徒。第二阶段科学管理，始于19

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两论起家’。”“这个油田也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这个油田自始至终坚持了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革命精神和勘探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

至今，我仍觉得周恩来对大庆的这个评价，反映了当时的实际。1960年4月，大庆会战刚开始，余秋里确实指示主管政治工作的吴星峰以石油部机关党委名义起草一份《关于学习毛泽东所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登在油田小报《战报》创刊号上，并指示石油部购置了几百本“两论”单行本，空运到哈尔滨再送到油田供职工学习。

如上所述，1963年10月在大庆召开的“东北地区企业座谈会”是“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发端。康世恩和会战工委极为重视。当时没有招待所，他们搬出自己住的办公室（兼卧室）（也是干打垒，只是稍微高大宽敞些）而住进更加低矮潮湿“菜窖”式的干打垒里。我作为油田的唯一联络员，参加会议秘书组活动。我的任务就是每晚8点至10点，参加秘书组召集的汇报会，收集会议代表参访后的反映。大约在晚11点以后，再赶往康世恩住的干打垒办公室，他和他的同事们急切地听我汇报。在这种汇报会上，康不止一次地讲：参加这个会的都是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龙头老大”工业企业（鞍钢、一汽、哈尔滨三大动力

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工业化进程加快,机器代替手工操作,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由美国工程师泰罗提出了“科学管理”即“泰罗制”。他通过对时间的研究,制定了劳动定额与工时定额;通过对作业的研究,提出了作业指导卡片制;通过对单纯计件工资研究,提出了奖励工资制;通过对企业组织结构研究,提出了建立职能机构,即车间科室制。列宁说:“泰罗制”包含有“最丰富的科学成就”。第三阶段现代管理,那是20世纪70年代广泛运用电子计算机以后的事了。

陶潜说:“觉今是而昨非。”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鞍钢宪法”“大庆经验”与苏联做法、东北企业那一套,谁比较符合“科学管理”即“泰罗制”?谁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走了回头路?

大庆为体现党的领导,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对应苏联的一长制,即厂长负责制。

大庆为体现政治挂帅,批判物质刺激,少算经济账,取消计件工资,对应苏联的讲究经济效益,实行经济核算,按劳付酬。

大庆凡事都大搞群众运动,大轰大嗡,视规章制度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会战初期,甚至技术革新技术革命(1960年有股“超声波热”),也搞成“双革”运动。由党委成立“双革办公室”组织领导,对应苏联的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坚持正规的规章制度。

大庆按解放军编制组建会战队伍和运作各项工作。局、处两级在党委集体领导下,设生产办公室(类似军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处),基层单位设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这方面也被毛泽东肯定与表扬,对应苏联援建的东北大型企业的车间科室制。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邓颖超曾兼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她得知工厂设政治部,工会还隶属政治部领导时,很惊讶,认为很不合适。

德国人布莱希特说:“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孩子。”撇开当时的形势背景,超越意识形态的纷扰,历史已证明,大庆油田按照“鞍钢宪法”创造的经营管理经验是走了回头路。

小村镇模式的矿区建设值得商榷

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康世恩传》里引用了康世恩说的一段话:“毛主席听了大庆汇报后曾说:大庆的搞法就是打破了过去的一些框框。”上一节记述的是大庆在经营管理方面以“鞍钢宪法”为蓝本,打破了苏联倡导的一些框框。本节记述的是大庆在矿区建设上又如何打破过去的一些“框框”的。这里先说两个背景:

其一,石油部在矿区建设上有两个旧“框框”:它们是50年代苏联规划设计的新疆独山子油矿和甘肃兰州炼油厂。这两个工厂的建设都是生产区、办公区和生活区相距较远。生活区与办公区基本上在市区。而生产区与矿场基本上在市郊。当时,余秋里、康世恩认为,这种布局脱离生产,脱离群众,是苏联修正主义在矿区建设上的表现。

其二,大庆会战正值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几万名职工肚子饿是余秋里、康世恩面临的首要问题。在黑龙江省支持下,划拨几万亩荒地,抽调部分职工和组织职工家属开荒种地。这一举措收到了奇效,后被周恩来总结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新型矿区建设的典范。现在看来,这种模式的矿区建设在彼时彼地的客观条件下,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办法。但如果把它作为工业企业现代化的样板,就值得商榷了。

基于以上背景,余秋里、康世恩就在“企业机关革命化”“指挥靠前再靠前”号召下,会战总部不仅不设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连安达县城、萨尔图镇都不考虑,硬是要建在油井旁边。所有二级单位离总部少则三五公里,多则几十公里上百公里。二级(处)所属大队、生产队也都分散建在自己管辖的集油站或油井旁。在几千平方公里的油田范围内,星罗棋布地小而全地建成配套的生产生活、教育娱乐以及医疗服务等设施,形成了大庆市(局)、镇(处)、村(生产队)的格局,活脱脱地是个“乡村小农经济城镇”的翻版。

事隔50年后来考量,如果他们具有前瞻性思维,如果他们略微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现代化意识,他们把会战总部设在相距不远的东边的哈尔滨市或西边的齐齐哈尔市,那对这两个市的市政建设与发展,对油田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对几十万职工与家眷,该是多么大的福音。而为此节约的投资将以亿万计,效益将大得无法评估。

作者1961年时的“粮票本”

还令人感叹的是，新世纪以降，大庆地区连绵的楼宇群、纵横的公路网和不息的汽车流，勃然兴起，蚕食着碧绿草原，且已不可逆转。这为当初始料不及。如是述评，岂是苛责前人，谨为寄语后来者，应特别关注草原的生态环境！

童言无忌：“我长大了要当二号院小食堂的炊事员”

现场实景闪回之一：1961年隆冬时节，我们办公室的几个同事在一房间内聊天。一位科长的男孩，当时八九岁，有人问：你长大后干什么？他不假思索地答：我长大了要当二号院小食堂的炊事员。二号院是会战总部头头脑脑的办公室兼住宿处。二号院的小食堂就在我们住房窗前十几米。它有条下水道直通户外的“泔水坑”。这个坑经常有剩残的鱼肉，因为是冬天，流出不久就冻成一层白花花的猪油——这在当时肉食极度匮乏情况下，是极其珍贵的。难怪不谙世事的孩子羡慕无比哩。

在大庆，从1960年开始在局、处二级机关就办有小食堂。二号院的小食堂，供总部机关十几位局长和三四十位处长用餐。大食堂长年累月只供包米面、高粱米。每人每月定量二十几斤，每天只有8两。一个二两包米面“窝窝头”一多半是大白菜帮子，一两小米稀饭稀到能照出人影。常年没有肉腥。但小食堂全是细粮，精米白面，大鱼大肉不断，每餐做出五六种花样。当时会战队伍从西北来的多，因此，隔三差五地有“凉皮”“活饹”“羊肉泡”“手抓肉”。而且是交够粮票尽饱吃。饭钱也只有实价的四、五分之一。我有幸在4年时间里，混进去吃了两次。一次是1961年冬天帮一位副总指挥写发言稿到下午一点了。大食堂早已关门。他带我到小食堂叫大师傅为我做了一碗“羊肉泡”，吃得我满颊生津，回味无穷。另一次是在1962年上半年一个什么节日，康世恩招待一些头头和专家，办了三桌。我因是会议记录，也捎带上了。喝的白酒，烤羊肉串尽饱吃。因为这两样西北“美食”我这个“湘蛮子”都是头一次尝到，所以至今记得。据传，处、局两级开办“小食堂”，是从解放军学来的。战时及建国初期，军队确实办有小食堂，但它有严格的管理。而大庆的小食堂却疏于管理，把它办成招待食堂，造成多吃多占严重。在一般群众生活极端困苦情势下，形成强烈反差。

饹

现场实景闪回之二：大庆会战期间，局、处两级配秘书成为定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整个石油工业系统。不仅如此，在二号院办公与居住的从石油部来参加会战的三五名司长，不仅配有专职秘书，有的还配有通信员和女服务员。

现场实景闪回之三：二号院没日没夜地召开各种业务会、汇报会，名目繁多。一月之内，有近二十天都在开会，而且这种会议很少在半夜12点以前散过。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只有陪着。而首长们散会后可以先到小食堂吃“夜宵”，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九十点。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只有饿着肚子上床，第二天早晨八点按时上班。更有甚者，余秋里、康世恩还擅自规定，全油田只休息“大礼拜”即每月逢十休息一天。这个规定一直沿用到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并作为石油工人艰苦奋斗的事迹广为宣传。他们不体察现场的石油工人拖家带口的苦衷，连百姓每七天休息一天的权利都剥夺了，实在不近人情。

现场实景闪回之四：会战的头两年，二号院每10天大都在大会议室举办盛大的交谊舞会。据说是从中南海学来的。调来文工团的乐队和一帮年轻貌美的女文工团员。凡处以上干部可以带舞伴前往。一般民众没有份。每次舞会都门卫森严，而机关总有些年轻人趋之若鹜，往往在大门口挤成一团。说实在话，当年现场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最多的是在大饭堂（夏天在室外野地）演场免费电影。那么多年轻人无处消遣。

举办这种舞会，唐克、吴星峰在现场时办得最多，因为他俩喜欢。余秋里会战开始后没在现场呆几天。康世恩常年呆在现场而且一呆几年。他在现场时少有舞会，因为他不喜欢。这种舞会我一次都没去过，因为我不够格。主要的还是我不会而且有些厌恶，原因是音响太闹腾，害得住在附近的我久久不能入睡。

以上种种，显示出1960－1963年大庆处以上领导干部生活的特殊化。

夸大业绩与经验遭非议

其一，大庆的油田面积与石油储量的计算。因石油深藏几千米的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通过一些间接手段获取资料，按一定的公式，分析测算。而地下的数据资料是动态的，既定公式随着科技进步也是动态的。用这些在较短时间内获得的资料就公布大庆油田面积、石油储量是世界上第几大油田等等，并大胆宣布：大庆油田的面积与储量计算只用了一年半时间，而美国某油田用了九年，苏联某油田用了三年。外行人听了惊喜不已。而内行人却说，一个像大庆这样的特大型油气田的面积与储量计算，不是头两年可以完成的。准确的计算可能持续它开采的全过程，用几十年时间也不为过。何况那两个美苏油田的储量是多年前的历史资料，拿它作“标的物”来对比，显然很不合适。

其二，1960年开辟30平方公里生产实验区的问题。当年在几百平方公里面积的萨尔图油田的中心部位，划出30平方公里进行开发。这引起了许多学者专家的反对。他们说，这像在一块很高级的西服面料中间剪出一块做了条裤衩，可惜得很。话虽说得尖刻一些，但其本意是：油田开发应在油田勘探基本完成后，按完整的开发建设方案，有序展开，这样才可以取得最佳效果。余、康却打出毛泽东“一切经过试验”旗号，费尽口舌与文字来证明这个举措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先进性，把它说成是大庆的一项创造。当时有个背景，即西北几个老油田原油产量上不去，全国年度原油生产计划没法完成。这是关乎政绩的大事，在逮到大庆这块“大肥肉”后，尽管开采条件不具备，也饥不择食，先拿一块打井放油。当时因来不及建设集输储设施，这个实验区遍布大小土油池，放满了黑色原油，污染了草原不说，还造成了巨大浪费。1960年大庆生产原油97万吨，保证石油部完成全年计划，向国务院报了捷。现在评论，我觉得这样搞也可以，但大可不必把它说成是个“创造”。

其三，还有“基层岗位责任制”，也被宣传为大庆的一项主要经验。现在冷静分析，它无非是针对1961年一座注水站火灾引发出来的紊乱局面的一次全面整顿。谈不上什么“创造”，只是明确岗位，分清责任，建立制度而已。吹过了难免质疑声不断。据称，张春桥就私下说过：大庆的岗位责任制不是新鲜玩意儿，《红楼梦》大观园里的丫头们就有岗位责任制。此话有理。不能因人废言。

其四，关于培养石油队伍“严细作风”。这也是大庆的一项主要经验。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1964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石油厂矿长会议上，余秋里作报告，讲到培养队伍作风时，要“严”字当头。他用排比句式，一口气讲了“十五个严字”：“严，可以出干劲；严，可以出责任心；严，可以出战斗力；严，可以出规格；严，可以出高标准；严，可以出好风气；严，可以出好产品；严，可以出技术；严，可以出办法；严，可以使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市场；严，可以把歪风邪气打倒；严，可以避免犯错误；严，可以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严，可以保证行动上一致；严，可以保证团结。”当场就觉得“言”过其实，遭人非议。

现在冷静评论，客观上我们闭关锁国太久，国外情况匮乏，信息不灵，“坐井观天”。从1958年“大跃进”“超英赶美”以来，社会舆论说大话、“放卫星”成风。从主观上讲，余秋里、康世恩确有头脑过热的问题。人们常说，所谓权力，既包括行政权力，也包括“话语权”，即掌握舆论与宣传的“权力”。自觉而有节制地使用“话语权”，不仅需要意志力，更是一种美德。

绝非大庆经验的题外话

第一，大庆经验有显著的时代特征。1959年后，国内“造神”运动越演越烈。在若干则大庆经验中，“大庆靠‘两论’起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

大庆取得成绩的根本源泉”成为首则与经典。这条无需检验也无从检验的经验，其作用只有一个，即借大庆的成功来赞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不是大庆的独创，而是当时风气使然，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官场“奏折”的遗风。另者，当时中苏严重对立，国内开展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批判在大庆经验中也有反映。据此，我认为：大庆经验的是与非、对与错、功与过，都属于那个时代。苛责前人，没有意义。

第二，大庆石油会战的实际领导人是康世恩。我跟随康世恩近三十年，对他有深入的观察与了解。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地质系，以后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1949年9月受彭德怀将军指派到当时中国最大油田——玉门油矿担任军事总代表，从此走上了石油工业的领导岗位。1960年他担任大庆会战的总指挥，吃住在现场四年，指挥这场会战，乃至亲自总结出大庆经验。1965年升任石油部部长，全面领导石油工业持续前进，直到1982年。他懂石油地质，懂石油厂矿，懂石油队伍。

第三，经反复思量与鉴别，我觉得“大庆经验”说一千道一万，说到底就两条：一条是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大庆经验”中已有充分表述。另一条或许更为重要，那就是中国几代地质工作者的科学探索。若按行政单位区分，这当中有地质部、石油部、中国科学院、煤炭部以及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还有很久以前的日本、美国的一些同行们。尤其是1955-1959年地质部的专家们，在松辽盆地的艰苦细致工作。而这一条在“大庆经验”中表达的很不够。

1966年初，在北京举办的“大庆展览”（我参加筹备，是主编之一），红极一时。在有几百个延长米的展板中，只在前厅序言部分有一块展板（最宽仅一米）有一幅地质部的照片，底下说明词是“发现大庆油田，地质部也做了许多前期工作”。在上百本参观者的“留言簿”里，有知情者批评这个展览少提地质部实在不公道。这件事儿康世恩应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个展览的提纲是他反复斟酌审查过的。

第四，再说说大庆经验的“小姑娘”现象。我的亲身体验是：从1963年底总结出大庆九条经验以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开卷语永远不变，其他的提法则随着形势改变而改变。比如：文革期间，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批刘的“你们搞石油的就是要处理好人、技术、石头三者关系”修正主义，大批邓小平的“猫论”。1970年林彪摔死后，又是大批林彪、陈伯达政治骗子。当时大庆刚复职的一把手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句“咱们大庆再也糊弄不了了”。康世恩大为赞赏，屡次叮嘱我一定要把这句话写进大庆（1974年的）总结里。至于1976年后，捧、批的对象又变了。由此看来，我的感慨是，诚如有人说的：历史犹如一个温顺听话的小姑娘，随你怎么打扮都可以。大庆经验也是如此。

第五，文革期间大庆成了一根“棍子”。1967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有5000人参加的石油职工大会上公开宣布“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1969年又说：“康世恩（到江汉油田）是毛主席点的名。”此后在石油系统内部，特别是文革后期，大庆成了“两派斗争”其中一派的一根“棍子”。凡批大庆、打倒余、康的人，都被说成“反大庆红旗”而受到责难。

我亲眼所见，1967年在石油部机关一次“薄一波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批判薄一波说过的两句话。一句是1960年冬天，薄一波在大庆油库火灾现场批评“大会战是大混战”。另一句是1964年“工业学大庆”高潮，薄调侃大庆得到毛的表扬是“三千宠爱在一身”。造反派上纲上线说这是“反毛主席”“反大庆红旗”言论。可怜薄一波站在那儿，低头无语，尴尬无比。在大庆比较突出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张洪池”，文革前与王铁人齐名，他也有本《日记》人称“大庆活雷锋”。文革中，受军管会支持，张成为大庆首届革委会副主任。在军管会撤离、原当权者复职后，张洪池成为“反大庆分子”而销声匿迹。

把大庆当成“棍子”，这不能不说又是大庆的另一种悲哀。当时我也赞同这种做法，因而现在也有一份愧疚。■

（作者为原石油工业部情报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清华批斗王光美的一个细节

○ 王广宇

读到《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蒯大富口述、米鹤都整理的《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很高兴，我觉得蒯大富讲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通过这篇文章，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清华文革的很多不知道的情况，我感谢口述人和整理者。但文章最后谈到“二次批斗王光美”，文字很简略，不到1000字，很多情况没谈到——蒯大富可能不知道。我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作为一个见证人，当对这次侮辱性批斗王光美的内情做些披露，以恢复历史的真相和本来面貌。

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于1963年夏天第一次陪同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几国，这作为国家外事活动，是很正常的。出国要路过上海，在一次舞会上，王光美见到毛主席，问他给在上海的江青带不带信。毛主席托她给江青带去一封信。在上海江青几次约见王光美，除了谈文艺界的这种或那种情况外，还就她出国着装提出建议。王光美没有接受江青的意见，出国访问时还是按自己的意愿和国际礼仪变换服装。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对此，江青是十分不满的。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呼风唤雨，对她过去的“仇人”或不满的人一一实行报复，王光美的遭遇就是江青报复的一例。

1967年4月初，我对清华大学策划批斗王光美等人的大会，事前毫无所知。就在这个会召开前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11楼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王力和关锋回到16楼办事组住地，他们把我叫到小会议室，向我布置一项紧急任务，并要我立即执行——而这时已经是午夜了。

关锋向我交代说：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什么木制的一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貌！你去传达这个意见，尽量说服他们不要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对王力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井冈山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我说，你马上就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

关锋急如星火，叫我马上去清华，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了。我只能照办，立即要车去了清华。深夜的清华大学校园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学生都在宿舍熟睡，去哪儿找小潘？我又不知道宿舍在何处？为难时正好发现了一间亮着灯的屋子，找到几个学生，让他们把我带到井冈山总部办公室，又由办公室值班的同学到女生宿舍找来了小潘，我告诉她有紧急事对她讲。小潘把我带到另一个小办公室，我原原本本地向她传达了关锋的话，但我没说关锋的名字，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小潘认识我，知道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她一再向我解释：我们总部并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木制的项链，我们是把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我再三叮嘱她，向总部勤务组提出让王光美穿出国服装问题，千万不要说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小潘表示一定照办，并答应保密。

第二天上午，小潘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井冈山兵团总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我去问关锋，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周总理批准才能取，他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

就在当天晚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接见某省两派代表。会前，周总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经先到，在安徽厅旁边的休息室等候开会。事先我与小潘约好，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周总理。小潘按时到后，我叫办事组会务组的周占凯把小潘带到休息厅。

小潘到休息室找到周总理，提出要在清华大学开的批斗会上给王光美穿出国的服装和配饰，当然也说了几条理由，如群众的要求，不算武斗，还“她本来面貌”之类。周总理开始时不赞成这么做，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她参加批斗会不好。小潘一再申明这是群众的“要求”，坚持要给王光美穿出国的衣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要求”，周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国时穿的衣服和行头。周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

江青的这一手十分阴险，把她的报复行动经过周总理同意合法化了。江青对她自己的小儿科把戏很得意，开批斗会那天一大早她的女儿萧力（李讷）就出现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等人的新闻纪录片。同时，在批斗会那天江青还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看看。我们办事组只好派车把她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等四五个人送到清华去看热闹。我随着江青工作人员一起去了清华，也想看看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落实的情况。当我们到达清华时，批斗大会已经开始，30多万人的会场我们这些人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后边的空场，看了一会。果然王光美出场时两个红卫兵扭着王光美的双臂，穿着紧身的旗袍，戴着洋草帽，挂着乒乓球制作的项链，并强迫她做“喷气式”接受群众批斗。

关锋叫我找小潘传达这个“主意”时，没有提到江青，只强调说：“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但我推测这是江青的主意，大概不会错，理由是：

一、王力、关锋是从江青那里回来后马上向我交代任务的，而且急如星火，不能隔夜，要连夜办妥。

二、据我的观察和了解，以王力、关锋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地位，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干这种事，因为这是对国家主席夫人采取丑化和侮辱行动；如果顶头上司江青或陈伯达有不同意见他们承担不了；别说王力、关锋就是陈伯达当时也不敢独自出这个主意。不言而喻，王力、关锋是奉命传达江青的黑指示。

三、萧力在批斗会召开那天一大早就去了清华，这时她已经从中央文革办事组调解放军报社工作了，她去清华显然是领受了她妈妈江青的旨意。

四、江青指示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清华大学看批斗王光美的热闹，这不正反映了她的阴暗心理吗！？

五、江青没去参加批斗会，可就在当天晚上迫不及待地在钓鱼台17楼放映厅看了批斗会现场纪录片。

基于以上几个理由，我断定丑化和侮辱王光美的阴谋出自江青。

还有一个旁证，这就是1967年给江青担任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在关锋生前，曾就这件事问过关锋。阎长贵问：“批斗王光美时给她穿上出国服装是不是江青的主意？”关锋不好意思而又含含糊糊地说：“可能吧！”关锋虽然闪烁其词，隐去了他布置的情节，但他实际上是承认了这件事是江青的主意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同我一样，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员小潘是这件事情的执行者。小潘当时仅是个20岁左右的学生，文革开始时，曾和蒯大富等一起造过工作组的反，后来被选为勤务组成员。小潘多次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在会上的发言很“得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关锋很欣赏她，认为她讲道理，处理问题踏实，关锋之所以把这件事交给小潘去办，而不交给蒯大富，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小潘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会上就是以她个人名义提出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的，一直没有透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甚至连蒯大富也蒙在鼓里——据说，不久前蒯大富还认为这是小潘的主意。在这件事情上小潘没有什么责任，她不过和

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 王保春 王文耀

口述者：

王保春：1930年生，1946年6月参军，1947年3月入党，1951年到中宣部机要室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

王文耀：1934年生，1951年到中宣部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

参加者：

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

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

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

时　间：2012年4月19日

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呢？

王文耀（以下简称耀）：陈1966年国庆节后出院，从这以后，他在中央文革小组说话就不怎么算数了。陈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隶属于中央的一个具体工作机构，怎么一下子权力弄得这么大呀！所以他当时就找人起草文件，说文革小组的有些事情必须请示主席和中央。这件事情没预先告诉江青，江青后来就跑到16楼，大发脾气，说我还是不是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我还是不是代理组长？这事情没事先通知她，她把稿子一看一改，给陈看，说："我改这些是最最重要的！"至于她怎么改的我没印象了。

王保春（以下简称春）：陈起草这个文件的意思，就是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中央政治局下面的一个办事机构，有什么事情要请示中央，他要约束文革小组的权限，说不能什么都是你说了算。江青恼火就恼火在这上面，她认为文革小组是最高的，只服从毛主席。

李：看来还是江青的理解比较透彻。我们看一些回忆文章，都有一个印象，在中央文革小组里，江青是实际上的当家人。通过您二位的叙述，我们知道了这里还有一个过程，大概从1966年8月底、9月以后，江青才实际上当家，这之前陈伯达还是说了算的。

春：这样说可以。

阎长贵（以下简称阎）：这件事情我也问过关锋。我说，是不是中央文革一开始就是江青说了算。他跟我说："恐怕还不能这样说，开始的一段时间，陈伯达说话还是很管用的。"

春：关于陈伯达说话看起来不太灵了，我举

我一样是那个疯狂、邪恶年代的受蒙蔽者而已。

附记：这件事，我作为江青、关锋旨意的传达者，应当说是"罪责难逃"。说句良心话，就在我传达指示的当时，也并不认为江青用这个办法报复王光美是正当的，至少是不符合"对敌斗争"的政策；在那种形势下，我所处的地位，只能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正因为我认为江青的这个作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所以，当我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时候，听到河北省衡水地委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后，一个星期内我写了揭发江青通过关锋丑化王光美的内幕，当时只能揭发江青违反毛泽东的"对敌斗争"政策对王光美人身丑化。因为当时王光美仍在秦城监狱关押，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还戴着。这封揭发信是通过冀衡农场的总支送到衡水地委组织部转交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时间大概是1976年10月末。■

（作者为原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江 青

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中国科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总理主持，总理作报告要中央文革派人去（凡是有活动你中央文革都得派人去啊，你不去好像不承认似的）。陈就去找江青商量，江青不去。他又找其他的成员商量，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问了他们一遍，结果谁都不去。他有点为难，就去找总理讲，说："他们都不来，我一个人也不好露面。"总理很精明，来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说："这样吧，你不跟全体会议人员见面，你跟筹委会那拨儿人在后台见个面，打个招呼就行，让这一层人知道文革小组的人来过就行。"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总理这次主持的会议文革小组不愿意支持，陈在中间夹着也很为难。最后陈自己去的，我和文耀都跟着去了，在后台跟筹委会的人员见了个面。

再一件事情。有一次聂荣臻跑到钓鱼台找陈伯达，说北航的学生（据说，这批北航学生不属于"北航红旗"——整理者）要开批斗会，在后库的一个体育馆，当时想让文革小组派人去，伯达说："可以吧。"答应了，结果谁都不去。江青不点头，谁也不敢去—— 一去不等于承认了吗？权在江青手里头，陈没有办法，说那我自己去吧。那次我们两个都跟着去了（**耀插话**：还去西花厅和总理说了一下，说他们都不来）。后库那儿揪斗聂荣臻，一进去就听到有人喊，"打倒聂荣臻！"陈伯达就上来说："不对、不对，你们不能那么喊，你们不能这么对待聂荣臻同志。你们知道聂荣臻同志刚从什么地方回来吗？他是刚从氢弹试验的前线阵地回来的呀！"这么一说以后，学生马上就改口了，高喊"欢迎聂荣臻同志！"刚从前线回来，他是我们的英雄。这么一改口性质就变了嘛。后来跟总理也汇报了。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外交部造反派，总理接见了一派，另一派也准备接见，突然总理病了，去不了了，就派他的秘书去（哪个秘书去的我记不得了）。秘书到那儿说我代表总理来见你们，总理身体不舒服，等他身体好了再接见你们。不听，在大会堂不走。后来没办法又派李富春去，造反派们还是不听。邓颖超就给陈伯达打电话，说："今天外交部的群众组织开批判陈毅同志的会，恩来原来准备去参加，现在因病得很重，实在去不成了，希望文革小组能去一下，让会早一点散了。"陈马上要我陪他到中南海西花厅。他进客厅和邓颖超谈话，出来对我说："已经先让富春同志去了，我回去再叫几个人一起去。"回到钓鱼台，到11楼找江青，江青说她身体不好还是什么的，她不去，那就找其他的成员吧，结果找谁谁都不去。陈伯达没有办法。这就看出来了，权不在你手里了，你就是一个橡皮图章，用你时盖一下，不用时不理你。

耀：去找关锋，关锋不去。就到16楼找戚本禹，陈坐在办事组门口等着，我进去找戚。戚的门关着，我就敲门，没回声，于是我就推门进去了，一看没人，后来我往里面床上一看，他盖着被子睡觉呢。我就叫他：本禹同志，本禹同志！他"呼咚"把被子一掀，坐起来，说："你和陈伯达说，我不去，他要去他自己去，代表他自己，不要代表中央文革！"就这样子的。我说，那你不去了？他说："我不去！"我说那好，我下去报告伯达同志。

春：后来我就陪他一块儿又到西花厅，我在外面，他进里面，说了一下情况，出来后，我说往哪儿去？他说去大会堂。我们从后面进去，一看陈毅在台上站着，下面人喊着口号。陈伯达一去第一句话就说："给陈老总搬一把椅子。有错误有问题可以批评，可以批判，但是不能这样子。坐下来。"服务员赶快搬了把椅子让陈老总坐下。陈伯达就发火了，说："你们不理解！总理身体不好，派秘书来说你们不听，派副总理富春同志来说你们还不听，这个地方是国家办公的地方，你们长期坐在这儿是怎么回事？嗯！"又说："这样子不对，等以后总理身体好了答应接见你

们，为什么这样不让步，不谅解？”说了一通之后就走了。回到钓鱼台，刚一进办公室，他就说：“王保春你打电话给大会堂问一问，看他们散了没有？”我就赶紧给警卫处值班室打了电话，问外交部在那儿的人群散没散，他们说：“在陆陆续续往外走呢。”放下电话我就给伯达汇报，陈说：“那就好！”

江青和陈伯达的几次冲突

李：后来江青和陈伯达又有很多的冲突，应该说是太多的冲突。您还记不记得都有哪些具体的事例？您见过没见过，江青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儿和陈伯达发生冲突？

耀：我听陈说过江青摔杯子的事情。1968年的一天晚上，文革小组在11楼开会，他回来以后就躺床上发呆。我看他回来了，就把给他整理的文件送过去，一进去我看他的脸色不好，我说您怎么了，是不舒服吗？他说没什么。再等了一会儿，他说刚才11楼给我发了很大的脾气，她摔杯子。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是因为《人民日报》的那个李希凡，说我把他逼到绝路上了。你们知道，人民日报我也没怎么去，怎么我把他逼到绝路上呢？我说现场还有谁呀？他说还有康老，还有那两个人（指张春桥、姚文元）。后来江青还拿出来一封信给我看，说康老说了，那不是信，那是绝命书呀！陈说他看过这封信，辩白了几句。江青大怒，抓起杯子“啪”地一声摔到地上。他怕让工作人员看见了，所以就把它给捡起来，用报纸包回来了。他还说江青训他就像“三娘教子”似的。陈说完以后就把报纸包着的碎杯子给我了，让我放好，不要扎了人。他后来还说了一句：看样子江青有点后悔。

我想往哪放呀？江青我们可惹不起！15楼对面有个河，我在河边刨了一个小洞，埋在里面。埋了一段时间，心里又放不下，我想要是园林工给刨出来拿走了往哪儿去找？我又刨出来，放在17楼的河边。陈因和江青经常闹别扭，不愿意住在钓鱼台了，搬到米粮库，我又把这个碎杯子挖出来，埋在米粮库的小花树的树根儿底下。来回折腾这么几次。说实在话，我真怕江青找来。

李：这是一次比较激烈的冲突。

春：再就是整治我的那一次，整得很厉害。1968年3月8日，这一段陈伯达情绪一直很低落。那一天正好是有些垂头丧气，吃完晚饭他说出去散散步，文耀陪着出去的。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文革办事组来了个电话：“王秘书，傅崇碧同志来了，在东门，你报告首长。”我说，首长不在出去了，他就挂了。过了没有两分钟，李讷又来电话，我一接，她说：“傅崇碧来了在东门，找你们首长。”我说首长不在，她根本不听，“啪”把电话挂了。当时李讷是办事组组长。什么事呀？我一琢磨，我想傅崇碧被堵在东门不合适吧，就想赶快找到陈伯达，就给警卫处打电话说，你们马上派辆车沿着去颐和园和香山的路，把首长给追回来，家里有急事。首长出了北门往西散步去了，具体不知道去哪儿，但有警卫车跟着。一方面安排去追陈，另外我就赶紧给东门传达室去了个电话，我说傅司令员在东门吗？他说在。我说赶紧把他请进来。我想你进来等着，我已经设法去找陈了。他进来以后没有到我们15楼，直接奔16楼去了。为什么他急着进16楼？原因就是他急着找鲁迅手稿。前几天许广平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说鲁迅先生的很多手稿遗失了，请想办法找回来。总理好像是在碰头会上给陈伯达说这件事，开完会回来我记得都12点多了，陈说：王保春你给我要杨成武的电话，我说好。军用机子，一要，杨成武是散了会刚进门，他的秘书接的，交给杨成武，这边陈就讲鲁迅先生手稿遗失的事，

文革中的陈伯达

文革宣传画

交代他一定想办法找回来，杨成武跟他说："好，我尽快布置。"杨成武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傅崇碧，傅崇碧就到鲁迅纪念馆问，说文革小组的人取走了；当时文革小组的人谁取的没有具体说明。一查，知道这个事情的人已回到成都59军，用飞机把那个人（**阎插话：**此人名字叫韩树信）接回来查问，他说，鲁迅手稿就在16楼的保密室里。傅崇碧恨不得马上找到，于是急急忙忙到钓鱼台来。所以他一进钓鱼台，就直奔16楼。开始是姚文元接待的他，江青很快也来了，并发大脾气："傅崇碧，你干什么？为什么要武装冲击中央文革？"详细过程我不清楚，因为我不在现场。这边也把陈伯达追回来了，他直接到16楼。陈回到15楼说："王保春，傅崇碧进来是你批准的吗？"我说，是呀。他说："你怎么不请示呢？"我说，你不是不在嘛。"你不请示你就把他放进来了？"我说他不是经常来嘛，没有人告诉我他不能来呀？陈说："你私自把他放进来不对，要写个检讨。"没办法，叫写就写吧。我就写了一下经过。16开的纸我写了一张。陈拿着我写的这份"检讨"就走了。谁知道给江青一看，江青说："这是什么检讨？没有触及灵魂，没上纲。"陈又回来了，跟我说："这个检讨得重写，不深刻。"我说："怎么不深刻呀？就这么个过程，还怎么深刻？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觉得我这样做还是很有礼貌的。他说："别说那些话。"等了一会儿，他看我也生气了，他就拿起铅笔替我修改，又加了几句话：狂妄自大，自作主张，不经请示任何人把傅崇碧放进来。我就又重抄了这个检讨，我还加了几句，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我各方面水平都很低，我要求马上调离。我抄完后，陈伯达拿着又去了，后来他回来再也没说什么，第二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康生的秘书黄宗汉看到文耀跟他说：王保春的检讨中央常委都传阅了，周总理、康生都圈阅了，江青还有个批语："责令王保春在组织生活会上做深刻的检查，其他工作人员引以为戒，至于别的问题请伯达同志酌情处理。"

杨：江青对你够客气的了。（**王保春插话：**是的，没抓我！）江青要是生气了，说把他弄走，那就糟糕了。

春：没过几天，我陪陈伯达到另外一个楼开会。首长在里面开会我在外面休息厅等着，后面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肩膀，我回头一看是江青，她第一句话就说："王秘书，对不起，不要生我的气啊！"我刚要回话，一转身她进卫生间了。回来我和文耀两个人分析江青的话是什么意思，分析来分析去，认为好像她的意思是说这件事主要不是对着我，而主要是对着首长。我说只能这么理解。

后来我不是还没走吗，有天陈伯达犯愁了："你到哪儿去呢？"我说："回宣传部吧。"他说："不行，宣传部现在两派闹得那么乱，不好相处，不能去。"那到哪儿去？到江西五七干校？后来琢磨琢磨也不行。

在这之前有个什么事儿呢，康生和江青在一次会上攻击他，阴阳怪气地说："现在各部委都在办干校，老夫子管的单位大概不需要接受再教育吧。"他那个时候主要管两个单位，一个是马列主义研究院，一个是《红旗》杂志社，《红旗》杂志实际他也管不了，姚文元在管着呢，其实他就剩下

一个马列主义研究院。这样一弄他回来就犯愁了。他想来想去,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提议解散马列主义研究院,还恢复延安时期的中央政治研究室,院里原来有二百多人,少留几个人就可以了。大概是这个意思。主席很快就圈阅退回来了。退回来就开始安排这个事情。谁去操办呢?陈伯达就把这事安排给我了。这样,我也就躲开江青了。

我跟陈伯达说,研究室要选几个人啊?他说,选十几个就行了。条件是:第一历史要清楚;第二有一定学术水平,能写文章;第三不是太出名的。当时选的人本质都不错,全国大专院校拔尖的大学生、研究生。他为什么要没有名气的人呢?他就怕江青他们抓他的辫子。我和工宣队的几个人一块帮助选拔这十几个人,当时我就住在颐和园那里,整天一起研究选拔留任的人。他后来又说选七八个人。我说你成立一个单位就选七八个人没法弄,人太少。我说:"行政人员不要?"他说:"不要。"我说:"你既然是一个中央单位至少得有个秘书长吧?"他说:"不要秘书长,有一个秘书就行。"当时有个史敬棠,是从延安出来的,跟他干了十几年,还给毛主席管理过书报,后来就叫史敬棠当秘书。他说,一个中央的单位也可以不要官。后来选定了之后,拿出名单附上档案给他看,一个一个审查,最后他点头了。从二百多人中留下来十七八个人,成立了研究室。其任务,就是搞调查,找资料什么的。

耀:糟糕的就是跟着他的人没有一个有职务的。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包括史敬棠等人,他也不给官当,他也是只让他当秘书。所以姚洛(曾做过陈的秘书)文革之后都不愿见他,也不说他什么好话。

阎:姚洛"文革"前是《红旗》杂志国际组组长,"文革"后是人民出版社副总编,他不止一次跟我说他对陈伯达的三条评价:1. 有学问;2. 没有行政工作能力;3. 心术有些不正。

郑仲兵(以下简称郑):我这里插一句,在你放傅崇碧进钓鱼台这件事情上,江青对你说"对不起。"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就是她非得制造成一个事件,本来你放进一个这种人物进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她要故意把这个事情弄大。

春:是这样。

杨:关于"傅崇碧冲击钓鱼台"的事,我再说几句。这完全是江青一手制造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江青惹不起

春:3月24日以后我就没事了。后来我就到马列主义研究院,搞了个班子组织政研室,搞了几个月。组织起来之后就准备"九大"嘛,等于组织完政研室又把我弄回来了,也等于我一直没有离开陈伯达,后来华北会议批李雪峰时,有人批判他说:"你是学了陈伯达那一套,陈伯达把王保春给藏起来,你把黄秘书也给藏起来,藏到石家庄。"

李:把你藏到米粮库了?

春:对,藏到米粮库了,他出去我不跟着出去,我留在家看家。

杨:江青跟我说过,保春是个老实人,还算是个好同志。

春:江青谁也惹不起她。"文革"初期,江青还经常往陈伯达15楼那儿跑,有一次,江青看到一层摆了个乒乓球案子,说,还有个乒乓球案子呀。让她的警卫员孙立志陪着打,孙立志说:"王秘书打得不错。"我在后面吓一跳,要是真打起来我怎么接球呀?如果我接不住就倒霉了。

杨:江青后来,把张春桥、姚文元找来,狠批了一顿,说:"你们俩,我在陈伯达那儿辩论,你们俩一声不吭,什么意思?没有是非观念?"所谓没有是非观念就是没有给她帮腔。

郑:大家都知道江青惹不起。

春:除了康生别人谁都惹不起她,你看康生对江青怎么叫?

杨:直呼江青其名。

春:就康生可以不买她的账,一进门噼里啪啦地就喊:江青!别人都不敢惹她,见她都害怕。

阎:除了毛主席直呼江青其名外,在党内高层这样叫的就只有康生了。这大概从延安以来的习惯,但这并不表明康生不惧怕江青,他后来给江青提供什么材料,不是在信封上郑重地写上"呈江青同志亲启"嘛!

郑:康生对江青直呼其名,陈伯达呢?

春:叫"江青同志"。在下面我们都是叫代号,叫"11楼"。

只要江青一发现陈伯达到主席那儿去，回来就批评他

耀：陈伯达受许多窝囊气。主席批评他，说你现在官做大了，不到我这儿来了，你也不写文章。陈当然不敢吭声，回来跟我们说。我说你怎么不说江青不让你去呀？他说“我怎么说呀，我一说不等于告江青的状了嘛。”为什么不能去？只要江青一发现陈伯达到主席那儿去，回来就批评他，说：“是不是昨天又去主席那儿了？主席有什么指示，为什么不向我们传达？主席年龄大了，你到那儿说话啰哩啰嗦，都说什么了？”过去他到主席那儿非常随便，陈的住处和主席住的游泳池一墙之隔，他有时间就去，也不让我们跟着。他去了就问工作人员有没有客人，睡没睡觉？说，没有。他就进去，和主席在一起交流聊天。可是后来他只要去过，一回来，江青就急，就逼他传达；陈说一点，江青就说，去那么长时间，就说这么几句话？给你说过多少次，没事不要去打扰主席，你就是不听！？所以陈伯达就不敢去了。要不就偷着去。有一次，他悄悄地去主席那儿。第二天会上江青就问他，你昨晚去哪儿了？陈回答，回家了。碰巧那天是礼拜六。康生在一边阴阳怪气地搭腔：“噢，老夫子还回去过礼拜六。”江青说：“你去主席那儿，回来为什么不向我们传达，你封锁最高指示！”陈回到住的地方，苦恼地跟我们说：“我只是和主席说些不成熟的问题，主席也没说让我传达，我说了主席不怪我呀！”

李：这是什么时候？

春：是“文革”开始以后，“文革”以前不存在这个问题。

郑：从什么时候陈伯达不敢去了？

春：那就是1966年国庆节他从医院出来以后，就很少去了，一去就受江青的责问。

耀：后来就更不能去了，一去回来江青就问：“你是不是又去主席那儿了？”批评他，他特别难受。1968年，陈去主席那儿，主席批评他：你现在官做大了，不到我这来了，也不自己写文章了。他心里着急，我心里更急，催他赶快动笔写。写什么？他不愿意写“文革”，想了一阵子后，决定写国际问题，我们为他找材料。动笔不久，他夫人刘叔晏一天晚上来了，小声跟陈说，女儿学不能上，在外边造反，让陈为女儿找个工作，以不让她到处乱跑，惹祸。因为刘和陈不住在一起，刘走后，陈很犯愁。平时他要求我们很严，这时他在想为自己孩子如何求人。他刚走到办公室的电话前，正好我拿着写文章的材料急忙走过来，看到他要为孩子事求人，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公事重要还是私事重要？他一听，愣了，生气地说：我就不知道公事重要，还是私事重要！电话也不打了，回头到卧室去了。这时我一下子醒悟过来，赶快到他卧室，看到他生气地躺在床上，便悄悄地到他床前向他表示：伯达同志，我错了，很对不起！他轻轻地说：没事，你去吧。我放下材料，回到我办公室。结果深夜，服务员给我打电话，说快点，首长要出去了。我一听，赶快下楼，上车，和他坐在一起。我问：咱们上哪里去？他没理我，和司机说，“老俞，到西边去”。他心情不好，就跑到钓鱼台西边。那个时候钓鱼台都算郊区了，夜里没路灯，黑乎乎的，路上也没人。他让老俞停车，然后就下车了，不理我。他在前面走不说话，只是散步，我紧紧跟着，后面还一个随车跟着。散完了步以后和老俞说“回去”。回来以后就上楼，躺在床上，我都没话说了。第二天，他就跟王保春说：这王文耀可不得了，昨晚上跟我发了很大的脾气……“什么不写文章，什么不知道是公事重要还是私事重要，用他来指挥我？”他叫保春和我谈谈。保春说：“是，我批评批评他。”接着又劝他，文耀年轻不懂事，你别计较。经保春调解后，我们的关系又缓和了。他的文章也写了。写好以后我们挺高兴的，说这下行了，送给主席，主席不仅画圈并批示：“此文可用。要在小组会上讨论。”小组开会回来后，我们问他怎么样呀？他说：“没谈。”就是说没有讨论这个事。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对着他说：“你的文章主席说了，根本不精彩。”我说，主席有批示的，说可用呀，让回去讨论。他说：“江青这样一说，我就不好意思再拿出来让大家讨论了。”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阎：文耀说他和陈伯达发脾气。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恐怕连想也不敢想，是不是老杨？

杨：对。别说跟她发脾气了，你老老实实为

她服务，还找你茬呢！

后来陈伯达实际上成了很孤立的人

耀：陈伯达太窝囊，我们也受不了呀。把保春撵走了，我自己还能在这儿干几天呀？他这里的工作有时候真不好干，比如康生一来，我们很高兴地招待他，请坐，倒茶，我们马上报告陈伯达，而康生在会上对陈伯达说，你那个秘书可是不得了，到你那儿去很不容易。

李：为什么康生这么说？

春：你把他挡在客厅，给他沏上茶，你进去报告陈伯达，他不满意，他想直接闯到陈伯达屋里，不受任何阻拦。

耀：意思是说秘书阻拦他进去。他就想直接进去。戚本禹后来到陈伯达这儿就是这样，直接进，有天护士说首长在睡觉，他也不管直接就进屋了。

郑：戚本禹毕竟年轻嘛，不把陈伯达当回事，像康生这么大岁数了，应该有分寸呀？他到江青那儿肯定不敢吧？

耀：因为江青要换我们呀，几次要换。我对刘叔晏也很有意见，我告她的状。后来陈伯达就说，她（刘叔晏）对你们还是挺不错的，江青几次要求换你们，她说不换。江青要换，陈伯达就是一句话："生人来我不习惯"。后来陈实际上成了很孤立的人，孤孤单单的，在上面老挨批，主席那儿又不能去，他夫人也不在，所以有些话都没有地方说去，有时候只能和我们叨叨几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离开。那边文革小组一直是想要换掉我们。有一次，广州军区来了一个电话，说："是伯达同志这儿吧？"我说，是。电话里说："让我们给伯达同志挑两个秘书，我们找了，这两个同志一个是全军的劳动模范，一个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挺不错的。"我一听这事不好办，我说这样吧，谁给你布置的任务你就告诉谁，你不要告诉我们这儿。我就把电话挂了。挂了以后没多久，戚本禹就来了，直接奔陈伯达那儿，出来就发牢骚："那个时候跟你说你同意，现在又不同意了。"陈伯达说，陌生人来我不习惯。戚本禹就很生气地走了。

杨：陈伯达真够可怜的，你们都敢跟他发脾气，戚本禹更不用说了。

李：对陈伯达戚本禹当然有恃无恐，在江青面前，恐怕是不敢放肆的。

阎：你说得对。我给江青做秘书后，戚本禹居然有一次问我："我到江青那里要注意什么？"我没说他要注意什么，他和江青的关系比我好，对江青的了解比我清楚，我能告诉他注意什么？——确实我也不知说什么。我只跟他说，江青对你的看法挺好，她说："就是戚本禹比较关心我。"戚本禹对陈伯达那样不放在眼里，别说对江青了，对康生他也不敢。在我还没给江青当秘书前，因为在戚手下工作，有一次他带我到康生那里（钓鱼台8楼）去，在路上，戚问我："康老怎么样？"我说不知道——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康生需不需要打倒？当时在他脑子里仿佛除了毛泽东、江青、林彪，谁都可能和可以打倒。戚对周总理说不上很尊重——大概受江青的影响，但他很赞赏总理对大字报的态度。他说，康生、陈伯达一看到有人给他们贴大字报就急得不得了，而总理很大度，说："让他们贴去哩，我不怕！"王力、关锋倒台后，总理在大庭广众之中，不止一次赞扬戚本禹，有一次戚跟我说："总理这样做，搞得我很不好意思。"我扯远了，回到对陈伯达的态度。不仅戚本禹，还有王力、关锋，他们三个人，对陈伯达的态度都不好。陶铸倒台后，在钓鱼台16楼会议室，我亲眼看到王、关、戚三个人奚落陈伯达，说他接受陶铸的礼物。逼得陈伯达当场说出这样的话："请戚本禹同志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对陈这样说，我感到很惊讶。我分析，陈这话有两层意思：一、他知道戚和主席、江青的关系好；二、也是警告戚，你不要在主席、江青那里告我的状。

耀：是。因为当时这个倒了，那个倒了，陈伯达上面惹不起，下面也惹不起，所以他很窝囊。

李：您说陈伯达经常和您二位发点牢骚，说点话，他主要都说些什么样的话？

春：陈伯达跟我们说过，主席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江青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不是，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这是主席生气的时候说江青。这类的话，主席肯定是说过。在公开场合，陈伯达哪敢说呀？只能回来和我们念叨念叨。

耀：关于这类事情，陈伯达对总理也有埋怨，

我所知道的李震之死

○ 施义之 口述 陈枫 整理

[**编者按**:施义之(1917—1995),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2月,任六十二师政委。1965年5月,任二十一军政委。1966年12月奉命调公安部"支左",任副部级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1977年5月被停职审查,1985年被开除党籍、军籍,每月给生活费150元。本文是其晚年口述稿的一部分,由其夫人陈枫同志整理,本刊发表时除了明显的笔误外未作其他改动。]

"九一三"事件前后,中央从地方调来不少干部参与决策。有上海的王洪文,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吴德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公安部参加党的十大的代表是李震、张其瑞。在十大会上李震、于桑被选为中央委员。自1970年谢富治得癌症治疗期间,李震即代部长工作,1972年谢富治病逝,李震任部长。

1973年10月21日,公安部发生一件大事——李震的死。

关于"算旧账"问题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核心小组中矛盾的焦点,无论中央领导怎样批评,也无法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遵照周总理指示,应该统一思想,统一思想后写报告报国务院。李震起草的报告中有"'算旧账'有损于文化

他和我们念叨过。主席对江青经常有所批评,陈伯达说:"总理也不在会上传达。总理不传达其他人也没法说啊!"

李:陈伯达背后发江青的牢骚吗?

春:他当然不满江青,他根本不愿意在11楼待。

阎:江青看电影他也很少去。不过有一次他倒告了我们一状。有一次江青跟我说:陈伯达同志来了,你们要对他热情一点。我们感到很冤枉:我们什么时候对他不热情了?我们工作人员敢吗?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他在我们眼里和心里还是有威信的。当时我跟保春议论过这件事情。后来想,陈伯达这话很可能是说给江青听的——只是拿工作人员当借口罢了。

春:对,你跟我说过这个事。"文革"初期,不是有文革小组会嘛,陈伯达召集和主持,后来弄不下去了,他不愿意参加,他就不开小组会。后来主席定的由总理来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从这以后他就愿意参加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他不召开和参加文革小组那几个人的会,他想躲避。江青想出一招,叫大家到17楼看电影,看到半截,停。一停灯亮了,工作人员退出去,他们几个人就商量事情,江青、姚文元、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你(指阎)可能也碰上过,反正我们碰到过几次,临时开。(**阎插话**:对这类事我没印象了。)后来陈伯达明白了,就总是躲着,叫他去,他说:"我不行,我头晕、头疼,要不然说我吃了安眠药了,我不看,让他们先看吧。"服务员要是说:"不行,江青同志和康老在等着呢,你不来他们不开演。""你叫他们先看吧。"他电话中老这样说,他老想躲着,拖着。他说一看电影就开各种小会。他的意思很明显,中央文革这个会我不参加,我要参加就参加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就这样闹得比较僵。文人就这样,以柔克刚,肉不叽叽的,抓不起来那个劲儿——你想骂就骂吧,我听着——有的时候旁边的人都看不下去。有的时候他和江青坐一个车,坐在江青车上,那是想怎么骂怎么骂,想怎么说怎么说,车上的护士听到后,有时也告诉我们一下,在这方面江青的护士许春华和我们关系很好。■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

(责任编辑 黄 钟)

施义之摄于1955年授衔时

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的话，于桑不同意，经核心小组多次讨论意见还是不统一。“报告”拖了很长时间定不了稿，直到李震死的前夕，在核心小组会上讨论时还争吵不休。报告最终流产。

1973年10月20日是星期六，晚上开的核心小组会上因讨论报告意见不一，于桑同曾威拍桌子争吵起来，会开不下去了。21日是星期日，我因发低烧和牙疼躺在家中，白天李震来看我。他心情很沉重，说：“你看昨晚又吵起来了。”我劝道：“意见不一吵几句没有关系，只要你不吵就行了。”坐了一会他就走了。领导班子思想不统一，无法向上交代，我非常同情他。

22日，我去北京医院看牙，9点多钟秘书打电话到医院，问我知不知道李部长上哪去了。我忙问怎么回事，他说昨晚一夜李部长都没有回家，现在还没有找到。我说我不知道。当时我没当回事，心想可能有事出去了，半夜被召到国务院开会是常有的事。11点多钟我从医院回来，径直到五号楼（核心小组开会地点），看见于桑、曾威、刘复之、黄庆熙、刘湘屏（谢富治夫人，住公安部院内）、张其瑞等人都聚在五号楼门前，气氛很紧张。在人群里还有李震秘书郑爱萍和其他干部。他们告诉我已到处找过，五号楼地下管道内也找了，没有。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呆站在那里，似乎有不祥的预感。

组织人再去找，包括全院子的地下管道内都要找。结果两位工人在大院东南角的一个地下管道口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工人出来时，刘湘屏回家正路过，刘马上叫人通知我们。得到通知以后，我和于桑、曾威、刘复之、黄庆熙一同赶到那里。刘湘屏要于桑、曾威下去看看，关照不要动，不要破坏现场。他二人上来后告诉我们，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

这时立即电话报告国务院和周总理。22日当晚，于桑从国务院回来召集核心小组开会，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于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杨德中（8341部队政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等组成破案组，从外地调来几名法医，着手破案。

23日，于桑、刘传新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到部里宣布对李震的秘书郑爱萍隔离审查。下午破案组与核心小组听取公安局勘察现场初步情况的汇报。当时吴忠说：据周总理的秘书讲，21日晚他给李震打电话时，李还谈笑风生。

晚7时左右，周总理把全体核心小组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我们谈各自的看法，我说：“我同意周总理的判断，他为什么要自杀？极大可能是被害。”刘复之说：“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矛盾集中到他身上。”周总理在会上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张其瑞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郭玉峰（中组部部长）、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24日，我参加了破案组的一次案情分析会。据李震爱人反映：21日晚李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去的五号楼，说是去开会。一夜没回，到了清晨问秘书郑爱萍，郑一点也不急，催问几次才去找。针对什么样的电话能把李震引出去，会上大家分析可能是山东的案子（具体内容我不知道）或是李洪枢案（苏修派遣特务）。在会上我得知李震除服了大量安眠药外，口袋里还有安眠

药，是潮湿的，有口袋布的压印，似乎是从口中吐出来的，正在取样化验，还不能确定死因。但大家的思路仍集中在“他杀”的问题上。

10月26日下午，郭玉峰、田维新通知我们，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郭玉峰、田维新同我们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进了人民大会堂前厅大门，于桑走在前面。突然，守候在这里的杨德中指挥8341部队的战士上前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随后的刘复之也被架走了，刘复之的一只鞋也掉了。我跟在其后，见此景一惊，马上停住脚步没敢动，等待也被架走。这时杨德中说周总理在里边等着你们，把我、曾威、黄庆熙、张其瑞引进福建厅。厅里，周总理、叶剑英、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江青、张春桥、吴德等已坐在那里，除朱德之外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在场。还有吴忠等人，稍后汪东兴到。

我们进去后，杨德中请示周总理怎样向于、刘二人宣布，总理说：宣布“保护审查”吧。杨德中出去宣布后回来，周总理问他俩有什么反映，杨德中说：“于桑问为什么，刘复之讲：‘好’。”周总理说：“这完全反映了这两人的性格，一个像恶霸，一个像军师。”接着讲“李部长是被害。我把陈锡联同志请来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表现不好，破坏现场，幸灾乐祸。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以来是没有的，比谭甫仁案子还严重。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总理还说：“李震被害的教训是他政治上软，受到批评就知难而退，想回部队。”接着，要我汇报部里“算旧账”和反“算旧账”两种意见分歧的情况。在我汇报过程中，纪登奎插话：“李震就是软，一软就转，一转就死。”汪东兴插话：“他们（指于桑、刘复之）是反文化大革命、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当我汇报到“我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后势力”时，江青插话说：“什么落后势力，是一股反动势力。”在汇报了核心小组内吵架的事后，我说：“我没敢想于、刘会是谋害李震的后台。”江青插话：“你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吵架阶段，于、刘不是后台，跳到前台来了。”还说：“于、刘是转移方向，向党进攻。”会上叶帅也强调要想得深一点、远一点。这次会后，在我思想上有这样的感觉，党中央、周总理已掌握李震被害材料，李部长被害可能是于、刘支持的。

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指定我临时负责核心小组工作。我毫无思想准备，当即就说：“我各方面比李震差远了，负责不了。”周总理批评我没有信心，并说：“有事可以请示国务院嘛！”江青说：“你不要把部队当成娘家，地方当成婆家，娘家、婆家都是共产党。”在这个严重时刻，当着众多的政治局委员的面，我不能再说什么了。周总理指示我第二天就召开千人大会，充分发动群众揭发、提供线索，配合破案组，限一周破案。还指示吴忠、杨德中、郭玉峰、田维新参加大会，去撑腰。周总理还要吴忠加强公安部大院的警卫，要封闭公安部大院的两个旁门，有个政治局委员（记不清是哪位）提出不要搞得太紧张，周总理就没有坚持。

回到公安部已是27日凌晨4点多钟，我即找人起草动员提纲。提纲经华国锋审定，下午3点召开了动员大会，我作了动员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李部长被害了”。我传达了中央指示，说明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作风正派，家庭美满，没有自杀因素，绝大可能是被害。事情发生在党的十大以后，四届人大之前，很不正常。动员大家以党性原则揭发可疑点，追查到底。还传达了中央指示我们关起门来整顿，停止对外工作联系。我在大组和治安组会上表示了我“不破此案，死不瞑目”的决心。动员会后，以自报公查的方式查了每个人21日晚的行动，牵扯了很多人。

揭发的线索，涉及公安部内部的由公安部查，涉及部外的由北京市公安局查。

27日晚，破案组来电话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在卫戍区办公室，吴德交给我一份审查对象的名单，有十多人，要我们隔离审查。我看后提出人数是否多了，吴德说请示周总理后再说。接着他出去了，过了一会他回来后把名单交给我，名单没有变化，但审查方式改为隔离审查、在职审查、传讯三种。破案组决定对莫国基（刘复之秘书）、徐仲久（部长办公室公务员）、戴文殿（于桑秘书）、刘均（原一局处长，同李震一起搞专案）等人组织群众专案组进行审查，专案组的人选是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的。

28日，华国锋打电话找来了天津的解学恭，

当时在场的有吴忠、刘传新和我。布置了对刘复之、王万沐(日本华侨,刘复之的远亲,正在国内。在公安部的档案中被列为特嫌)和刘在天津的两门亲戚进行审查。对他们的审查,在天津的由天津市公安局负责,在北京的由北京市公安局负责。我后来得知对刘、王的审查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李震案情时经毛主席同意的。

10月底,破案组要我到卫戍区,在那里刘冰清(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向我传达了周总理亲笔写的对郑爱萍的十几个疑点内容的字条,并指示我们组织七、八十人查批郑爱萍。回公安部后,我向核心小组作了传达。讨论决定由苏玉涵(专案三办办公室主任)、姚伦(原劳改局副局长,后抓专案工作)、侯西斌(原边防局局长)负责查批郑爱萍的工作,破案组的刘传新、李久合(原交通保卫干部,干校回来后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提出的疑点。过了几天,刘冰清又带来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我亲自主持对郑爱萍的查批会。我主持过几次,记得会上郑爱萍提出了李震自杀的11条理由,具体内容现已记不清了。

11月上旬,吴忠向我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破案组要发动群众,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要放几把火。要集中批郑爱萍、莫国基、戴文殿、徐仲久,对于桑、刘复之也要揭发。公安部要关起门来整顿。公安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发展到对抗,杀人夺权的地步。"周总理还说:"我就怕侦察工作上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没有经验,帝修反是有基础的,斗不过人家。"吴忠说对周总理的指示如何贯彻要听华国锋的安排。

我意识到党中央对李震的死是从国际这个大背景来考虑的,所以要我们想得深一点,远一点。把李震的死和国际反动势力连在一起,感到触目惊心,工作上压力很大。但有周总理坐镇指挥,又有华国锋的直接领导,我全力配合破案组工作,有事可直接汇报,心中有了底。

11月14日华国锋对我说:"中央为了加强公安部的领导,已决定调杨贵、祝家耀、徐海涛(杨是中央候补委员,原林县负责人,时任河南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负责人;祝是中央委员,上海造反派头头,时任上海市事务管理局局长;徐是部队干部,时任总政保卫部部长。他们作为接班人到中央读书班学习)到公安部,参加核心小组,部里也可以选人参加核心小组,不成熟的话,可以临时参加或列席会议。"还说:"总理指示重点审查对象是郑爱萍,至少动员千人以上大会揭发批判,除查破对他们的疑点外,要批驳他提出的李震自杀的理由和他的目的。""从现场看是自杀的样子,但分析没有自杀的因素,我们必须从阶级斗争高度来分析。吴忠去天津发现刘复之与王万沐的关系,问题就更复杂了。"还指示说:"群众揭发的线索已不少了,下一步要查与于、刘搞阴谋诡计有牵连的人和事,一起揭、一起批,实际上要与两条路线斗争挂起来,这样对破案有利。但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掌握好政策。"后来在揭批过程中,出现了"上帮下促"的现象,这样把思想认识与破案线索混淆,扩大了批判面,不利于团结大多数,经纠正制止了。

11月17日,杨贵、祝家耀、徐海涛到公安部参加核心小组工作。中央决定杨、祝、徐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罗青长(中央调查部部长)、刘湘屏(时任卫生部部长),决定我也参加破案组的工作,由祝家耀分管政治部,负责内部发动群众。不久,徐海涛被调走。

张其瑞回来把破案组在检查刘复之的文件时,查到的一份公安部局、处领导班子配备名单交到核心小组。这份名单上有李阳及其他七八名曾含冤入狱的局级干部。经核心小组大家讨论认为,李阳是1972年获释恢复工作后不久因病去世的,他去世前,名单上的几名局级干部尚未出狱。推论这不是核心小组商定的公安部局级领导班子配备名单,而是刘复之自己确定的名单。随即向华国锋和破案组汇报,华国锋要我们写成简报报中央。核心小组在简报中,上纲到"翻案""复辟夺权"。

关于"算旧账"的情况,虽然已口头向周总理汇报过了,但纪登奎要我们写个书面报告。因为文革中核心小组会一直没有正式记录,就在核心小组会上根据每个人的记录和回忆相互补充写了个书面报告报中央。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报告上没有说明这是根据核心小组成员个人记录和共同的回忆汇集的。

12月的一天,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了破案组会议,听取了祝家耀发动群众的综合汇报。

会上华国锋说："没有调查研究说李震是自杀是错误的；不调查研究说是他杀也是不对的，结论应该在调查研究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人说李震之死有自杀、他杀两种可能。华国锋还传达了毛主席在听取周总理的汇报之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毛主席举了明代发生的三大疑案。华国锋在会上嘱咐我们，这些指示由核心小组掌握，暂不向下传达，以免松劲，工作仍照常进行。

由于我缺乏历史方面的知识，当时回来后翻了历史书籍，才知道毛主席举的是三起明朝宫廷内发生而没有查清的案子（具体的内容记不起了）。

1974年1月初，破案组确认李震是自杀。核心小组研究决定分两步向下传达。先讲存在他杀和自杀两种可能，然后再讲是自杀。经华国锋批准后，召开了大组长和处以上干部会议，由杨贵按两种可能作了传达，并代表核心小组承担了前段审查工作中的责任。

1月中旬的一天，华国锋召集核心小组成员到北京卫戍区开会。华国锋说：经调查，李震的死与于桑无关，解除对于桑的审查，刘复之不能放，继续审查。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中央站得高，看的全面，我没意见，坚决执行。但要给点时间做思想工作。"华说给一周时间。同时华国锋指示我和吴忠一起去接于桑出来。还指示除刘复之外，其他人都宣布解除审查。为了给公安部做善后工作的时间，会上决定于桑出来后先在中组部招待所住几天再回家。

会后华国锋要我随他一同去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在车上华国锋对我讲：在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当时从被害的角度审查是必要的，向周总理汇报时他也是这样讲的。周总理指示：于桑回部后，你们要抓紧时间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这个人什么都不在乎，批判他，一是挽救本人，二是教育大家，提高思想。华国锋写的解除于桑保护审查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于桑与李震的死无关，但于桑在公安部的错误是严重的，回公安部后要接受群众的批判，自己要作认真的检查。第二天，我同吴忠拿着周总理批准的报告给于桑看了，把于桑接到中组部招待所。后来于桑回部作了检查，经大小会数次批判后恢复工作。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仍为核心小组成员。

到了1974年底，在一次破案组会上，吴忠提出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隔离久了对他的身体不利。华国锋表示同意，并具体指示：解除刘复之保护审查后安排回家，不恢复工作。大约在1975年5月，刘复之要我替他转给周总理一封信，信中说他在卫戍区保护审查期间，曾威带人到他住处安装窃听器。周总理批示要吴忠查。经吴忠查没有此事。华国锋让杨贵、于桑找刘复之谈谈。在一次华国锋参加的核心小组会上，杨贵、于桑汇报了同刘复之谈话的情况，会中有人说这不是对曾威个人，是对破案组的。华国锋说："不是对破案组，实际上是对我的。"

自此，李震之死的案子基本结束。

从个人角度讲，对于李震的死，我是很惋惜的。在他领导下多年，得到过很多帮助，我们的关系也很融洽。李震在他的位置上负责的事情多，了解的事情深，自身的工作压力和思想矛盾又极少透露，我对他的内心了解甚少。他死前，我看到他按中央要求处理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歧意见及争执进行不下去的困难处境，是很同情的。他死后我从感情出发最初无法接受"自杀"一说。认为他不会自杀，也不应该自杀。

李震之死引起中央的很大震动，在中央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处理措施。中央领导人在案发后的一段时期将此案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强烈倾向于认定"他杀"，这确是事实。

我当时对中央领导人的这种判断，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周总理在关键时刻点了我的将，要我负责核心小组工作，我提出过胜任不了，但中央决定了，我只有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两个多月的清查，使许多干部被牵连，被批判，被隔离，受到了伤害，对此我感到十分歉疚。当确定李震是自杀后，我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在思想认识和工作中及时做了调整，坚决贯彻了中央领导的指示。

（责任编辑　黄　钟）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陈水扁这面镜子

○ 李洪林

要问当前什么事情最不得人心，大概就是腐败了。必须反腐，也是朝野共识。老百姓对腐败当然深恶痛绝。掌权者也没有谁敢给腐败辩护。但是回顾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却是“越反越腐”。

不过，使一些人心情为之一振的是：中共第十八届新班子一上任，就雷厉风行展开反腐行动，某些所谓“有后台”的贪官已经纷纷落马了。

“要动真格的了！”有人这样评论。现在“两会”闭幕，中共十八届领导已经全面接班。人们最憎恨的腐败能被根治吗？

一般而论，一个国家的执政者确实不愿意自己的队伍里有腐败分子，因为这种人危害自己的统治。中共执政以来，曾经多次不惜以死刑对付贪官，这在当今的世界上都是少有的严刑峻法，还能说“没动真格的”吗？然而当政者的决心是一回事，腐败的产生机制却是另一回事。

产生腐败的机制是什么？权力。因为权力是由人来行使的，而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谁手中有了权力，谁就可以强制推行自己的意志，既可以支配他人，也可以占有财物。这就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只要对权力没有监督和制衡，掌权者必然以权谋私。所以“权力腐蚀人”是一条铁的规律。自有人类社会以来，腐败就与权力共生。当掌权者身上的“魔鬼”完全压倒“天使”的时候，也就是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的时候，这时执政者就陷入统治危机，社会便无法维系了。也正因为如此，怎样对权力实行制衡和监督，便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课题。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经过几千年的摸索，终于找到一种可以有效防止腐败的政治机制，这就是民主。民主的本义是主权在民，它的前提或基础是天赋人权，即非经法律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按照宪法，由这样的选民，经过普遍、平等、直接选举产生的分权制衡的权力机关，依法对国家进行治理，就是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权力是由人民授给国家机关的，宪法是整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专门约束国家机关的权力同时保护人民权利的最高准则，这正是“法治”的本义。

在这种制度下，国家权力既然由人民授予，便可以由人民收回。而且这权力既不是集中在一个人或几个人手中，也不是由一个机关来行使，而是分散到互相制衡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门。这就从体制上杜绝了独断专行的可能。不但如此，由于民主制度保护言论、集会、结社、新闻、出版的自由，也一定有广泛的舆论监督。在这种制度下，一切官员全都处于阳光之下，从他的财产到他的政治活动，包括他的道德操守，都躲不开全社会的监督。这就不光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是几乎处于“千夫所指”的境地了，还能有以权谋私的余地吗？

当然，连自然界的物质都很难提炼出100%的“化学纯”，何况更加复杂的社会呢？事实上在民主制度下，也难免有人以权谋私。远的不说，就在台湾海峡对岸，同为中国人居住的台湾，前几年就发生了一桩举世瞩目的腐败大案，这就是陈水扁贪污案。

经过漫长的诉讼过程之后，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及其妻子吴淑珍，今年二月终于被台湾高等法院各判二十年有期徒刑，并分别处以罚金新台币二亿五千万元（陈）和二亿元（吴）。这位台湾的前“总统”和“第一夫人”，不但人要服刑，而且还要吐出赃款。他们的下场，应当成为大陆贪腐权贵们的一面镜子。

大陆的中国人，一向怀着特别的心情密切关注着陈水扁事件。不过这种“特别心情”却因人而异。老百姓在电视机前看台湾的反腐新闻时，心里想的是大陆的“反腐”。台湾的前“总统”陈水扁和他的夫人都能法办，大陆那些逍遥法外的

贪腐权贵及其家族呢?

“权力腐蚀人”这条规律真是屡试不爽。陈水扁当年曾被人看作“民主斗士”,他本人也洋洋自得,居然恬不知耻,以“台湾之子”自居。但这位“民选总统”上台之后,立即忘乎所以,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地攫取财富,很快就使自己的家族成为新的暴发户。中国早就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如今这位“八年清‘总统’”,该有多少“雪花银”呢?

如果说已经实现民主宪政的台湾,都能产生一个腐败的“总统”,那么在民主宪政尚待实现的大陆,就更难以杜绝腐败了。

为什么在大陆会发生“越反越腐”的怪事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政治体制,是“党国体制”,所有的权力全都集中到执政党手里。权力如此集中,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在这种体制下,官员都受命于上级,所以老百姓拿他没办法;媒体都是“党的喉舌”,所以没有舆论监督;民主党派都自愿接受中共的领导,所以也没有在野党的监督。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掌权者垄断了全部权力,能不腐败吗?当然,中共中央也知道腐败会毁了自己,也确实在反腐败,还成立了专门机构。但都是上级查下级,上级反下级,谁都无权查上级,更无权反上级。

民主宪政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虽然当选者有可能变坏,或本来就坏而是靠欺骗选民上台的,但他长不了。因为他的命运操在选民手里,选民可以依法选他上台,同样可以依法赶他下台。陈水扁在任期内虽然靠玩弄手腕没有被赶下台来,但到大选时,终于被选民所抛弃,而且被依法送进监狱。正因为台湾已经从专制转向民主,所以陈水扁执政所酿成的政治危机,才能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平稳解决。

然而大陆至今还有人公然拒绝民主的普世价值。

陈水扁事件的解决,向全世界显示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也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政治文明上并不比别人落后。西方人能办到的,中国人一样能办到。这不但使大陆朝野看到了解决反腐难题的出路,而且对大陆的政治改革也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事实上,大陆的政治改革乃是两岸统一的真正关键。因为只有在民主的大陆和民主的台湾之间,才能产生真正的亲和力。这种力量发自两岸人民内心,是任何外力分不开的。

当然,面对台湾这次民主和法治的胜利,不愿意权力受到监督的人不会高兴,因为他们从陈水扁这面镜子里面看到了自己的下场。为了逃脱这种命运,有人在准备后路,把财富转移出去。不过这毕竟是逃跑,而且还有风险。所以这些人必然要反对政治改革,以便保住手中的权力。只消举出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改革的阻力有多大了:“官员财产公示”本来是极普通的一件事,可是在大陆,到现在都行不通。为什么呢?因为掌权的官员自己不同意!没有一种制度迫使官员必须服从人民的意志,而是请他自愿接受监督,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谁都知道,民主大潮不可抗拒,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决定的改革,就是一条可以和平地向宪政民主转型的路线。这条路线既要改革不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要改革不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就是说,经济政治文化都要改。

现在,中共十八届新班子已经全面接班。看来,新领导的反腐决心和手段比往届都强得多,所以才有人说,这回是“动真格的了”。老百姓当然欢迎“动真格的”。但真正有效还要靠制度。人民不能真正普选,舆论监督没有放开,不能分权制衡,总之,宪政民主不实现,自己监督自己,腐败是反不掉的。这个道理,其实用不着多说。

中共十八届领导上任之初,曾表示决心要涉足“改革深水区”。什么是“深水区”?当然是政治制度。因为二十多年来主要进行经济改革,以致政治严重滞后,不光导致腐败越发严重,同时也是产生各种问题的总根源。如今新的领导表示要涉足改革的“深水区”,确实使人们重新燃起政治制度改革的希望。如果这种决心真的变为有效的实际行动,那就不光反腐,而且意味着踏上宪政民主的大道。■

(作者为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两类矛盾”理论在中国的实践

○ 王也扬

“两类矛盾”理论是毛泽东于1957年提出的学说。它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后者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处理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用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两类矛盾会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如果处理得不好，非对抗性的矛盾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两类矛盾”理论源自对敌斗争策略

简而言之，“两类矛盾”理论属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体系，它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同的。

在“两类矛盾”理论里，所谓“人民内部”的范畴，是过去革命斗争中为了孤立和打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功争取了中间阶级而形成的。著名党史学家胡绳说：“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后来抗日起来了，才发生根本变化。”另一位著名党史学家胡乔木也说：“在四十年代，毛主席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过去三十年代没有那样提。他从地主资产阶级中分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把大资产阶级称为官僚资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划分开来，这是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可以说，这是中国革命在四十年代能胜利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习惯地把这段胜利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明。

其实马、恩著作中，并没有多少关于争取中间阶级的专门论述，《共产党宣言》说，我们时代的特点是阶级对立的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是马、恩设想的这种因生产力高度发达，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军对决，且须多国无产阶级同时胜利的革命，在西方工业国中并没有成为现实，倒是经济落后、社会分化程度低、中间阶级占了多数（毛泽东以“两头小中间大”来形容）的国家，如俄国和中国，革命烈火容易燃烧（所谓“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

这些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也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首先实现民主主义。对此，列宁认为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灵活变通，移植使用，如果弄得好，革命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由于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发达国家那样强大，社会中间阶级的成分又相当复杂，要想以小搏大，最后把事情搞成，列宁非常重视如何争取多数的革命策略问题。他提出“两步走”（即先联合社会各界一道进行民主革命，掌握政权后再“不停顿地”迈向社会主义），并著文《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又著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对取得革命成功的策略进一步加以总结。

列宁是这样表述其革命策略的：**“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原著中此段话为黑体字——引者）在列宁的论述中，革命已经不是马、恩原来设想的那种“简单化”的两极对抗，而是存在着三个阵营（即敌、我、友）和四个方面（“联合”对象与“麻痹”对象，又是一个阵营中的两个方面）的复杂关系演进。

这种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转化的；

革命的目标，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不同的阶段发生转化的。如在民主革命阶段，革命对象是专制制度，联合对象是农民，“麻痹”对象是资产阶级；而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革命对象则变成了资产阶级，联合对象是半无产阶级，“麻痹”对象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麻痹”之谓者，施以手段，使其不察而利用也。说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均非革命的“自己人”，只不过是暂时的“同路人”，经过各个阶段我方对其区别对待的同盟关系，它们最后将一步步转化成为革命的对象。

于是，阶级斗争学说，在列宁的演绎之下，变成了一门高超的政治艺术，其与马、恩那种带有德国古典哲学色彩的逻辑推理，显然有了极大的“创造”和“发展”。列宁总结道：“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比资产阶级弱一些……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

有充分的历史资料证明，中共在上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关于争取中间阶级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的更完整的包装——新民主主义，其核心的东西，完全来自于列宁主义。

而中国传统的“纵横捭阖”之术，则帮助人们更容易理解这种政治斗争策略，并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加以运用和发挥。

据彭德怀回忆，早在30年代初，“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

也就是在此时，适逢共产国际调整政策，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开始形成联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间阶级，后来称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批评那种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的“关门主义”，主张“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可以看出，他使用的语言都是列宁式的。他同时提到了“纵横捭阖”之术，说敌人“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

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支持毛的意见，他也表示：“利用统治阶级中的矛盾，纵横捭阖的联合这一派去反对那一派，这一着还是要学的。”

及至1945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获得巨大成功，中共实力空前壮大，“小指头变成了拳头”（毛泽东语）。在七大上，毛泽东提出党的干部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其中“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他还告诫同志们，对暂时的同盟者要“忍一口气”，应看到其“有用的”一面。

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升级，中共需要对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有一个说法。这便产生了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政策。确如前述胡乔木所说，毛泽东于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曾把这种将分析对象细细区别，层层剥离，“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的做法，形容为“剥笋”。显然，其依据仍然是“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的列宁主义原则。

1947年底，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共革命胜利在握，毛泽东指示党内，对于自由资产阶级右翼，现在虽“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但要“一步一步地

抛弃他们”。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相互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实际上也是“两类矛盾”的理论雏形。

毛泽东在上述那段话里说了一个限制语：“在现阶段”，这是因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已经将民族资产阶级确定为下一历史阶段的革命对象。1952年6月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可是民族资产阶级曾为中共昔日的盟友，所以随后进行的革命变通成了和平的“赎买”。

在顺利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又专门讲了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说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匹没有，粮食没有，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毛泽东在这里说清楚了“两类矛盾”理论的政策用意以及贯彻“这个路线”的阶级斗争大背景。

“两类矛盾”理论在建国后的实践

1957年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直接背景，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出乎意料的顺利，只用一年多的工夫，这个关系亿万人民身家利害的大革命，就在农民及手工业者踊跃“入社”和资本家们“敲锣打鼓”之中完成了。它证明中共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政策实在高明。这给毛泽东以巨大的鼓舞和自信。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可能完全风平浪静，各地也有一些负面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认为这些社会矛盾问题主要由于干部的官僚主义作祟，解决的办法靠整风。于是他力排众议，提倡“双百”方针，提倡人民内部的批评自我批评，乐观地期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造成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

然而，事情起了变化。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话音刚落，整风“鸣放”中就冒出了对执政党刺耳的声音，有人甚至提出要和中共“轮流坐庄”，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继而一场有伤和气的反击在全国展开，是为反右派斗争。

从和风细雨讲“内部矛盾”的春天，到急风暴

雨讲“敌我矛盾”的夏季，人们都说这是“大转弯”，可是对于了解中共党史的研究者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弯子。

1957年7月，在有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青岛会议上，毛泽东语带愤慨地说，历史上包下一批王八蛋，一路来敲锣打鼓，拥护了七年是假的……估计到他们随时有一部分会叛变，但历来都没有找到暴露他们的办法。现在找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加上整风，右派分子的头子就翘尾巴，反共反社会主义了。他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宣称：“共产党看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9月23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说：“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右派的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反右派斗争的事实证明“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

毛泽东在全会上说，人民内部包括三个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存在这三部分人之中，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是阶级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所有制解决了，政治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此前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

毛泽东最后总结道，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来是非常正确的。他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建国后他就强调的“纲举目张”的说法，就是抓社会主要矛盾的意思。

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问题情况更加复杂和严重。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中国化所遇到的最突出，也是最困难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马、恩原来设想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军对决的阶级斗争中，“小资”是一个不断分化、消亡的阶级，其并不占有重要位置。恰恰是列宁主义，把小资产阶级问题提到了论述的核心。当然，这与马克思主义被移植到落后国家的历史命运直接相关。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说：“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这段语气强烈的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之一。

列宁继而说到这种阶级斗争的特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与俄国相比，中国的经济及社会分化更落

后，小资产阶级问题也更严重。首先它人数众多，占了人民内部的“绝大部分”，有形容如“汪洋大海”。其次它既是革命的主要联合对象，又与无产阶级“两条心”，且“最容易变”。（毛泽东语）更要命的是，中共“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通过研读列宁的书，毛泽东认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在思想上实质是一家。

早在延安时代，他就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就是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最后分界在哪里呢？在于立场，在于“对待革命的态度”。“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决定立场和态度的是政治思想。

所以“思想改造”是中共自建党就十分重视的课题，而“思想斗争中发现反革命”（毛泽东语）则为党内斗争的一种常见模式，由于它说到底属于“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问题，使得这种斗争历来表现得十分严酷。

建国后毛泽东仍警告党内：“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的泥坑。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其依据亦即列宁主义关于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的理论。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看上去颇有新意的观点，说我国社会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加上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右派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就是资本家、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里头的大多数。研究者一般认为，毛泽东重新肯定国内还存在两个完整意义的剥削阶级，特别是把知识分子划入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他晚年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理论误区。

毛泽东何以要把剥削阶级分作两个呢？在随后的武汉会议上，他说得很清楚，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即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右，他们是坚决反共的，是今天的蒋介石、国民党；另一个剥削阶级是右派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中间分子，又反共又不反共，看谁力量大就跟谁走。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两条心，半心半意的。要团结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另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

原来，所谓两个剥削阶级，是根据人们政治态度的不同来划分的。这是毛泽东曾经用过的对敌斗争策略，其与当年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与作为中间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政策完全出于一辙，这也正是他构建“两类矛盾”理论的框架。

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毛泽东提出“两个剥削阶级”，是想给“人民内部矛盾”作一重新区划，从而继续把他的对敌斗争策略思想贯彻下去。“团结一个剥削阶级”的目的，正是为了“孤立打倒另一个剥削阶级”。

阶级斗争扩大化证明“两类矛盾”理论不成功

当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成为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课题，“两类矛盾”理论的操作要领，便转向了如何拿捏矛盾性质的转化。前已述及，在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中，关于“转化”的学说，是其亮点所在。判断“转化”的时机，首先取决于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其次就要像厨师掌握“火候”一样，只能凭操作者的经验感觉了。即便如“两类矛盾”理论本身，在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它既可以作为鼓励“百花齐放”的方针，也可以视作“引蛇出洞”的工具，翻覆之间，则由领袖人物的意志掌控。

反右派斗争之后，一些曾被动员“帮助党整

风”，却终于“落网”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阳谋”说耿耿于怀，殊不知作为阶级斗争的策略，其亦非为毛的独家创造，且怎么说都有道理。

当年的说法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关键仍在于有关人们的政治态度，就是所谓对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共的领导“心服”与否的问题。态度问题也即思想问题。俗话说，人心隔肚皮，人心叵测。阶级斗争一旦进入到这一层面，就变得不像唯物史观所阐述的那样有实在的物质可据了，其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面对社会上特别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大量的思想言论问题，如何划限定性，以挖出敌人，难度可想而知。

思想的外壳是语言文字，其又分为私下（如私信、日记）的与公开的。前者少掩饰，政治立场比较暴露，从中可以发现反革命（中共在历次内部“肃反”中，都特别注意私信、日记等不公开思想载体，屡有斩获，后来逮住“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功归于此）；而对于后者，即公开发表的语言文字，则需要一种“嗅觉”。

在反右派斗争后，《文艺报》推出“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特辑，毛泽东在编者按中说，这些文章“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

《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三八节有感》的作者丁玲等人，都是中共早期党员，他们的文章发表在延安时期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内含对革命队伍中某些问题的批评意见，并无赤裸裸的反革命言论，当年分析、定性这些文章，据说也主要看其批评的“用心”是善意还是恶意。善意的批评是“和风细雨”式的；恶意的批评则是“冷嘲暗箭”式的（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将延安生活中首长吃小灶和穿斜纹布衣服诬蔑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便是典型）。

然而仅凭一篇文章或一通讲话，仅凭其遣词用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差异，就判定一个人的所谓善恶用心与“矛盾性质”，是极不可靠，甚至是很荒唐的。

后来历史事实证明，王实味、丁玲等人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在写作时或因思想一念之差，或因情感一时冲动，出言不慎便铸大错，遂被当作“敌人”，断送一生。

此外，对文字作品做出“定性”的一方，其思想情感的变化，往往也可以左右判断，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1956年青年作家王蒙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人指责有攻击党的嫌疑，毛泽东知道后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王的作品反对官僚主义，应该受到支持。可是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变化”，他再也无心过问那位被划成“右派分子”、遣送新疆劳动改造的王蒙了。

在反右派斗争中，为了解决敌我难辨，毛泽东临时制订出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这一内容后来补充进了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中），“六条标准”即：“（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应该说，“六条标准”概括的相当全面，政治上也条条重要，但最大的缺陷是只有一般的原则，而无具体的解释，操作起来没有确凿可断的衡量标准，这就为“上纲上线”的做法提供了大量空间。

在以往中共党内斗争中，“上纲上线”虽能使人提高认识，“触及灵魂”，亦即所谓思想批判从严，可是用它来做组织处理的依据，就往往要搞错。

于是“六条标准”越全面，其笼罩的社会生活内容就越广大，其造成的结果就越带悲剧性——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据不完全统计，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的人超过了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十分之一。

列宁在论述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时，强调其“自发”倾向、个人主义等思想腐蚀，可以导致“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反右派斗争中，个人主义是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来挖掘的。丁玲在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写给上级的“思想汇报”中说：“目中

无人，心中无党，一切只有‘我’……尽管党再三警告，我却不知悬崖勒马。真所谓飞蛾扑火，至死方休，不放弃‘我’就不能有所觉悟，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残酷和无情的！”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更提出“要斗私批修”，开展全民的“狠斗私字一闪念”运动，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执行列宁教导、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和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努力。

可是，所谓“个人主义”、“我”、“私”，几乎人人心中都存在！这岂不是等于“人民内部”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一条通向“敌我矛盾”之路？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造成“史无前例”人间浩劫的一个原因。

据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文革”造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毛泽东也承认搞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困难在于敌我难辨，他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

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我国社会造成的严重恶果，证明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历史阶段中，“两类矛盾”理论的实践是不成功的。

通过以上历史考察，我们看到“两类矛盾”理论确属“以阶级斗争为纲”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体系。

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其本身就是一个包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概念。由于政策和策略的运用，人民内部矛盾又与敌我矛盾相对而言，两者互为依存，且互为转化。一提人民内部矛盾，背后就必然有敌我矛盾的影子存在；两类矛盾转化的根据，则主要决定于有关方面的思想和态度，这里面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本来就不易把握，难以操作。

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元帅之后，毛泽东用“两类矛盾”理论来解释“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他说：“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在这一段话里，如何“及时适当地”解决矛盾，说得并不很清楚，但有一点告诫却十分清楚，即“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是否“适当”，决定矛盾性质是否转化。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斗争的性质，既然常常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和“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同上引，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语），那么，各级党政单位在对敌斗争上所采取的政策，必然是坚决的毫不妥协的；对思想、态度问题，也一定是“上纲上线”和“从重从严”，如此才能体现革命立场的坚定性。而在对立面的一方，只有就范、认罪，才能说是态度好，更无人敢就事论事地替其作辩护。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遭遇就是例证。于是“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情况在当时社会便多有发生，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很容易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阶级斗争扩大化就在所难免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然而，“两类矛盾”理论却还未及在思想体系上认真地加以分析，以决取舍。

正是“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这样的观点，往往成了一些地方动辄用“对敌”斗争手段处理民间矛盾和民事纠纷的借口，酿成不可收拾的群体性冲突事件，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后果。笔者建议：放弃使用“两类矛盾”的旧理论，在面对和处理社会矛盾问题的时候，应该以事实为根据，以宪法法律为准绳，在切实保障公民各项基本人权的前提下，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按什么性质问题来公正地处理，既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运动，也不搞所谓“区分两类矛盾”及“落实政策”那一套，使以法治国常态化、制度化，以利于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卢作孚最后的日子

○ 赵晓铃

给女儿的信

1952年1月20日，卢作孚给远在上海的小女儿国仪写了一封回信，国仪来信，说准备回家生孩子，征求父母意见。父亲的信是亲切的，说母亲将会为女儿照顾孩子，还说：

我所恳切告诉你的，是今后任何事情，都应照此次计划那样，有决定以前的从容思考和从容商讨，才能避免困陷在进退不得的境地，影响不仅及于工作而已。

似乎写信人的心情有些难以言说的东西。卢作孚对“困陷在进退不得的境地”有体会吧，以至反复地这样叮嘱心爱的小女儿。年轻的女儿万不会想到，这竟是父亲给她的最后一封信！

1952年1月27日，是这年的春节。这天，外地工作的孩子们没有回家过节。卢作孚本人也没在家过节，他到丰都去了，不久前民生公司的一只轮船“民恒”在丰都沉没，他去了事故现场。

1月28日，卢作孚乘飞机去北京“商讨要务”，30日即飞回重庆。

“华益，我对不起你！”

1952年2月5日下午，民生公司原业务处经理邓华益来到民国路20号卢作孚住所，与卢作孚做了一次长谈。

邓华益比卢作孚年长六岁，出身贫苦，由教会教育长大，年纪轻轻就做了英商白理洋行买办。1927年，在全国反帝高潮中，他买下白理洋行两只轮船成立自己的九江轮船公司，一跃而为重庆航业界老大。

当年民生公司要联合川江华资轮船公司，共同对抗强大的外资轮船公司的竞争，因各家华资公司互不信任疑虑重重而难以联合，邓华益以当时实力最强的九江轮船公司加盟民生公司，自己进民生担任航业部经理。这一举措，对重庆航业界“统一川江”的运动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邓华益主持的重庆轮船业同业公会，努力维护航业市场秩序，维护轮船公司的共同利益。公会尤其注意捍卫我国航权，抗战时期，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在川江营运，公会向政府呈请制止。抗战胜利以后，一些外国轮船公司在我国营运，公会代表轮船公司向政府提出，要求海关查处。1947年，中国民营轮船公司认为，“中美商约”侵犯中国轮船公司利益，同业公会出面反对中美商约签订，对此，当时的政府作出积极反应。

1949年4月6日，重庆市轮船业公会发出通电，吁请交战的两党政要，能够维护长江航运，给船员及其家属一条活路。在通电上署名的，是重庆轮船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邓华益。

邓华益这样一位在公司历史上的有功之臣，既为大股东，又是高级管理人才，重庆航业界的权威人物，在1951年3月28日，竟被民生公司以“年老体弱”为由“资遣”，邓家老小被勒令搬出民生新村。

当时民生公司的有功之臣，高级管理人员，受到迫害和凌辱的，还有相当一批。已被董事会任命为代总经理的郑璧成，重庆解放到不一个月就被扣押，虽保释出来，也不允许再在公司工作。更有民生公司第一条轮船“民生”轮的第一任经理、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在厂前江滩上被当众枪毙（陶在80年代平反），公司董事石荣廷也在镇反中被冤杀（石在80年代平反）。民生职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
特 约 刊 登
回忆久久为您撰写回忆录
咨询热线：400-653-6199

工中被资遣，被管训者更多。

邓华益日后回忆道：从不送客出门的作孚将他送到门外，几次说："华益，这些年来我对不起你！"沉重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五十余年后，卢作孚幼子卢国纶写道，"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这一天，民生公司的"民铎"轮在长寿附近失事。

卢作孚

含泪做检讨

1952年2月6日，上午八时半至十二时，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卢作孚第一次当众做检讨。

卢作孚的这个检讨，从记录看，是十分认真而严肃的。一开头就沉重地说，"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一句话未完竟落下泪来。

在这个检讨里，卢作孚简单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是一个知识分子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一生，他尽可能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来描述自己，表现了他与新政府的合作意识，也可理解为他已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他提到在川南办教育时，曾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共事，检查自己报国的道路选择曾受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影响。卢作孚一生自奉甚薄，已为世所公认，可是却检讨自己，连生病住中央医院都以为太享受了。他对自己被视为资产阶级是难以接受的，不光因为在当时资产阶级已被视为可耻的另类，更因为卢作孚一生提倡"造公产，不造私产"。他似乎有些愧疚，又感到很大的委屈。他没有掩盖他的情绪——对郑璧成等一批懂航运懂船的管理干部被捕或被清洗的伤感与痛苦。在检讨的过程中，他数次流泪，甚至泣不成声。

在此之前，民生公司襄理以上的干部会，有公股代表参加，发言很集中，已将矛头指向卢作孚，说当前公司的困难和矛盾都是他造成的。有一种意见即是战后大量借外债是盲目扩张。这样重大的决策，关系到民生公司在中国二战后的大政方针，必须由董事会通过，公司高层管理，都是相当清楚的。当初，整个中国企业界都向往着抗战胜利后的大发展，利用外资发展生产，增设航线，是有远见的举措，大家都没有反对意见。现在，因为政治的原因，外债未能及时产生效益，反成负担，人们却把责任都推到卢作孚身上。

海损与亏损

这天下午，卢作孚去了"民铎"失事的现场。两年来，政治运动愈演愈剧，事故越来越多，据《民生公司史》统计，1950年至1952年8月，发生海损事故502件，死亡232人，大大超过了战争时期。后来公股代表张祥麟在向交通部的汇报中，说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前"事故平均每二天一次"，与这个统计大致相符。

航运企业家都是爱船极深的，有一次遇到海损沉船，一向沉着理性的卢作孚竟会在办公室里号啕大哭。

民生公司一向重视人的管理教育，长期以来不断总结改进，已有相当成熟的制度，卢作孚及一批高层管理干部，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实为首屈一指。更有年年的股东大会，必须要向股东们做出报告，并接受监事会的监察。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民生公司，在生产业务上，财务上，在安全航行上，不可能长期出现大的漏洞。

在全国性的大规模战争已结束的时候，民生公司却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事故和巨大的损失，到底是什么破坏了正常的管理秩序？为什么管理干部再不敢管理，是什么伤害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回到公司，卢作孚立刻找到负责财务清理的公股代表欧阳平，算公司二月份（疑为一月份）的

收支情况。民生公司在整个1951年已损失339.7亿余元，在1952年一月只可能有更大的危机。

算过以后，卢作孚一掌击在桌上，叹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把门关了来搞‘三反’，搞了再开门！”

1950年3月，卢作孚通过民生公司驻京办事处主任何廼仁向周恩来提出公私合营，请求国家银行贷款的同时也制定了还款计划。计划只要民生公司生产正常，到1951年7月，便可开始偿还债务，当年可还700余亿元；计划1952年偿还1000余亿元欠款后，还有400余亿元的余额。以后按约分期偿还加拿大外债，同时为国家作出贡献。

然而，在民生公司执行公私合营过渡办法期间，不但还款计划成了泡影，还新增了800亿元债务。

1952年2月7日上午，卢作孚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去，见到了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时至中午，和卢作孚一同来的胡子昂在机关门口等着他一起乘车回去，却久不见他出来，胡子昂便进去找他。有人告诉胡子昂，卢作孚先生和邓小平书记一起吃午饭呢。胡子昂就自己回去了。在饭桌上，卢作孚和邓小平会谈些什么呢？

在刚刚过去的1951年，民生公司人与生产的损失超过战争年代，公司危机越来越严重，卢作孚1950年8月即与交通部部长章伯钧签订公私合营协议，至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尚未批准。

那时，中央财经委员会已决定，民生公司的民主改革不彻底，就不给贷款。民主改革即是清理敌人的政治运动，民生公司的民主改革不彻底，已被重庆新华日报点名批评。在新一波民主改革运动里，卢作孚被任命为民主改革委员会主任。卢作孚这时应该明白，他做这个主任，什么也决定不了，不过是要他出面表态，用他的口来宣布在公司里谁是敌人，谁是分子，以及对他们的处理。在他辞世以后，这个事情落到了童少生头上。以至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还不能原谅童少生。

公股代表“引火烧身”

1952年2月8日，这是卢作孚生命中最后的一天。

当年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张祥麟说，“三反”运动开始后，在公司大楼里走道的墙上，贴着一张一张的小字报，内容是质问公股代表为什么不下来，不到工人中间来？公股代表为什么没有贪污？他手指着自己说，就是不相信我没有贪污的意思嘛。

“有写卢作孚小字报的吗？”

“没有，没有提到卢作孚名字的。”他迟疑一下，又补充说，“也可能有，我没有看到。”

“卢作孚看小字报吗？”

“不知道。应该也看到了吧，因为他上下班总是要经过那里嘛。”

1952年2月8日上午，卢作孚经过贴了小字报的公司大楼走道，去参加公司召开的“‘三反’坦白检举大会”。“‘三反’坦白检举大会”，是档案中一份《关于卢自杀的报告》里的提法。张祥麟回忆，这个会是“三反”动员会，他在会上做检讨，也是做动员。我过去采访的一些老民生职工都认为，这个会是当时公司工会安排的，但从张祥麟的回忆来看，他本人是事先有准备的。他说，会上，有人上台向他提意见。除了发言人上台外，其余都坐在台下，卢作孚坐在台前一只沙发上。台上发言后，台下自由发言。这时，卢作孚的服务员，19岁的广东人关怀坐着提了几条意见。

关怀提的什么意见呢？

张祥麟回忆，“在北京，卢作孚住在东安市场一个楼里，我们去和他谈工作，谈事情，一起吃饭，吃烧饼，豆腐脑。关怀就是说的这个，但都没有提卢作孚的名字。这就是浪费。我就检讨，我说开会，比如股东会大请客是浪费。在北京还一起去洗澡，一起到万寿山逛了一回，和卢作孚一起去的。当时，卢作孚说，‘这些都记在我账上’，我也没有提他讲的这个话，只检讨说是公司浪费了。”

有回忆文章认为，关怀上台批判，是卢作孚至死重要原因。

张祥麟说：“那个服务员关怀嘛，他没有上台，他坐着提意见，大家都是坐着提的。关怀是从卢作孚家里搬出来了，还有什么就不知道了。那个会先是台上发言，然后叫大家提意见，大家讲时，关怀也讲，没有点卢作孚的名。卢作孚就

在那坐着。公方代表就我和欧阳平在场。据我了解，散会以后，卢作孚还找了关怀，在办公室里讲他，我们花的自己的工资，有什么错误呀？”

关于这天上午的会议，卢作孚长子卢国维的描述是这样的。

“民生公司召开以市工会联合会和公司工会为主力的‘五反’动员大会，公股首席代表张祥林（原稿如此）（兼党委书记）作动员报告并进行所谓引火烧身，说自己跟随卢作孚去北京开会，还想请卢买一件皮大衣，虽然最终没说出口，但是差一点中了‘糖衣炮弹’。接着父亲的随身通讯员关怀一个箭步冲上台去，大声嚷着要揭发公股代表的‘受贿’行为。所举例证竟是前不久公股代表数人同总经理（即我父亲）一道去北京开董事会（私方董事居住北京者较多）期间，总经理（代表私方）请吃便饭、看京戏，同去理发代付钱。当时在场的同仁见父亲面色难看，知其心里毕竟难受。名为揭批‘索贿’、‘受贿’，人们自然会联系到‘行贿’。在‘群情激昂’的会场上，首席公股代表优柔寡断不知所措，散会后也没设法对当事人做好‘工作’，启发开导使其放心。全然忘记了中央确立的对民主人士的保护政策。”

会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卢作孚对关怀说，讲话要实事求是。这个年轻的服务员从广州过来专门照顾卢作孚，卢作孚关心他，教他学文化。让他做一些重要工作。就在这天早上，一直住在卢作孚家的关怀从家里搬出去了，现在，这个年轻人竟然当着他的面，当着大家的面这样不实事求是地“提意见”。卢国纶说关怀是“有恃而无恐”，关怀所恃为何呢？

张祥麟还对我们讲了这样一件往事。

张祥麟提出，要香港分公司为自己买一只杯子。（我一直没有搞懂，是什么杯子要到香港去买？）不久，香港分公司经理杨成质将杯子送到重庆，同时送上了账单。童少生问卢作孚：杯子是张代表要的，是不是送给他（不要张付钱）？卢作孚回答：你要送，人家要不要呢？最后，买杯子的钱是在张祥麟的工资里扣的。张说，“卢作孚这个人很会说话，不说送，也不说不送，而是反问童，‘人家要不要呢？’”这事是童少生后来告诉他的。

张祥麟现在对我们讲这事，是为了说明卢作孚不会行贿，还是要说明卢作孚滑头呢？他当年提出要买杯子却不先付钱，是想贪便宜，还是对卢作孚进行试探呢？

这位老人对卢作孚的态度是相当微妙的。五十五年前的那个会上，他用不存在的皮大衣来“引火”，是要“烧”谁的身？不论他是不是真有想要皮大衣的念头，却引出人家确有“糖衣炮弹”——以至自己差点中了“糖衣炮弹”的想象！可以肯定，如果那只杯子由公司赠送张代表，在1952年2月8日那天的三反动员会上，就会有一枚看得见的“糖衣炮弹”了。

昔日爱将形同陌路

会议结束以后，副总经理童少生也在办公室里，他没有和卢作孚说一句话。

当年，童少生继承哥哥童季达出面主持的美商捷江轮船公司，与民生公司是业务上的对手，他任董事长的国货介绍所的货物却必定交给华资的民生公司来运。卢作孚还常常到国货介绍所的朝会上去做讲演，宣传用国货，支持几位青年实业家的爱国义举。

国货介绍所成功了，捷江公司却在川江的竞争中倒闭了。卢作孚看重童少生的才能与爱国思想，请他加盟民生公司。童少生敬佩卢作孚，以为卢先生“作事认真有远见刻苦耐劳事业心重”，所以“一点也没考虑的就参加了民生公司”。

1943年，童少生即成为民生四个处务经理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1944年，卢作孚第一次到美国和加拿大，童少生即与之随行，并实现多年愿望，在美国学习航运管理。以后童少生又三次奉派赴美国、加拿大，参与了卢作孚在美国考察和在加拿大借款造船的决策和实施的全过程。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业务重心转向沿海，成立上海区公司，以后，卢作孚向董事会郑重推荐，任命童少生为上海区公司经理，公司副总经理。民生公司与金城银行合办太平洋轮船公司，童少生兼任太平洋轮船公司经理。在民生公司，人们将童少生视为卢作孚的爱将，前途无限。

少生此时已参加民主建国会，在前不久的一份自传上，他还表示了对卢作孚先生的敬佩之情，认为自己的做事为人深受卢先生影响。

但是现在，他俩同在一办公室里却形同陌路。

此时，卢作孚应该知道，童少生的轻慢与冷漠，已不是他一个人的态度。民生公司已被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弄到人心惶惶，劳资分裂，他一向引为自豪并努力维护的和谐奋进的公司灵魂已然消失。这个时候，卢作孚还惦记着轮船。下午，他在秘书课仔细地交代了民铎轮的施救办法。

致命的延误

傍晚，在回家的路上，卢作孚在离公司不远的小十字路口，遇见了郑璧成的女婿陈克。陈克记得很清楚，卢伯伯那天对他说了一句话："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岳父。"郑璧成被迫离开民生公司以后，断绝收入，一直由卢作孚以个人收入接济。陈克当时没有意识到，卢伯伯是要陈克这个晚辈在今后代替自己照顾老友呢。

卢作孚回到家，天还没有黑，五岁的孙子卢晓雁觉得爷爷今天回家真早。

关于1952年2月8日晚上卢作孚家里发生的事情，卢国维的记述最为详细。

"当天下午母亲因去妇女互助会（成员多是工商业者家属）开会学习，会后又去菜园坝探望三弟一家。城里家中只有我们的五岁男孩以及厨工、保姆（亲戚）各一人。下午五时许，父亲由公司回家后叮嘱厨工、保姆说他很疲倦，需要好好睡一下，招呼孩子勿吵闹，也不要唤醒他。说完即进入卧室关上房门去睡了。傍晚母亲从三弟家回来，听说情况后问睡了多久，闻知约摸一个小时，就关照让他再睡一会儿。这样又过了半个多小时仍然没有动静，方觉得不对，立即去推门。这才发现里面给闩上了。同大家一起大声敲、喊也无反应，母亲紧张了，马上嘱厨工从窗口翻进去开门。母亲一行进房后见父亲仰卧床上，呼吸极度微弱。床头柜上有两个空小瓶，母亲一看就知道那是安眠药瓶，其中一个是平日为帮助睡眠用的，只盛有少数几片，另一瓶是深藏在一只衣箱里的。果然那只衣箱已打开，里面的衣物也翻乱了。这个急迫的检视过程只经历了一、两分钟。此时母亲一面关照保姆把两个孩子带出去，一面按捺着万分惊恐的心情自己叫电话到民生公司总经理室，请他们派人带医生来急救。差不多过了二十分钟，才见童少生带了一个公司职工医院的医生从距离不过一公里的总公司（医院就在公司大楼旁边）前来，却未见有救护车跟随。医生问明情况和按脉听诊后，只注射了两针强心针，实际上新近更名为市立二人民医院的仁济医院距离父母寓所（金城银行物业）不到两百米。该院有重庆市第一流的专科医生，设备也好，民生公司与其长期有特约关系，父母亲与该院几位老医生都熟识。童少生同这家医院也多有往还。但他明知母亲正处于惊惶失措、焦心如焚，自己完全拿不定主意的关头，却不考虑联系医院，只是望着公司的医生给父亲打针，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一再延误时机，让本来可以抢救过来的父亲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那样紧张的关头，为什么完全可以避免的致命的延误却不能避免？我采访过的好多人都如卢国维一样，认为是童少生的责任，甚至认为他是有意延误。直到采访了张祥麟，并看到相关档案后，我才感觉事情恐怕不是那样简单。

张祥麟回忆：

"上午（'三反'坦白检举会上）我检讨，也是做三反动员，边动员边检讨。下面还有欧阳平（也要做检讨），午饭后，我就去动员欧阳平，做工作，叫他上去表态，检讨检讨嘛。他又是民主党派。我到他家里去了，在他家吃的晚饭。从欧阳平家里出来，回到民生大楼，就接到童少生电话，说卢先生出事了。我想卢先生能有什么事呀？就去他家里，看到卢先生躺在床上，旁边有一个瓶子，还有个医生。我问医生有没有办法。医生说没有脉搏了。我马上找陶琦，陶琦打电话给市委书记张霖之，张霖之也派来了医生，但是晚了，脉搏没有了。"

张祥麟说，当时，卢作孚的妹夫刘华屏也在现场。

这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是，卢作孚夫人蒙淑仪的判断——卢作孚服用了过量安眠药——没错。她的第一反应是往民生公司总经理室打电话。这时离卢作孚服安眠药已有一个小时以上，待童少生得知消息，公司已下班，他找到医生，然后一起到达民国路的卢作孚家。这个医生抢救措施无力，只注射了强心针。卢国纶回忆中说，在场还有一位护士，是护士提醒医生，卢先生服用了过量安眠药。童少生只是再给张祥麟

打电话，等张祥麟从欧阳平家回到公司，接到童少生电话，然后赶到卢作孚家，已失去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后来有人对童少生提出质疑，在找到张祥麟之前，为什么不主张立即将卢作孚送往距离仅200米的仁济医院？眼见卢作孚的生命一点点流失，为什么童少生竟然不能基于常识果断做出一个简单的正确决定！

以童少生在新政府领导下生活的经验应该知道，卢作孚自杀，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他必须首先请示公股代表，公股代表张祥麟到场时，卢作孚还有生命迹象，在这以后的几十分钟里，张祥麟也没有想到要将生命垂危的卢作孚送到近在咫尺的医院抢救，而是忙着向并不懂得抢救，当时又很难立即找到的上级领导请示，然后静候市委书记从更远的地方派出自己的医生！真的是“优柔寡断不知所措”！

卢作孚停止呼吸了，蒙淑仪此时已知关怀当天在公司大会上的表现，深感悲愤，禁不住说了谴责关怀的话。童少生立即说：“你要站稳立场呵！”

童少生这话，也可以理解为是好心提醒蒙淑仪，由此也可知，童少生的所有表现，都是为了“站稳立场”。后来的事情表明，民生公司所有职工，甚至卢作孚的亲属及子女，都被要求“站稳立场”！

一份“关于卢自杀的报告”写道：“（卢作孚）二月八日晚六点服安眠药片，八点多家人发觉，十一点我们得知，正拟急行抢救，因服毒过重，十一点四十分自杀逝世。”

当年只有五岁的卢晓雁记得，那天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人他认得是民生公司的。有人把家里的箱子柜子都用纸条封起来。

遗嘱

2005年，卢作孚幼子卢国纶在公开的文章里写道：

“父亲留下的简单的遗嘱，是写给母亲的。遗嘱用钢笔写在一张毛边信纸上，字迹非常清晰。这张遗嘱，事后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人员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亲眼见到这份遗嘱的，仅有包括母亲和我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当时我根据回忆记录了下来，这份遗嘱的内容是：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这里有必要对父亲的遗嘱逐条做一下说明。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指的是我们家1948年从南京搬回重庆，我二姐卢国仪主持搬家时，误将借用民生公司的两件旧家具一起搬了回来，当时我们家除这两件误搬回来的旧家具外，并没有其他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后二姐偶然得知此事，便在信中告诉了父亲。父亲非常在意这件事，特别于1952年1月20日，亦即去世的18天前，在写给我二姐的回信中首先提到此事：‘一月九日信接到。为南京破旧东西写信给罗昌扬，尚未得回信，正准备再去信。希望能得一确实内容，以便归还或赔偿’（罗昌扬为当时民生公司南京办事处主任）。父亲一生大公无私，两袖清风，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临终时仍记挂着借用公司的家具，特别首先叮嘱母亲一定归还。

“‘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父亲在这里提到的股票，主要是指由民生公司董事会奖励给父亲的、从未参加过分红的一点干股。父亲去世后，母亲遵照父亲的嘱托，将此股票寄给了在武汉的民生公司董事会。但民生公司董事会按照国家政策没有接受，后又寄还给了母亲。

“‘今后生活依靠儿女’，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职业，自然也没有收入。父亲虽然是著名的实业家，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而此时，我们兄妹已陆续就业，因此父亲才叮嘱母亲今后生活依靠儿女，为母亲以后的生活做了安排。”

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卢国伦写道，“这表现出父亲对自己所担任的政治职务负责任的态度。”

另一位知情的老人也对我谈到证章，他解释说：“还要退还证章，就是胸前戴的那种椭圆形证章，到西南军政委员会时作出入证用。”

当时我说：“卢老先生想得很周到，是怕证章被他人使用吧？”

“是这样，但也是寒心哪。”

我有些惊讶，旋即明白，与这位八旬老人对视，他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送行与痛哭

1952年2月9日上午，一年前就被民生公司除名的原民生公司人事部副主任周吾达正在牛奶公司上班，接到原来同事的一个电话：卢先生死了！周吾达惊恐不已，在办公室里，不敢表露出任何情绪。等到下班后，他绕到民国路卢作孚的家，看到门前冷冷清清，不像是办丧事的样子。他不敢进去了，也不敢在门前久留，便转身离去。走到附近的罗汉寺，他遇见一位民生公司职工。这位昔日同事对他说："这个运动还要深入，卢作孚耍死狗不得行！"

卢作孚的遗体停放在民国路家里，没有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仪式，没有挽联。前来吊唁的人很少。民生公司的职工们大都如周吾达，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只能在心中为卢先生送行。

1952年2月9日下午，民生公司召开了董事会，董事们因卢作孚身后萧条，决定补助卢家1000万元（新币1000元）做丧葬费，这当然并不是特殊的照顾，与前些年去世的彭瑞成相比，这些补助是相当微薄的。

10日下午，民生公司举行课长以上的行政干部会议，与会者除了两个人以外，其余的人，包括童少生在内，均痛哭失声，以至民生公司党组织向上级汇报时，说这个会"变成一个哭丧会"。但是，后来所有的回忆录里，都听不见记入《内参》里的这些哭声！

新华社向北京反映情况的《内部参考》里特别提到童少生的哭。此一哭，很可能是童少生性情的最后表露，自此以后，他谨小慎微。后来，童少生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的左派，历任长航局副局长，四川交通厅厅长，四川省副省长，民建中央副主席。

卢国维写道："民生公司原董事长郑东琴老先生（东翁）和一些高级职员都来悼念和安慰母亲。"

2月11日下午，卢作孚的棺木盖上了。这时，邓华益来了，还带来了他的儿子邓安澜。邓华益要求将棺木打开，命儿子跪下，待十二岁的邓安澜给卢伯伯磕完头，棺木重新合上。邓安澜很多年以后还记得，卢伯伯家气氛紧张，好多人很警惕地盯着他与父亲的一举一动，还不时耳语。

卢国纶回忆，"2月12日，是父亲出殡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关部门做了周到的安排，送葬的队伍人数很多，灵柩从民国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龙门，再由父亲创办民生公司时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载运到南岸"。

对于这个细节，卢国维没有用"送葬"一词，他写的是，"灵柩运送去南岸民生村旁墓地安葬时，公司职工和船员数百人自发地排列在望龙门码头路旁目送，频频向家属点头、挥手招呼，望见他上了'民生'轮船，渡过长江并到了南岸，直到看不见送灵队伍时才散去。"

卢国纪写的是："当我们护送着灵柩到达长江边时，'民生'轮的船员们默默地站在岸边和船头，照应着灵柩上船。渡江以后，又照应着灵柩下船，然后默默地站在船舷边，目送灵柩上岸远去。"

老民生人陈代六说，那时大家都想去送卢先生，就是去看看，没有人讲话，不敢讲。那么，就只能是"目送"，而且是"自发"的了。

民生轮在江面上默默驶往对岸，突然，江上有轮船拉响了汽笛，不知是哪一条轮船上的职工，自发地以这种方式为卢先生送行。顿时，蒙淑仪和孩子们热泪沾襟。

另一只轮船上的职工，竟自发地为卢作孚先生举行了追悼会！那是一只老式的钢壳小轮船，它的名字叫"生存"。

卢国伦的回忆中还说，"2月11日，我二哥卢国纪一家从北碚赶回重庆，其他兄姐或不及赶回，或尚不知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未能回来为父亲送行，至为遗憾。"

卢作孚长眠在长江边民生新村旁的小山岗上。三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大女儿国懿从海外回来为父亲扫墓，他的孙子卢晓雁和朋友们在那一带荒草丛中寻找，却难寻爷爷安息的墓园。又过了一些年后，人们在北碚为卢作孚捐资修墓立碑，不少如周吾达这样的老民生人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钱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有了现在的作孚园。■

（作者单位为重庆市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黄　钟）

1949年前后中美错失建交机遇

○ 高 放

《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发表的宋恩荣、张睦楚的《1950,晏阳初在去留之间》一文(以下简称《晏》文)说:“从1950年起,一股反共反人民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兴起。”“在这种情况下国务卿艾奇逊电复司徒雷登,要求他:‘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这表明美国政府决意在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最终选择关上了与中共谈判的大门。于是司徒雷登立即被召回国。”事实上司徒大使被召回国是在1949年8月2日,而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煽动反共反民主浪潮是在1950年2月之后。可见司徒大使被调回国在前,麦卡锡主义盛行在后,这两件事不是发生在同一年。

1949年中美第一次错失建交机遇的原因

既然司徒大使被急调回国与麦卡锡主义盛行无关,那么中美错失建交机遇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原来美国政府在1949年初已经预感到中共即将在全国取得政权,于是想拉拢中国,不希望新中国完全倒向苏联一边。所以1月26日各国驻华使馆接到通知说中华民国政府将从南京迁往广州,要求各国驻华大使随行时,连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都跟着走了,唯独只有美国大使奉命留在南京,要与中共代表接触。司徒雷登按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示,曾经通过其私人朋友罗隆基等人向中共转达“美国可以分期贷款60亿美元帮助中共建设”的意愿,其条件是中国不倒向苏联一边。我方得悉这一情况,4月24日南京解放后,当局任命司徒雷登的学生黄华为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5月6日司徒雷登就派其秘书傅泾波到南京军管会要求会见黄华处长(他们二人曾经是30年代燕京大学同班同学)。此后一个多月间黄华与司徒雷登会谈三次,双方都表示希望将来美国政府能够同中共政权建交,中美两国人民能够友好往来。本来6月28日黄华已向司徒雷登正式转达了中共领导人邀请他到北平访问,并且许诺他将与毛泽东、周恩来会晤,直接交换对发展中美两国关系的意见。他得此喜讯,心中无比高兴,6月30日他当即向国务院禀告此事,并且希望尽快下达指示。不料也正是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这样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美国国务院得知中共宣告“一边倒”的声明后,感到要与新中国建交已经无望,所以7月1日当即电告司徒雷登,责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可见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得知了中共“一边倒”的决策,才关上了中美谈判建交的大门。

直到这时,司徒雷登还希望再为中美和谈做最后努力。7月5日他的好友陈铭枢从北平回到南京后,给他带去中共领导人依旧欢迎他北上访问的信息。陈铭枢还特别提醒司徒雷登,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宣布“一边倒”绝对不能被误解为中国会依附于苏联,还说毛泽东特别请司徒雷登读一读6月15日他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明确声明:“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可见宣布在政治、思想上“一边倒”,并不排斥在外交、外事上要“多边

1946年，司徒雷登与周恩来在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草坪上交谈。

联”。司徒雷登这位在中国长住近50年之久的、与中共领导人又有多年交往的美国人，能够理解并且接受这一点，所以他还一直想能够北上与中共领导人直接面谈中美建交之事。但是以他美国驻华大使身份，未得到美国国务院认可，他还不敢轻举妄动。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美国国务院要他回国述职。他曾提出回国途中不要安排他与台湾的蒋介石见面，以免未来他会丧失在共产党中国的“有用之处”。他本来指望回华盛顿后不久，能够重返中国继续担任大使工作。可是国务院随即急令他于8月2日偕其秘书傅泾波等人乘美国运输机由南京经冲绳直接返美。他在冲绳曾经发表谈话，表示赞成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然而国务院不许他在美国发表这个声明，还电告他回国后不能再在公开场合讲话。而且当他一到达美国，不听他的意见，美国政府就在8月5日急忙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对中国和中共横加指责。由上可见，美国主动关上美中和谈建交大门，是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宣布“一边倒”决策理解得不太全面。

从中方来看，当今重新总结历史经验，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近万言的长文，是在两天时间内赶写出来的。这篇重要文献要赶在中共建党28周年前夕发表，他自己在原稿上认真修改过，但是来不及在领导层传阅和集体讨论。他自己大概也没有料到，文中关于“一边倒”的仅有约150个字的论述竟会被美国政府领导人理解为中国完全倒向苏联怀抱，而不准备同美国建交了。早知如此，他在写政治、思想上“一边倒”之后，如果再增写百把字中国在外交、外事上是奉行“多边联”方针政策，愿意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上建立外交关系等等，可能就不至于被误读了。人们常说，细节往往决定历史。在外交博弈中，即便十分谨言慎行，也往往会给对方造成错误的判断。即便中共领导人后来也通过陈铭枢对司徒雷登就“一边倒”问题作了解释，但是司徒雷登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也已无法改变美国政府的决策了。也许有人认为，我国在宣布“一边倒”的同时，如果又表示要“多边联”的外交政策，那会得罪苏联或者会令苏联不悦。这是多虑了。如上所说，毛泽东于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中就已表达了“多边联”的外交政策。况且苏联早于1933年就同美国建交，即使在冷战时期苏美也保持外交关系。比中国更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波、捷、匈等国也都已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有外交关系。可见政治、思想上“一边倒”，早已与外交、外事上“多边联”同时并存。

1950年中美第二次错失建交机遇的原因

如果说当时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对“一边倒”有误读，那么中方对司徒雷登应召回国和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民主辩论，也有了解不够深透之处。例如毛泽东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这样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可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种说法现在看来过于绝对。毛泽东这

弔

篇文章是在百忙中挤时间赶写出来的，来不及经过集体传阅或讨论，就以新华社社论名义发表了。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不走，如上所述是为了与中共联系，愿意将来中美建交，黄华曾与之会谈三次，中共曾经欢迎他访问北平，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也曾奉命写信邀请他北上，怎么能说“没有人去理他”呢？他被召回国，在中国的确是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可是这位对中国颇有真切好感的73岁的老人，回国后依然还要为增进美中友好关系而尽心竭力。这从他所写的《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中可略知一鳞半爪。书中透露：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1949年10月份，美国国务院召集了一次远东事务官员和专家会议，集中讨论“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好几位与会者强烈主张承认和援助新政权，少数人反对这个意见，主张不要仓促行事”。司徒雷登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以上所言是他的亲身见闻。书中还说：1949年“12月30日，印度政府承认了北平的共产党政权，过了一个礼拜，1950年元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联合王国承认该政权。这当然涉及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1950年的头六个月，一些亚洲和欧洲的政府也相继转而承认了北平的共产党政权。作了这样承认的一共有25个政府，如果当时美国政府也效法英国政府的话，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大，因为许多国家都会以美国为榜样”。当时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已经没有好感，而对共产党政权倒有好感。但是共产党人对美国官员的谩骂以及没收美国在北平的财产，在美国引起了公愤，致使政府不可能不采取对共产党人有力的官方行动。也正是在1950年1月5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不再向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经济和顾问的援助，3至4月间美国政府还要求蒋介石携带其家属和随从移居到菲律宾当寓公，也就是要彻底抛弃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这是由于美国政府已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的中苏谈判中感悟到中苏之间存在矛盾，苏联只给中国3亿卢布微薄贷款，中共政权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难以完全倒向苏联怀抱，所以美国政府愿意弃蒋联共，想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以便拉住中国，制约苏联。很可能中共领导层当时不了解这些新动向，再加上解放初期急于没收美国人资财等过“左”做法，以致1950年上半年我国又第二次错失了与美国建交的机遇。这又再次证明了细节决定历史。

1950年上半年，除了美国民间和政府在推进中美关系之外，在美国的华人也积极热衷于此事。从《晏》文得知，晏阳初曾于1950年3月27日致卢作孚的密信中表示：他与当时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向美国政府献议，由道格拉斯以美国总统密派代表名义到中国商谈中美建交并且帮助中国农业、工业建设之事。可是正当美国朝野致力于沟通中美关系之时，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10月19日中国出动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随即在抗美援朝运动主导下，晏阳初在国内创办的乡村建设学院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都被作为传播“买办的奴化思想”的反动组织受到取缔。这样不仅断绝了晏阳初回国继续从教之路，而且也打消了在美国的华人致力于中美建交的劲头。当今可以这样来回顾历史：如果1950年6月没有爆发朝鲜半岛内部的战争，也许到这一年底台湾就已解放，中美两国也已建交。这样即便到1951年爆发朝鲜半岛内部战争，大概我国也难以参与抗美援朝战争了。也正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更加疯狂地进行反共活动，麦卡锡大肆攻击民主党政府纵容、支持中共，结果导致1952年总统大选更加反动的共和党人上台执政。历史的发展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交互作用，往往是会出现多种不同的结局的。

现在看来，我国当年是上了苏联和朝鲜领导人的当，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之际，硬被他们逼进了朝鲜战场。当然，当时毛泽东勇于参加朝鲜战争，也是为了避免斯大林怀疑他是另搞一套的东方的铁托。毛泽东早在1957年7月5日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谈到朝鲜战争时，就已经指出：苏联和朝鲜当时领导人“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和作战计划，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实践证明，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使中国蒙受了重大牺牲和损失，阻碍了国内的和平建设，还助长了国内在镇反、土改、文教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中“左”的倾向，而且使苏联大为减轻了在欧洲受到的美国压力，在外交、外事上只倒向苏联一边，更加依赖苏联，长期失

新四军生活追忆

○ 郑青如

“黄花塘”这个在党史、军史上颇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位于江苏省盱眙县。抗日战争时期，它是新四军二师罗炳辉师长、谭震林政委领导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1942年冬，日军在苏北进行大扫荡，原在江苏盐城的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黄花塘扎营，一直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日胜利。

黄花塘一带是一片平原，村庄面积很大，没有一幢楼房，除了极少数原是地主住的砖瓦房外，全部是用土坯垒起来的草平房。新四军军部的首脑直属机关和主要指挥员，都分住在附近的村庄里，全都隐蔽在绿茵茵的树荫下，环境十分幽静。黄花塘距津浦铁路只有五六十里，向南过长江就是南京，交通和对外联络都十分方便，所以从敌占区到根据地来的地下工作者、民主人士也常汇集在此。

黄花塘对我来说，非常亲切，印象也特别深。因为那是我在1942年到达根据地的新四军江淮大学参加革命后，被分配到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新四军军卫生部。那时我23岁，朝气蓬勃，满怀革命理想。在1944年春暖花开的4月，我从淮北仁和集出发，渡过淮河，步行五六十里到达黄花塘军部报到。从此脱下便衣，穿上全新的军装，带上军帽，当上一名光荣威武的新四军战士，这是我向往已久的愿望，心里不知道有多兴奋！

军卫生部是军直属机关之一，它所属的医院、军医大学、疗养院，都在距黄花塘只有三四里的常庄、河头等几个村子。我们经常到黄花塘听报告，由军首长传达上级指示，分析战争形势。那时没有礼堂和讲台，作报告的首长都站在树荫底下的一张桌子后，我们都坐在台前的空地上，自带背包或小板凳，膝盖上放着笔记本，边听边记，十分认真，唯恐漏了一字半句。因为上级的指示和重要信息，我们有幸先知道，对此感到十分荣幸和骄傲。我在黄花塘见到过的首长和名人有：陈毅、饶漱石、谭震林、罗炳辉、曾山、赖传珠、张爱萍、潘汉年、叶飞、粟裕、汪道涵、方毅、胡立教、范长江、刘长胜、刘晓、陈同生等。

当时陈毅军长常在延安，饶漱石是新四军政委，主持军部日常工作，所以他给我们传达形势报告的次数最多，我对他的印象也特别深。饶政委中等身材，灰布军装，浓眉浓鬓，两眼炯炯有神，说话带江西口音。时常戴八角红军帽，态度严肃，很有政治家风度。他的报告既概括又具体，分析透彻，简明扼要。据军部接近饶政委的同志说：政委办事非常严谨、认真，对同志们要求严格，但待人和蔼、亲切，大家对他印象很好。饶政委夫人陆璀同志，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成员之一。当时她担任地方工作，不穿军装，平时常住在老乡家里，和老乡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深受群众爱戴，从来不以首长夫人自居。

饶政委夫妇深得大家的爱戴，提起他们，仰

去与西方众多发达国家的联系。从此中美两国对立、对峙、对抗了20多年，直到1971年又有一件偶然的细节小事，才重新开启了中美交往之路。那就是这一年在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选手科恩误乘上中国队的车，世界冠军庄则栋机灵地送他一块中国的织锦。接着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随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为联中反苏专程访华，我国领导人当时认为，“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也需要联美反苏，这样才恢复了中美联系，到1979年中美建立了正式的邦交。80年代以来中美双方才有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慕敬仰之心油然而生。建国后不久“高饶事件”后，饶漱石的名字从此消失了。至今尚未得到复查。第一次的印象是最深最好的印象，我对饶漱石的印象也是如此。

当时，在敌占区的地下工作者和全国的一些民主人士，常到黄花塘来，我们也常接通知去听报告。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位是潘汉年和范长江。

有一天上午我们去听新四军联络部副部长潘汉年的报告。他从我的家乡上海敌占区来根据地谈形势。潘汉年是重庆有名的才子潘梓年的弟弟，是个传奇式人物。我对他的报告十分感兴趣，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在台上作报告的潘汉年，中等身材、眉清目秀，身穿一件黑色皮夹克，下身是一条黄军裤，一双高筒皮鞋几乎及膝。头戴一顶军帽，显然不是他自己的，与他的衣服很不相称。他的打扮很特殊，但是却显示他的身份。他说的是江苏宜兴口音，稍带上海腔的普通话。他讲的内容是在敌人的心脏上海、浙江、香港等地神出鬼没的地下斗争。他立足上海，通过各种关系活动，为新四军筹集经费、运送弹药、做统战工作、购买药品。通过轮船、火车、汽车运送到敌后根据地。他又经常乔装成商人、教师、文化人、大老板，通过封锁线和敌人的关卡、检查站，在各种关系掩护下，进行活动，做统战工作。潘汉年讲的内容情节，既曲折又惊险。我在中学时读过一些武侠、惊险小说，但是那是虚构的，曾经使我一度入迷。现在，报告人讲的不是虚构的小说故事，而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对敌斗争实情，是革命者用生命，勇敢机智去赢得的真实故事。有什么小说能比这样的革命情操更为高尚？有什么品德比这种为了理想、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勇事迹，更能被人颂扬呢？我是刚步入革命队伍的新兵，单纯热情。潘汉年的斗争经验对我来说，犹如海绵吸水一样，吸取了革命的营养，坚定了我的人生方向和革命意志，为我后来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的艰苦岁月中，打下了思想基础。

1949年建国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做陈毅市长的助手。那时我在上海解放日报社任记者，我又重新与潘汉年市长重逢。但是只有短短的一年后，他就被审查、软禁，度过了委屈的晚年。一颗明亮的星星在政治舞台上陨落了，直到他含冤逝世好多年后，才得到平反。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我在原申报馆（现在的解放日报社）迎来风尘仆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新闻工作先遣队，带队的是身穿黄色军装的范长江。我不禁一阵惊喜，因为五年前，我们曾在黄花塘相遇、相识，和他的夫人沈谱一起生活了几个月。

那时范长江是以《大公报》名记者的身份，来到黄花塘给我们作报告。抗日时期他在敌占区很有名，他曾报道过“皖南事变”的真相，在那以前他还到当时的“禁区”延安采访，会见过毛泽东、朱德，还到陕西、山西一带，实地考察。写成有名的《塞上行》和《中国的西北角》，风靡全国，我也拜读过这两本书。范长江还经常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和腐败，抨击国民党的权贵们。西安事变事件，范长江又公开、如实地作了新闻报道，赞扬张学良，贬斥蒋介石。后来我才得知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在1939年就已加入共产党。

1944年冬，范长江来到新四军军部小住，经常给我们作报告、谈形势、谈采访。他说话带四川口音，嗓门很高，又不停地在台上走动，助以手势，有时挥臂握拳，有声有色，有时哈哈大笑，有时咬牙切齿；听他的报告后，人们就会感到他是个豪放、直爽、爱憎分明、敢说敢为、有独到见解的记者。我对他很是钦佩。但是我与范长江熟悉倒不是由于听报告，而是在常庄的卫生部。那时我和范长江的夫人沈谱同住一室。她是军医大学的化学教师，金陵女子大学毕业，民主老人沈钧儒的爱女。范长江从上海来到军部，一是为了工作，二是与久别的妻子团聚。每到周末，范长江就到常庄与沈谱团聚。他来到后，寝室就热闹起来。他是名记者，却没有架子，十分健谈，爱说爱笑。我和范长江谈话十分投机，那时沈谱快要生孩子，范长江十分体贴她，洗衣服、做饭，还给孩子取名字，忙个不停。对自己快要做爸爸藏不住内心的喜悦。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那年冬天，因躲避敌人扫荡，为安全起见，卫生部领导将沈谱安排到老乡家里待产，我也随部队转移，我们就分手了。一个

多月后回到常庄，得知沈谱生一女孩，不幸的是因为天冷，住老乡家里乏人照顾，丈夫又不在身边，她自己也缺乏经验，出生才几天的婴儿突然夭折。当范长江知道这不幸的消息，这么豪放、刚强的男子汉，也伤心地掉下热泪，更不用说沈谱有多么伤心，他们爱子、爱家之心有多深。

后来的几天，范长江就在军部住下来，负责新华社的工作，一直到1949年南下，接管上海时，到《解放日报》担任第一任社长。我在他的领导下又工作了半年，一直到他上调到人民日报社。

1970年10月“文化大革命”中，我在郑州看到一张小字报上说，范长江从北京被下放到河南确山县干校。因为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批斗，他愤然跳井自杀，我心里十分沉重。我很了解范长江的个性和经历，他怎能忍受那黑白颠倒、侮辱人格的折磨，没完没了的批斗？怎能忍受组织对他的不信任呢？像著名翻译家傅雷一样，只能用死来表白他的铮铮铁骨、一片丹心！

在黄花塘军部，另一位使我永远难忘的人，是军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我认为他是对新四军医疗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人。

宫乃泉部长是辽宁人，三十多岁。上世纪30年代，他在沈阳一所英国人办的医科大学毕业，医术高超，是位出色的外科大夫。后来，宫部长来到条件很差、生活艰苦的淮南根据地，开展军卫生部工作，却很有远见。他一手抓医疗质量，一手抓培养医疗队伍。他亲手创办了白求恩医学院前身的新四军军医大学，并亲自领导办起了医训班、药训班，定期轮训各师卫生队的医务人员。当江淮大学快结束时，他主动向学校要一名英语教员，我有幸被分配去了。他又要了十来名高中文化水平的学生去军医大学学医。宫部长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办事当机立断、严格要求。

当初我到卫生部，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在军医大学开设英语课，对学员授予基本的英语知识，帮助学员学习常用的医药英语词汇。但当时工作很艰难，没有教材，宫部长鼓励我主动克服困难，他给了我一些英语医学书和一台旧英文打字机。我自己先学医学常用词汇，并结合语法编成教材，用英文打字机打成教科书。学员年龄虽都较大，我就上课认真教，下课又耐心辅导，慢慢地教学工作开展很顺利。因为结合实际，学员热情高、兴趣大，成绩提高得很快。很多不是军医大学的干部都来旁听，其中有陈毅军长夫人张茜，她学得很好。后来在接管上海时，她担任上海外语学院领导，也就用上了英语。

宫乃泉部长在卫生部的威信很高。他医术高超，工作极其认真，对下级要求十分严格。他工作起来就像做手术一样，一丝不苟，人们只见他不是在手术台上就是在讲台上，或带学员巡回医疗，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为伤员取子弹、开胸膛、割阑尾、截肢，把战士们的生命从死亡线上夺回来。当他回到卫生部，就为军医大学和医训班的学员讲课，做手术示范。宫部长没有孩子，他和夫人刘球大夫一心扑在工作上。节假日，做了好菜、包子、饺子常请我和沈谱去他家做客。他更从政治上关心我们的进步。

解放后，我一直没有见到过宫部长，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后来得知他一直受到审查，“文革”中也被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5年含冤病故，享年只有65岁。

在常庄，我们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达到了卫生部和医院。八年抗战结束了！一片欢腾，人人欢呼，卫生部和医院里，能走动的人都互相拥抱，欢呼跳跃；不能走动的伤病员，也从床上坐起，或支撑拐棍，由人扶着举臂高呼和传递喜讯。八年来，大家熬过了多少个战斗的日日夜夜，流过多少热血和泪水，离别了爹娘，妻子儿女，未婚妻和挚友，奔赴疆场。今天，一切都成过去，只有胜利和欢乐等待着我们。那晚，我们手里拿了灯笼和靠手电筒微弱的光到处走动，传递喜讯，站在星光下唱歌，憧憬着美好的明天。喜悦的热泪流满大家的双颊。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奉命到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听报告，开庆祝大会。台上红旗飘扬，台下歌声震天。饶漱石政委一身戎装、态度严肃、精神振奋，他在庆祝大会上作报告，他的报告概括成一句话：根据党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新四军又要东进，迅速向苏、豫、皖、浙一带的城镇挺进，消灭敌伪军，解放敌占区人民，保卫胜利果实！■

（责任编辑　黄　钟）

我的家人在大饥荒中饿死

○ 时学爱

据媒体披露，去年“五一”期间微博上有一个关于“大饥荒”的帖子：“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中最重的安徽河南许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诬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阅后，触到存于心中50多年的隐痛，不得不一吐胸中块垒。

1960年我在安徽省宿城一中读高三，4月的一天，学校突然召集毕业班的学生开会，会上校团委书记宣布邻班的一位同学（安徽省濉溪县农村人）违纪回家，回校写了一篇反动作文《坟》，文中写有“我偷偷回到家里，村边的土地堆起一座座新坟，好像刚出笼的一屉屉馒头”。随后县公安局将其逮捕，戴上手铐押走。会后我们非常震惊，农村真到这种地步了吗？

7月高考结束，我们被强留学校甜菜场劳动。8月拿到大学录取通知的那天，团支部书记给我一封拆开的信，说这是你家里4月的来信，学校怕影响大家迎考，凡农村来信全扣下来，我看是你的信，偷偷留下来的，你别难过。我打开信，是三哥4月18日写的，上有“母亲已于4月12日去世”之语，我顿时泪水汩汩，恨不得立刻飞回家。

见到形销骨立的三哥，在母亲坟前，他告诉我：父亲被姐姐带走要饭去了（我说知道，见过父亲），母亲饿死，写信给你收到没有？（我告诉他收信经过）二哥去年秋天外流苏南不知下落，二嫂两个女儿饿死后，带二女儿回娘家了，你三嫂领大女儿去她娘家了。三哥说，咱庄1600来口人，除了死的、外流的，在家的不到700人了。

我升入大学后的10月下旬，收到四哥的来信，传来父亲、奶奶先后去世的噩耗。

因为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学校动员农村学生寒假最好不要回家，直到1961年暑期回家，才渐渐知道家人饿死的一些情况。

最先死去的是三哥的小女儿。这个1959年1月诞生的孩子，一出世就与饥饿为伴，三嫂无乳可哺，无副食可补，只能跟大人一起吃生产大队的食堂，喝“五香粉”（红芋焙干磨成的粉，农民起的名字）煮的“四眼”（饭如清水，人与碗中影四目相望）稀饭生存。入冬后三嫂背着她在野地里挖出苻苗(一种野草)的白色根须嚼碎后喂其充饥，近一周岁的孩子不仅不会走，连站也站不起来。寒冬饥啼，三嫂唯有用自己的唾液喂她，终于1960年1月夭折于生母怀中。春节过后，三嫂带着大女儿投奔椿树王大队的娘家哥，饥饿导致她患上严重的子宫脱垂，多年不孕或孕后流产。

继而是二哥的长女之死。因为饥饿，15岁的少女瘦得皮包骨头，失去抗病能力，严冬时不幸感染肺炎，无药无食，在频频的咳嗽喘息中被痰液堵塞呼吸道，于1960年春节前窒息而死，裹上一条芦席抱上小山，草草掩埋入土。

1960年2月中旬，二哥11岁的三女儿死于原灶房的草堆里。为了在大队食堂多打一份稀饭，二嫂把尸体用草盖上，约10天后发出气味，才被连草带尸捆扎在一起，扔到村外乱葬岗上，疑为野物所食尸骨无存。之后，二嫂携二女儿投奔栏杆公社任生产队长的哥哥，直到饥荒过去。

1960年春节过后，母亲让嫁作人妇的姐姐把父亲领走，到江苏徐州周边农村逃荒讨饭去了。从大队食堂打回的稀饭，母亲尽量多均点给奶奶，自己却骨瘦如柴。在宿县农村搞地方病防治的四哥，将好不容易省下的2斤半粮票，购买10多斤红芋送回家，因为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收空家家户户的炊具，三哥把红芋弄碎乘夜深人静放入陶罐煨熟，准备一家人分食，结果被发现，生产队长带人收走了红芋和瓦罐，把三哥关起来饿了一天。母亲终于灯尽油干，于4月12日永远闭上了双眼。只有三哥一人在家，他将母亲陪嫁的衣

柜改成棺材入殓，在本家亲人的协助下，把母亲安葬在她亲手开垦的山地里。

1960年9月初，在外乞讨的父亲回到家中，知道母亲已逝，立即拖着羸弱的身子上山，伏在母亲坟前啜泣，任由姐姐哥哥劝慰，默不作声，守在母亲坟前不愿归家。他被多位邻居强拉回去，躺在床上不吃不喝。9月18日，父亲追随母亲而去。

奶奶一生礼佛向善，总是教育我们孙子辈要做本分之人，莫贪分外之财，“外财不发命穷人。”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中，她宁可让家人外流乞讨或用苦力求生，决不让大人孩娃在外偷摸东西回家，当看到饥饿难耐的村民生吃大田里的豌豆苗、大麦苗被大小队干部捆绑吊打的惨状，态度更为坚决。奶奶眼睁睁目睹三个曾孙女和儿媳相继成为饿殍，陷入无限哀痛的她从此卧床不起，父亲的离去更摧毁了她最后的精神支柱，父亲逝世不足一月，奶奶也于1960年10月10日驾鹤西去。

一个大家庭在饥荒中就这样支离破碎了，成为幸存家人永远的隐痛。

（作者为安徽省宿州市政协原秘书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更　正

2013年第2期《1957年公安部整风反右运动》一文有三处错误：21页右栏第2行中的“追后代”应是“追后台”；22页左栏第23行中的“运动以来”应为“运动以后”；25页右栏第4行中的“董云峰”应为“董玉峰”。

浙江读者　张森生

2013年第2期第46页中所说的李鑫“后因无事可做，到经济所任副所长”。这里的“经济所”所指不明。实际上，李是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在那里任副所长，直到病故。

北京读者　刘春勤

2013年第2期《散议〈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中的“《序言》”应为“李文”；第85页右栏第24行“就不能追思制度原因”，应为“就不能不追思制度原因”。

山东读者　鲁学工

2013年第2期《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中的“‘三三’计划”（第40页左栏倒数第12—13行），应为“三山计划”。

2012年第4期第6页右栏第4行“兼国家主席”应为“兼国防委员会主席”。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毛泽东批评《文艺报》“文也不足”之后

○ 阎 纲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上，毛泽东亲手推出《再批判》特辑，把反右的火力煽得更旺。他不但改写标题，而且对原按语大动干戈，批评道：“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的注目。”同时批评《文艺报》正副主编们的文风：“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主编张光年慌了手脚，出版《再批判》特辑并大肆宣传的同时，不得不把改进文风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编辑部大会上，张光年极度兴奋，继而紧张、沉重，说他对自己的文风很不满意，肚子里的货色少，写出来的文章空，一片衷忱，满纸呆相，相当苦闷。又说，我们《文艺报》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不少，洋八股、党八股积重难返，问题相当普遍，现在毛泽东批评我们“文也不足”，我再也坐不住了。

张光年决定召开大型座谈会，广泛邀集知名作家，为改造文风大造声势。

会前，张光年不知怎么弄到一份内部资料《毛主席论文风》(供学习打印稿，不外传，阅后收回)，其中除了摘录毛泽东《反对党八股》里批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种种现象的生动言论之外，重点收入了他有关文风的最新批示和讲话，很觉新鲜，编辑部如获至宝。

据我的回忆，《毛主席论文风》主要的内容是两部分。一部分选自1956年初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部分选自1958年1月最新的党内文件《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编选《高潮》一书，毛泽东非常满意。编书时，毛泽东写了104条按语，并对其中大部分文章的题目作了精心的修改，密密麻麻，像老师改作文一样，例如：把《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今年互助组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黑龙江省讷河县平房、双泉、五福三个村互助组情况调查》改为《新情况和新问题》；《锦县晓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克服困难搞好生产的经验》改为《一个被人讥笑的穷合作社》；《昆山县西宿乡的党支部是怎样领导全乡走向合作化的》改为《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安阳县南崔庄的党支部依靠贫农带头办社，实现了全村合作化》改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萍乡县年丰乡易瑞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扩大》改为《一个模范合作社》等。

难怪，毛泽东把张光年起草的长长的题目一斧子砍下去，只留下最后“再批判”三个字，仅仅三个字，成为文人头上的紧箍咒，一切言者望而生畏的文字狱的符号。

毛泽东为《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写了以下的按语：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所收到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

改文章。

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成稿于1958年初,目的是反击“右派”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直接针对周恩来等的“反冒进”,为其策划的“大跃进运动”造势。《毛主席论文风》收录了以下的条目: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毛泽东主席不愧为文章大家。

毛泽东关于文风的言论,生动幽默,但绵里藏针,特别是对于操八股腔上瘾的官员,说好听些,醍醐灌顶、甘露洒心,说厉害些,当头一棒、心惊胆战。

“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观点和材料的统一”这两条,映入我的脑海,54年了,于今不忘。

张光年让我们带上《毛主席论文风》等有关资料,分头邀请他点名的“名师”与会。拜望老舍,是我终生的幸事。

文联大楼中国作家协会的对面,是灯市西口,再往里,是丰富胡同19号,老舍的寓所。老舍家离文联大楼很近,安步当车,来来往往,开会或看演出,我常遇见。在礼堂看演出,他靠在舞台对面的后墙上,双手固定在拐棍上,聚精会神,面带微笑,问他对我们秦腔的印象,“是鲁迅题写的‘古调独弹’吗?”说他喜欢,他对地方戏很熟悉。老舍非常随和,微笑永远挂在脸上,是个能让你亲近的小老头。

进得家门,满院子的花儿,像是要迎上来包围客人似的,进到客厅,仍然是花的世界。老舍就便谈起花儿来,说报纸的副刊就是一束花,是正席之前的拼盘,正餐上来之前先上拼盘,什样锦,一菜一个样儿,边吃边喝边聊,引人入胜。副刊以杂文为主,杂文也是花儿,五颜六色。(言下之意,神态各异的文学艺术何尝不是如此?此刻我想起,难怪老舍正面墙上悬挂着他自己诗句做的对联:“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后心愿半庭花。”)

文风问题使他兴奋起来,滔滔不绝。我说,《茶馆》彩排,聚讼纷纭,包括领导人之间,褒贬相去甚远,也有主张禁演的,理由是《茶馆》为封建社会唱挽歌,遗老遗少满台飞,没有什么进步意义。我们《文艺报》可喜欢《茶馆》了,张光年说:“《茶馆》,好剧本啊!”单看《茶馆》语言文风,就很绝,声声入耳,

全身舒坦，什么“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不小吗？”“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多么邪门，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动！”难怪李健吾说：“老舍真厉害，用最简练的语言，最简练的动作！”陈白尘说：“全剧3万字，写了50年，70多个人物，精炼的程度真是惊人！”

老舍冲着我微笑，耐心地听着，然后说了句：《茶馆》这会儿正排练，准备上演。

我转达编辑部的意见，请老舍出面主持会议，他满口答应。他问还有谁参加，我介绍一位他点一下头，当听到侯宝林也在邀请之列时，老舍笑了，连说“好！好！好！”接着说：侯宝林的相声倡导普通话，主张说话简练，不啰嗦，他说：“说话啰嗦，这是个最大的问题。”他的《北京话》，说的就是文风，称赞普通话干脆、流利，是这个味儿……说着说着，学将起来：

“三轮！”“去哪？”“东单！”“五毛！”“三毛！”“四毛，多了不要！”“站住，拉了！”

又举侯宝林相声的例子说：河南话更简练、更干脆：

“谁？”“我！”“嘛？”“尿！”

老舍只在脸上绽开花朵，我却笑得不亦乐乎。

侯宝林，家住北海后门东官房一带，我登门求见。提起文风，侯宝林饶有兴趣，每举一例，我笑一阵，有时失相，前仰后合，他却正襟危坐、一本正经。他表示极愿意到会。后来下乡，没有来成。

虽然《再批判》狼烟再起，作家们对文风问题依然饶有兴味，猜想此举是上面的意思，也许领导的兴趣逐渐要向创作方面倾斜。开会讨论文风，作家没有不热烈拥护的，都说文风早应该好好改造一番了。

会议地点设在文联大楼地下室的文艺茶座（“文艺茶座”在1957年时是《文艺报》杂文专栏的栏目名），开会时间：1958年2月15日下午。

座谈会的起因虽然是毛泽东修改《再批判·按语》时对文风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又补充写道：“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但是，在会上，这些话不便公开，只能由张光年在会上发言时，迂回地引述了一下信的内容，公开发表时另写了一稿，注明“书面发言”。张光年的“书面发言”十分巧妙：“评论文章，首先要求判断准确，言之有理，有说服力。文章写得生动些，群众化些，才能在群众中发生应有的效果。可是返躬自省，很惭愧。我们写文章，政治性不足。我们是搞文学的，文也不足。我们的文章平淡无味，不足以引起读者注目。我们拿起笔来打敌人的时候，往往用语太直，用字太硬，形容词太凶，离开‘恶毒的诽谤’、‘猖狂的进攻’之类的词句，似乎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字面上尖锐，实际上没有力量。这说明我们的头脑僵得很，我们还没有从教条主义、党八股的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因此，需要整风。今天的会，请了好些名师来，帮助我们这些文风上毛病很重的人来一次整风。”经过巧妙的渗透，忠实地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风的警告。

1960年春，毛泽东在浙江金华地区视察时，看《金华日报》

出席会议的“名师”是：老舍、臧克家、赵树理、叶圣陶、谢冰心、方令孺、宗白华、林庚、吴组缃、陈

白尘、朱光潜、王瑶、郭小川、胡可、陈冰夷、李希凡、戴不凡、张真、凤子、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

老舍说："要为人民服务，就得说人民的话，写出来人民看得懂，爱看。"臧克家说："毛主席写文章、说话都不落常套。他不说'社会主义一定胜利'，而说'东风压倒西风'。他不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说'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也应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这样说法生动新鲜而又活泼。'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些话情意俱到，多么富有文学意味！"赵树理说：群众把"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唱成"自由之神在宗清阁上。"说侯宝林这样讽刺早期电影里的国语对白（学侯的腔调）："天哪，你让我怎么办哪！""好啰，好啰，我已经知道你的心里，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你的要求！"（众大笑）老舍说：在苏联告别宴会上，一定让我讲话，我说我是家里最落后的人，拿俄语来说，孩子们全会，就我不会，他们笑我，我只好说："我是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的副会长！"这下子才恢复了父亲的尊严，上台拥抱我。如果我上去说"为什么什么而斗争"，人家不能不鼓掌，但多少有点"鼓"不由衷吧！（众大笑，长时间的活跃）吴组缃编了几句念给大家："四大皆空，一穷不通。装模作样，言不由衷。词句别扭，章法雷同。废话连篇，术语无穷。千山万水，雾闭云封。"朱光潜在谈话里专门批评了"洋八股"。

1958年年初，反右斗争仍在残酷地进行中，《文艺报》刚刚发表《再批判》，意味着又一次批斗高潮即将到来，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插进来一场新战斗：破除八股、解放文风。当然，党八股、八股腔，人人憎恶，该反，但目前尤其突出政治，"无穷无尽政治家，政也不足。"谨防喧宾夺主。可是，毛泽东信中点名批评《文艺报》"文也不足"，"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张光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三位主编即刻报请周扬给予配合，想学延安时期"反对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和党风那样，对党八股进行再批判，也来它一番轰动。然而，不是时候！1958年当时，反右压倒一切，《文艺报》此次会议虽然轰动一时，结果却难以深入。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八股调"式的讨伐反而吃香，大报大刊上的文章求"狠"不求"准"，不但置"准确、鲜明、生动"于不顾，而且"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来得更硬、更凶，"观点"比什么都重要，哪里顾得上什么"材料"、什么"文风"！

毛泽东借《再批判》的文风引爆，一大片作家应声倒下。

毛泽东一生反对"八股"腔，更反对"党八股"，他的口才和文风了得！貌似平常人说说笑笑，生动之极，但话里有话，叫你哭笑不得；锋芒毕露，语多诙谐，却像重锤击脑，吓得人半天抬不起头来。

毛泽东在紧急"反反冒进"的会议期间，拿丁玲等开刀，借"再批判"加码，借毛氏文风推波助澜，霸气十足，令人丧胆，成心把火烧得更旺，事情闹得更大，以期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反右斗争的成果，然后在全国更大的范围内顺流而下发动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大跃进"。

大跃进时期，经过全民大饥荒，进入历史的大倒退。■

（责任编辑　黄　钟）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㈠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㈡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㈢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㈣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㈤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 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192223、57733086、57733088、57733087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牛萍萍、文馨、顾娜、高晶（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田汉对我说的心里话

○ 韩 淮

1956年秋，波兰军队文工团来华访问。鉴于是较庞大的艺术团，文化部和对外文委决定，请田汉坐镇指挥接待工作。田汉和夫人安娥一起来到接待办公室，当田汉介绍安娥时，我大吃一惊："安娥！《渔光曲》的作，我年轻时还为《渔光曲》跳过舞呢！"

安娥大姐问我："你那时多大年纪？"我说："13岁。"她说："啊！那你是老同志了！"我未敢再说话。

随后陈沂将军、李伟（时任文化部宣传处处长）、马寒冰、黄文友（中国驻波兰使馆秘书）相继来了。陈沂向大家介绍田汉、安娥等，并鉴于田汉是文艺界的旗手，随口说了句"田老大"以示尊敬的意思，田汉摆摆手笑了一下。

接着就谈起波兰艺术团接待的有关事宜。同时，自即日起田汉先生就住在宾馆，安娥当天就走了。

我作为接待办公室的秘书组长，除给了田汉"接待计划"外，还把当天的活动日程向他汇报。

田汉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说话。他生活规律，晨六时前洗漱完毕，穿着拖鞋坐在椅子上，桌上摆着纸和笔，一直是沉思……没有人打扰他，他可以一句话都不说。

我还是向他汇报当天的日程，排练的时间及剧目、晚间演出的安排、国家领导人请柬的发放情况、晚间的宴请……

当我汇报客人的节目排练情况时，表示我想去看一下，他当时说："主随客便，节目我们原则上不表态，除非十分出格的例外。去大胆地工作吧。"我却想着"外交无小事"。马寒冰也有时贸然地说"田老大"，田汉却连头都不抬，像是什么都未听见似的。

按照日程，波兰军队歌舞团在北京、天津、上海、济南、广州、武汉等城市访问后，一站直达安东（今丹东），列车在车站稍事休息将赴朝鲜访问。对着客人的领队、团长及翻译，田汉说："韩淮，你把波兰团到朝鲜的访问计划及朝鲜现在的情况，向他们做个简要介绍。"

我说："朝鲜刚刚经过残酷的战争，建筑物从城市到乡村受到严重的破坏，虽然停战近三年了，但是战争遗留给朝鲜人民的依然是千疮百孔。条件很差，无论是生活、吃住，特别是演出条件，都是很差的，请你们做好思想准备。"

田汉说："鉴于我们是兄弟国家，说话就不客气了，韩淮同志介绍的朝鲜情况是真实的，我没有什么再补充的，请你们参考。"

波兰军队文工团团长拉特科夫斯基上校热忱而真诚地说："请你们放心，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难最严重的国家，我们经历过德国法西斯的屠杀和战火，死的人成千上万，我们团有80%的人是从二战中过来的，我们对战争情况以及朝鲜的条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点请你们放心。"

我们和客人的看法非常一致，谈的十分愉快。不久，列车开动了，波兰团进入了战后的朝鲜。田汉和我在站台上向他们频频招手告别。

回到宾馆稍事休息，我说："田老，您我见面以来，从未深谈过，但我从您的表情上看，您一直是心事重重，思想上充满了忧虑，是这样吗？"

他说："开始我以为部队的同志一直都是单纯的，看问题都是片面的，而且很肤浅。经过近一个月的观察，我觉得你是正直的，思想也比较活跃，所以我向你流露一些我的看法。说起来话就长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对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大体上从总的方面是可以的，但它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中国几亿人口，只提个"为工农兵服务，未免就狭窄了点。远在三十年代中期，我们还说'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我写《义勇军进行曲》时，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包括56个民族，我还怕不够就

用了‘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样动员起来的全国人民，力量自然是无限的，就像火山爆发了一样。”

“然而‘为工农兵服务’，首先指着工人，可中国的工业是很不发达的，工人阶级是极有限的；‘农民’就更是一盘散沙，唯独‘兵’，兵才有几个？充其量还不到100万人。再说‘为工农兵服务’，就把上亿的学生排除在外了，还有最有影响的教授、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这些都是抗战中必不可少的力量，然而这些广大的阶层，都被‘为工农兵服务’一句统统减去了，这和中华民族全民抗战，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都是不相符的。”

“我的话扯得太远了，再说近的。去年开展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我插话说：《人民日报》抛出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支离破碎，只言片语，好多人都看不懂，连总政治部的知识分子、大学生，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也说是一篇“断章取义”的文章，看不明白。可这些连篇累牍的材料，据说都是毛主席阅批的。我问田汉：“您认识胡风吗？”

他说：“何止是认识，还是老相识呢！”

田汉接着说：这场运动不只是对胡风的，而是对着整个文艺界的，甚至是对着几百万知识分子的，因为它指的是“集团”。

我说：“那您怎么办呢？”

他说：“只是我和胡风没有什么通信这就抓不到什么把柄，可我的思想、观点和胡风都是一致的。”

我说：“这不就麻烦了！”

他说：“胡风写的对中国当代科学技术、文艺领域建设的文章，你看过吗？”

我说：“没有。”

他没有说话，接着就是沉思，许久说了句：我担心的是中国文艺的方向，更担心文艺界。这次要多少人挨整，死多少个作家，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集团”不是哪个人；“胡风反革命集团”将来怎么收场，中国将来的文艺战线、文化艺术工作朝哪个方向走，都是值得深思的。

我说：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是英明的。

田汉说：“双百”方针是英明的，但其真正目的是为了繁荣文艺和科学技术吗？那就不一定了。

我说听说过“双百”是为“引蛇出洞”！

田汉说：这不就明白了，“双百”刚说过，接着就是“香花、毒草”！作品要是“香花”还行，要是“毒草”呢？但“香花”和“毒草”的界限如何界定？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这都是人们所担心的。

我说：章乃器先生说过一句“中国是中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

田汉接着说：自尊心人人都有，毛主席也不例外。章乃器先生的话当然伤了他的自尊心，引起了他的不满。不过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不满，不信任远不止章乃器先生的那句话。早在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时及以后的“抢救失足者”中，当时延安和边区共打出特务15000多人，结果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特务。不过王实味还是死于康生的枪口之下，那是在1947年，解放战争最残酷的时期，党中央从延安撤出时发生的事。

这是我和田汉先生的最后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是波兰军队文工团访问朝鲜的第五天，当晚到新义州，下着小雨，我想把该团的几百吨重的服装道具装卸车简化一下，就赶往新义州。当我走出宾馆将要上车时，田汉拿着他的一件雨衣，疾步跑到门口，喊：“韩淮，你把这件雨衣穿上。”

当晚他接到文化部的急电，要他立即赶回北京。

我是当年12月初回到北京的，一天中午我给田汉先生打电话，首先向他汇报了波兰访问结束回国情况，他说：他们好，没出什么事就好。最后我问他：何时您在家，我给您送雨衣去。

他大声而斩钉截铁地说：“我很忙啊！韩淮同志，很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雨衣就送给你了，你还这么小家子气！”

这就是我和田汉先生的相识、相别和最后一次通电话……

这是我与田汉先生1956年初冬的对话，地点是丹东市一个宾馆。回忆“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完全印证了田汉的忧虑，对待文化艺术更是使人不寒而栗。中国文艺界受到的摧残，文化人的命运——田汉老人死于红卫兵的铁蹄之下，老舍先生跳进太平湖，邓拓含冤身亡，上官云珠高喊着：“我没有勾引毛主席！”而跳楼自杀…… ■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原台办室主任）

（责任编辑 黄 钟）

熊十力二三事

○ 阎秉华

一

我老伴李渊庭是1924年开始跟随梁漱溟先生和熊十力先生治学的。梁漱溟先生是年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席，与山东朋友相约，拟创办曲阜大学，从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首先创办曹州高中作为预科。熊十力先生参与其事。是年暑假，曹州高中在北京招生，李渊庭与同乡武绍文报名应考，李渊庭考上，名列榜首，而武绍文没有考上。熊十力先生主持口试，对考上第一名的李渊庭这个青年（18岁）表示感兴趣。可是李渊庭却说，武绍文如能一块儿到山东读书他才去，否则他一个人不去山东。熊先生与梁先生商量后，竟然同意让李渊庭带武绍文一块儿到山东读书。

我是1943年夏天见到熊十力先生，并住在一起，相处了两年。

梁漱溟先生1941年在重庆北碚郊区山上办了“勉仁书院”和“勉仁中学”。熊十力先生是“勉仁书院”的导师，住在“勉仁书院”。李渊庭既是“勉仁书院”学员（研究员）兼秘书，又是“勉仁中学”高中的语文、历史教员兼管总务。1943年暑假，“勉仁中学”聘我担任初中数学教员，于是我们全家迁居“勉仁书院”。

“勉仁书院”的房子是租的黄绍竑先生不住的别墅，从“勉仁书院”往北不远，就是“勉仁中学”，沿路是果木树。风景很幽美。当时住在“勉仁书院”的，除熊先生用一间作书房外，有张俶知、席朝杰和我们三家。三家共用厨房和两间小平房。我们住的房间与熊先生的书房只隔一间房子。我们于1943年暑假迁居“勉仁书院”。我们逃难人没有家具，一个人抱着孩子，一个人背着被子和几件衣服就搬家了。快到“勉仁书院”时，远远望见住家门口站着个人，李渊庭对我说：“是熊老师！”我们走近时，我抱着孩子口喊“熊老师！”深深鞠了一躬，同时叫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喊“熊爷爷”并鞠躬。熊老师很高兴地答应着。我从此认识了久已闻名的熊十力先生。

熊十力

熊十力先生当时将近六十岁，中等个子，椭圆脸，留着半长胡子，目光炯炯有神，清秀，不胖不瘦，举止洒脱，对人热情，平易近人，一看就可看出是位学者。但李渊庭说他容易发急，急了还骂人“王八蛋！”我当时26岁，身边带着三个小孩。熊先生在读书、著书写作疲累时，常来看看小孩，逗小孩子们玩，所以我们很快就熟了。熊先生每天晚饭后要上山散步，要我们两个人陪他散步，在没有开学前，我勉强陪伴。开学后，对我说是个苦差，很为难。因为我教的是初中一二年级三个班的数学，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三节课，下午还兼着图书管理员，梁漱溟先生从山东运来的数万册图书堆放在那里，装在木箱，得开箱取出、分类登记后放到书架上；而家中三个小孩得给吃饭、喂奶、洗澡、洗衣、做饭，都得我来干，每天晚上10点以后，我才能备课、改学生作

熊十力

业(每班50个学生共150个作业本),晚12点以前休息不了。晚上睡得晚,凌晨不到5点就得起床,往厨房搬运锅碗瓢盆(怕贼偷,每晚搬到住人屋),做早饭。我每到厨房做饭,小孩由其父亲带。我还得缝补衣服,做四个人的鞋。我虽然年轻,但也累得够受。所以很怕熊先生喊"秉华!一块儿散散步"。因为李渊庭不让我说"不!"可我心里想"做官不知民受苦啊"。这段艰苦生活直到1945年暑假才结束。这段生活,使我对熊先生的为人和高尚品质有所了解,我很敬重这位老年人!有几件事使我至今不忘。

有一个星期天上午(可能是1944年,记不准了),我和席朝杰的夫人徐昌玉在厨房做午饭。忽然听到坡上熊老师大声吼叫,我们俩跑到半山坡听,听到熊老师大声吼着说:"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另一个男人说话声音低,听不清。过了不大一会儿就听不到声音了。我们在厨房隔壁小房间吃过午饭后回到住处,看到熊老师时问他上午的事,熊先生讲:"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徐复观从重庆来看我,他现在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一个什么官,带着一张100万元的支票,说是蒋介石送我的。我一听就生了气,把他赶走了。"

熊先生当时是缺钱,从"勉仁书院"到"勉仁中学"的经费都很拮据,教职员工待遇都很低,仅可以糊口。我们家,两个教员还加一份图书管理员的收入才二百来元,物价飞涨,这点收入只能维持吃饱,一个月也不敢买一次肉吃。对熊老师的待遇有照顾,每三天赶场给他买二斤羊肉,隔些时就买一只鸡,熊先生爱吃肉,不多吃粮食,二斤羊肉或一只鸡常被他一顿就吃个差不离。

好像在赶走徐复观后没多久,又是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和徐昌玉两人在厨房又听到熊先生大声叫喊。我们两人又跑到半山坡听,却听到熊先生正高声哈哈大笑。下午,我们问熊先生上午谁来了,那么大吼大叫讲话?熊先生笑了起来,说:"是郭沫若从重庆来看我。郭沫若耳聋,不大声说话他听不到。我们骂蒋介石,两人骂蒋该死(介石)骂得高兴!"熊先生接着又说:"郭沫若还给我带来一只老母鸡呢!"露出高兴的笑容。

大概是在1945年初的一个傍晚,李渊庭在熊老师房间,听到熊老师骂李渊庭"王八蛋!"李渊庭离开熊先生书房回家,熊先生追他到我们家,李渊庭进门走几步站住一转身正面对熊老师,熊老师骂道:"王八蛋!难道是我错了?""我只是请先生再仔细看看您引用的那段话的上下文,您就会明白的,您讲的不符合原意!"李渊庭话音未落,熊先生举拳打向他的左肩,渊庭不躲避却说:"您打我我也是这么说!"可是我们的三个孩子却吓得大哭,熊先生气愤地走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这种场合,竟然呆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眼看着熊先生生气地骂着"王八蛋"出了门,才抱起最小的孩子并告诉另两个孩子不要哭、不怕。问李渊庭为什么事?渊庭说:我看见他正在写的书稿中引文,不符合人家原意,有点生拉硬套,我告诉他再看看人家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并把我的理解讲出来,他就火了!我劝李渊庭说:"可能你讲话时态度生硬伤了老人家的自尊心,自信心,你应该在态度上客气点儿!""对熊老师不必虚情假意,那样他会更火!"第二天一早,熊老师推门进屋,笑嘻嘻喊着:"渊庭!你对了,我错了!我晚上拿出书来仔细看了上下文,是你说的那意思。哈哈冤枉你了!"熊先生还摸摸三个孩子的头说:"熊爷爷吓着你们了!"抬头看,我正在发

笑，他也哈哈一笑就走了。此后，熊先生与李渊庭的关系更近了。

二

1951年元旦，李渊庭和我去看熊老师，熊老师笑嘻嘻给我一本大线装书，我一看，是《崔卓吾书心经·金刚经合册》，书内扉页上，熊老师大笔写着“念佛护福”四个大字，落款是“空不空斋老人”，旁边又以小字写着“秉华妹持诵”，落款写着“仲光（熊先生的干女儿熊仲老是池际尚教授之妹）辛卯元旦”。熊老师在我接书时告诉我：“常念念心经有好处！”我鞠躬致谢。熊老师送给李渊庭的是两样写了字的纪念品，一个折扇，一张他的半身像。大白色折扇上和半身相片周围都写了字，写的都是怀念抗战时期曾一块儿生活的那两年时光。

三

“文革”前，熊先生每年来京参加全国政协的会议。李渊庭经常到熊老师住处看望这位老人，我在星期天如有空即去看看。但毕竟不同过去在北碚住在一块儿时，接触少多了。但曾听到说熊十力老师的两件事，至今难忘。

一件事是李渊庭对我讲的。1951年或1952年（我记不准是哪一年了），李渊庭从熊老师家回家来对我说，他一进门，熊老师就给他跪下说：“渊庭，快救救我，快给我去买安眠药，免得受辱！”李渊庭急忙扶起熊老师，看见他气色很不好，忙问出了什么事？熊老师说：“早上，来了两个自称统战部的人，问我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有什么意见，我说共产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很好嘛。但是他们一再说，是想了解我看到的存在的问题。我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视苏联如祖，视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我说到这儿，那两人露出不悦之色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人说，领导上叫你跟我到部里去，也是不高兴的样子。我心想我闯祸了，正换衣服准备跟人家走，又匆匆进来两个人对我说‘你不要去了’，并且叫先来的那个人一起走了。这还不是出了大事?！我怕受辱，不如早死，你赶快给我买一瓶安眠药，我求你了！”李渊庭听完笑着对熊老师说：“没事！”熊老师惊问：“怎么能没事?！”李渊庭说：“您那些话太伤人！所以领导上一听就派人来叫您去，人家是生气！但是他们可能想到是他们派人来征求您的意见，如果您到统战部还那样讲，该怎么办您呢？怎么下台呢？学习苏联是毛主席定的国策，能听您的吗？他们又急忙派人来阻止您到统战部是对的，是高招儿，此事就不了了之了，您以后说话可要先想一想。”又说：“您等三两天，如果有事，我给您买安眠药。现在就死是白死！哈哈！”熊老师听李渊庭的话有道理，神情逐渐放松并跟着渊庭哈哈一笑。李渊庭是当作笑话讲给我听的。后来果然没事。听说过了些日子，董必武、林伯渠约熊先生谈过话。

“文革”初期，1966年8月，梁漱溟先生被抄家、批斗并被红卫兵勒令住在放杂物的小南屋，每日打扫街道；李渊庭在9月初被全国政协“红卫兵”宣布为“临时工，收走工作证、公费医疗证，停发工资并不准与梁先生往来。原本是要轰赶回老家务农，经我找有关方面交涉才如此处理。从此天各一方，各自受凌辱，互不了解。不知哪一年，李渊庭曾听说熊老师去世，但不知道是怎么走的。

1980年，梁漱溟、熊十力两位学者的一位学生，也是李渊庭的同学从上海来北京，与熊老师常往来。这位同学流着泪告诉我们：“熊老师在1968年5月是自杀身亡。‘文革’初期，熊先生的家被抄，被批斗，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熊先生对当时的动乱局面很愤懑，说：‘国家怎么变成这么个样子?’拒绝领取全国政协每月发给他的工资（大学一级教授待遇）。1968年春，上海造反派又批斗他，竟命令83岁的这位老人与名演员言慧珠同志并排跪在高台上，开群众大会批斗，倍予辱骂。这对自尊心强的熊十力先生说，是奇耻大辱，难以忍受。又加某一晚辈家人（党员）向他强行索走他赖以维生的、有900元存款的存折，熊十力老师的气愤不打一处来，当日起就绝食。他采取进水不进食的办法，没多久就很衰弱了，引发肺炎。虽送医院，不几天就去世了。”我们夫妇闻言落泪，深为叹惜！■

（责任编辑 黄 钟）

我的两位吴老师

○ 章 明

严秀先生是教我写杂文的良师，他给我的教诲鼓励和鞭策是永远难忘的。不过我和严老认识较晚（1984年），在他之前，我还有过二位良师——凑巧得很，他们二位都姓吴。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从理想主义的太空回归现实主义的地面，就开始写一点杂文，但并没有什么计划，也不经常，只是偶有所感、偶一为之而已。1980年5月初，想起党中央关于今后不搞大规模政治运动的重大决策，感奋之余，我写了一篇一千来字的杂文《“吃运动饭”》，对过去专门在一些政治运动中依靠整人和制造冤假错案吃饭的人有所规劝。由于这方面的生活体验特别丰富和深刻，所以写来非常顺手，初稿完成后修改了两遍，“自我感觉良好”。请一位老朋友看了，他也认为“没有问题”，于是我就寄了出去，很快它就在5月14日的《羊城晚报·花地》刊登出来。几天之后，编者特地寄来一封短信，说文章发表后“反映甚佳”，我听了自然也很高兴。

风云突变。就在这时候，第一位吴先生出来了（吴冷西先生，当时在广东省委任书记）。他大概是对我的文章深为恼火，就叫人写了一篇《评“吃运动饭”》，于6月14日发表于同一报刊。此文几乎通篇都是偷换概念，歪曲事实，无限上纲，强加罪名；我觉得不难驳倒甚至于不值一驳。同时也想到，我已经不期然而然地触及了一根敏感的神经，肯定会出现不同的声音，所以我对此文及其作者并不十分在意，更没有丝毫恐惧。可是叫我气不打一处来的是，该文前面附有几句编者的按语：一则曰“章文有片面性，发表后效果不好”，二则曰“编者是有责任的”，最可气的是三则曰“至于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准备公开讨论下去了”。为什么辩论还没有开始就判定我为败方？为什么编者匆匆忙忙出来承担责任？凭什么封住我的嘴巴不许我答辩？——尽管已坎坷半生，却仍然书生气十足，考虑问题“一根筋”。变出非常，我不去了解个中曲折、事有蹊跷，就不假思索地给晚报编委会写了一封信，指责他们“不顾双百方针，大开倒车”“一个人要有人格，一张报要有报格。你们这样做，就是自毁报格”。

我的这封出言不逊的信送到了第二位吴先生手上，他就是当时担任《羊城晚报》社长兼总编的吴有恒先生。据知情人后来告诉我，他读信以后竟然流下了眼泪！众所周知，第二位吴先生是正直耿介的模范党员，是文武双全百战百胜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我军粤中纵队司令员；又是遭受迫害终得平反的百炼之身。“男儿有泪不轻弹”，他流下的是英雄之泪，是因为自己陷入困境无法保护我而流下的泪！——这件事我每次想起就觉得心里难过。

后来情况越来越明朗了。我虽然挨了一闷棍，但是有广州许多作家对我表示支持，首先是剧作家赵寰仗义执言，他将此事定性为“严重违反党的双百方针的事件”，详记颠末，直接上书习仲勋同志（他当时在广东省委任第一书记）。接着又有杂文家老烈撰写《马后炮》一文为我鸣冤，特别是我在短期内收到省内外素不相识的三十多位读者来信对我亲切慰问，令我无限感奋。赵寰上书后，当天就接到习书记本人打来的电话：“我下乡刚回来。你的来信很好，我同意。章明同志的文章我也读了，没什么问题。这件事情，就由我来负责吧。过几天，我想找各方面的同志们来谈一谈。”习仲勋书记的表态迅即传遍全省，传遍全国，顿时云开雾散，人心舒畅。我当然也就逐渐心平气和，又一次领悟到中国的复杂性。

第一位吴先生是我的良师，他从反面启示我：说真话的杂文不但有人要读，而且有人厌恶。既然有人厌恶，就必然有人喜欢。第二位吴先生更是我的良师，以他那样忠肝义胆的奇男子伟丈夫，却为我的一篇杂文受压而落泪，足见杂

“林彪信稿”的本来面目

○ 余汝信

《炎黄春秋》2012年第一期刊登的《吴忠谈“九一三”事件》一文，公布了一封据称“‘九一三’以后，从毛家湾查到一个材料，是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信稿”。因为该文是根据吴忠的谈话录音整理的，且整理者还承认“磁带有些地方听不清”，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中由吴忠转述的此一信稿，与原文存在不少的误差。

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研究的基础，首要在于必须将该事件的原始材料搞清楚搞准确。将光凭某人“口述”而未与原件核对过的材料匆匆拿出来“示众”，并非是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故而，我们认为，公开该信稿的原文，恢复其本来的面目，是必要的。

经与原文(复印件)反复核对，该信稿全文如下：

主席：

五月二十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我要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紊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映。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到了以下的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评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对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

文决非等闲之物。我若是吓得从此不写杂文了，就会让第二位吴先生为之失望，也会使第一位吴先生感到寂寞。因此，我就放弃了别的诱惑(譬如练习书法之类)，怀着“林冲夜奔”一般的心情，下决心拼尽全力，更自觉更经常更用心更认真地写起杂文来了，一口气地写了30年之久。直到年已耄耋的今天还在写着。我觉得，文学如果既不令人喜欢，也不招人讨厌，漠视生民疾苦，无关世道人心，那就是可有可无的小摆设了。有何意趣？又何必为此劳神？再说，戴着镣铐跳舞，也是需要一点灵气、勇气和骨气的。要把一篇短小的杂文写得像个样子，决非易事；而且它的作用与价值也远远高于某些平庸虚妄的长篇巨制。且不说鲁迅先生的杂文篇篇可以不朽，不客气地说，就连区区如我者笔下的几篇杂文，自信也不是浩然的《金光大道》或姚雪垠的《李自成》那种昙花一现的东西所可以比拟的。

我把自己这些年来习作杂文和随笔的体会归结如下：

描绘老百姓(我在其中)自己的悲欢。

表达老百姓自己的渴望。

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文。■

1996年初稿，2011年修改

(责任编辑 黄 钟)

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命。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命，则其本人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绝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华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

第四，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以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的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

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一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

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付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确从毛家湾林宅中清查到一份写有以上内容的信稿，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以下数点，又是必须注意的：

一、这一份已誊清的信稿，并非林彪亲笔所写，而是其他人的笔迹。

二、信稿的末尾，没有署名，没有落款日期。

三、在原“林办”秘书中，目前尚未有人公开承认是该誊清稿的抄录者。换言之，该信稿形成过程是研究者目前尚未弄清楚的，包括：是否确为林彪口授？谁是林彪口授时的记录人？信稿口授、起草、誊清的日期？为什么没有署名？为什么未能发出？这一切，目前尚未有答案。

四、信稿称，“五月二十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权威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并没有林、周两人在这一天谈话的相关记载。

五、信稿中的“中央局”含义是什么？吴忠口述的整理者将其理解为“中央政治局”（《吴忠谈“九一三”事件》一文中信稿两处还按此理解作了改动），恐怕是一种误读。因为信稿是将“中央”与“中央局”并列的，“中央”指的才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中央局”指的应是1971年已不存在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华北局……等几个“中央局”，对于1971年来说，这是一种习惯性的旧的说法，信稿的口授者在这里极有可能是指代各大军区，就如信稿中说“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指的应是南京、沈阳、济南军区。

六、信稿所称要实行“四不一要”的“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按字面理解，符合这一特定条件的有以下几人：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军区第一把手）、张春桥（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军区第一把手）、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第二把手）、谢富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军区第一把手）、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第二把手），似还应加上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军区第三把手），这恐怕才是信稿口授者所指“中央局”的人。以上这些人，恰恰并非是林彪的四野旧部，并非“林彪嫡系”，并不包括黄、吴、李、邱。信稿的口授者为什么会为这些人说话？是否另有深意？研究者当然大可各有判读，但前提是需要将材料先搞准，材料搞不准，那就难免是无的放矢了。■

（责任编辑　黄　钟）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102488　收款人：崔秀岭

我按毛泽东文艺思想创作

○ 韶 华

从1944年我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经69年了。我是专业作家，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时候我把它当神明供奉，有时它把我当成阶级敌人抽打。有时候我怀疑它，有时候我又责备自己……不管怎么样，它一直在我的心灵深处，一时也没有离开。

（一）把《讲话》当作圭臬

1944年，我在冀鲁豫边区打游击。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小说。只是觉得我的生活经历很有趣，照实记录而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发表一年后，还没有在敌后解放区出版，我看了一个朋友的手抄本。看了“讲话”之后我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写作还有这么多学问。讲得太对了，太好了。特别是作家要深入生活，在生活中获取创作源泉……数十年中，“讲话”一直是我创作的圭臬。土地改革时，我下乡当工作队员，抗美援朝中，我过了鸭绿江到前线体验生活。我还认为：到生活中去不能当“客人”，必须当“主人”，当“战士”。所以上世纪50年代，在经济建设中，我到大伙房水库体验生活时，担任过支部书记、宣传部长、党委副书记。“四清”运动时，我到抚顺钢厂当工会主席。每段生活都有作品产生。直到现在我对“讲话”中所讲的创作和生活的关系，还深信不疑。

(二)我曾经努力配合政治任务

1963年我在抚顺钢厂搞“四清”运动。有一天省委文艺处来电话要我到省委去一趟，说有个政治任务要完成。原来我在文艺处当过处长，轻车熟路。我急速到了省委，一位姓石的副部长接见了我。我们是从老解放区一起来东北的同路人。我问：“什么政治任务？”石副部长先给我看了个文件。我没有细看发文单位，文件是“红头”，重要！内容大意是作家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石说，希望你写一部反映非洲黑人革命斗争的小说，并笑着说：“谁都知道你是一个快手，不会有困难吧？”

我们那一代人,服从党的需要是思想的灵魂,文艺从属政治、创作服从政治,是文艺的任务,我想了想说：“困难有，我没有非洲生活体验呀。”

石说：“没有直接生活，可以用间接生活嘛。”说着给了我一摞“材料”。我虽然坚信作品来源生活的毛泽东思想，但政治任务是必须完成的。

我回到家里细细看了有关材料：大部分是有关一场非洲政变的。1961年刚刚独立的刚果（利）民主共和国遭到殖民国家军队的入侵，首任总理、民族英雄卢蒙巴死于政变。2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了政变，首都十万人举行了抗议大会，抗议美帝国主义勾结老殖民者比利时颠覆刚果（利）的合法政府，杀害了民族英雄卢蒙巴，建立傀儡政权，企图重新奴役和压迫刚果（利）的人民……

接着看是一批《文艺简报》：说是全国文艺界按照文艺服务政治的原则，要掀起一场支援非洲革命的风暴。毛泽东发表了声明，支持“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另一部分材料是《文艺动态》：外交部布置各地剧团要以实际行动批倒批臭联合国等资料……

《文艺动态》有：海政文工团话剧团集体创作了话剧《赤道战鼓》，各地方剧种广泛上演和改编的，有越剧、豫剧、沪剧、京剧，秦腔、河北梆子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编导组则改编成舞剧《刚果河在怒吼》，北京人艺则是由英若诚等人另编了话剧《刚果风雷》，八一电影制片厂把《赤道战鼓》拍成了电影……

我根据这些文件材料回家便闭门造车编将

韶华在嫩江搞土地改革

起来。

我废寝忘食地奋斗了半年，一稿，二稿，三稿，根据各方意见，增删多次，不必细说。

政治这个东西变化无穷：敌变友，友变敌，是变非，非变是，英雄变坏蛋，坏蛋变英雄……后来，中刚建交，发动政变者蒙博托以总统的身份访问中国，他对毛泽东主席说，过去使我们分裂的事情一笔勾销。毛泽东则回答，历史还是历史，现在两国合作了，你讲和平共处。……

“文艺从属政治”“服务政治”，我的心血变成了废纸一堆。

（三）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居然株连到我

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辽宁作协株连了三个人。一个是女作家草明。她在上世纪30年代参加了“左联”，早就认识胡风，自然是第一个重点人物。因她交代不出和胡风有什么“反革命关系”，隔离反省了半年。第二个重点人物也是30年代参加“左联”的作家马加。因为《人民日报》刊登的“胡风反革命日记”中有一句“马加来，谈机械论的危害”，便要马加交代。其实马加还是头一次见胡风，礼貌性地拜访，怎么会有什么反革命活动呀。马加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便隔离反省了一个月。

第三个就是我韶华了。那时我这个辽宁作协的专业作家，是小八路出身的老干部，和胡风“八竿子打不着”，和他没有任何交往，怎么也株连上了呢？

原因是：胡风有一个学生叫徐放，报纸上公布徐是“胡风分子”；徐放在伪满时因为“反满抗日”坐过日本人的牢，和他一起以同样罪名坐牢的作家叫鲁骐；报纸上公布鲁骐已经定为“胡风分子”。1946-1947年，我在齐齐哈尔报社和鲁骐一起当过编辑，只有半年时间。现在已经过了八年。此时鲁骐还在黑龙江当专业作家。而我在沈阳主编《东北文艺》，只是发表过鲁骐的来稿。有人让我在大会上揭发交代和“胡风分子”鲁骐的关系，我说，我和他八年没有见面了，没有可说的。有人揭发问：“不对，在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你在北京和他见过面，还一起逛过商场，有没有这回事？怎么不交代？”我一想，说：“有，我忘了。”有人便追问：“鲁骐和你搞什么反革命活动了？”我说：“绝对没有！”有人说我“不老实”也要隔离反省。

我那时在大伙房水库任职（党委副书记），我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水库，只是来开座谈会，可以不归作协管。同时水库正在紧张拦洪。我抬腿回了水库。辽宁作协又没有我的任何材料，也不再找我。这样我就避免了一次厄运。

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我的第一次鞭打。

（四）大连“小说黑会”前后

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市召开了小说创作座谈会。实际上全名应该是“关于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赵树理、周立波、李准等著名小说家参加了会议。党中央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周扬，在会议上讲了话。茅盾是文化部部长，也在会议上也讲了话，征求大家对当前文学创作的意见。

既然是讨论“农村题材”，作家们当然得谈论当前的农村形势。“大跃进”以来的“五风”（共产

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全国被刮得天昏地暗。当时全国什么行业都“全民大办”。在“全民大办文艺”时，常见报道某村、某厂、某校一个夜晚，写了几十个剧本，几千首诗，并向上级部门敲锣打鼓地“报捷”。我还有一次滑稽经历，一次坐电车，乘务员发给我一张纸，要我写诗，我说：“车上摇摇晃晃的，不好写字。”乘务员喊：“司机，开慢点！”可见当时各方面的“大跃进”，是何等的深入。结果是，什么都“全民大办”，全民什么也没有办成。从物质上说，粮食“大办”得饿肚子；从精神上说，作品办了不少“三化”(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作品。从1958年到1960年，折腾了三年，1961年开始清醒。制订了关于农业、工业等一系列条例(文艺上制定了“文艺八条”，重新强调“双百方针”)，以纠正各条战线上的极“左”路线的错误。“大连小说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当时作家们的普遍想法是：农村题材难写。歌颂英雄人物，写光明吧，经过“三年困难”，农村非正常死亡了许多人，歌颂光明有困难；而写阴暗面呢？经过反右派斗争，作家们心有余悸：写阴暗面会被认为是“丑化社会主义”，谁都不敢冒风险。

就在这年八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即作家西戎的“赖大嫂”，写的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形象。在这次会议上，因为1961年制订了指导文艺创作的“文艺八条”，又“拾起”了“反右派”之后丢掉的“双百方针”。因此，作家们发言时的顾虑还不太多。诗人方冰讲到当前的文艺创作时，有一句名言叫“吹猪拔毛”。他说：“现在我们创造英雄人物，不能写缺点，像杀猪似的，吹得很肥，把毛一刮，很光堂。可是是死的，不真实！”

讲到造成“三年困难”发生的原因时，我也有一个发言。我说：“过去我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或科学实验中，即使有点小成绩，也上报纸大加宣传，搞‘报捷’；而发生了灾害事件，是不报的。现在为了说明‘三年困难’是天灾造成的，即使一个公社下场冰雹，也要登报纸，以证明困难是天灾造成的困难。其实，哪一年没有自然灾害呀。我觉得‘三年困难’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人祸’造成的。”赵树理的发言则讲了这几年农村一些挨饿的故事。

邵荃麟在总结发言中，讲到创造人物形象时说：英雄人物可以写，反面人物可以写，中间人物也可以写，各种人物形象都可以创造。这是文学创作的常识。

这些发言，当时任中国作协秘书的唐达成记录得很详细，很准确。“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连小说会议记录，就从中国作协档案中，翻腾出来，当作反面批判材料发到全国。《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号召批判“大连黑会”。于是参加“大连黑会”的成员，全被打倒，一个也跑不了。中宣部管文艺的周扬，在会议上讲了话，自然是一大“罪状”，被打倒进了秦城监狱；主持这次会议的邵荃麟，“文化大革命”中在劫难逃。后来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盖源于在这次会议上他关于“中间人物”的讲话。

诗人方冰发言中的“吹猪拔毛”论，在批判他时说是“罪恶滔天”，我的三年困难“人祸主要论”，也成了“攻击三面红旗”罪状。这是文革中我的头一条“罪行”，立即被打倒了。从而我所有过去“好评如潮”的作品一个夜晚都变成了毒草。特别是我发表的许多寓言，也全部成了“三家村夜话”式的“黑话”。

现在看，参加大连座谈会的作家们过于天真了。也就在大连小说会议开会的同时，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

其实，从1963年就开始批判“中间人物论”了。这一年，毛泽东对文艺问题做了两次批示。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阎王殿”，全国的文艺团体，要变成“匈牙利斐多菲俱乐部那样的组织”(就是反革命组织)，吓煞人也。

当时我看了两个批示，感到心惊胆战。下一次运动，我可能是在劫难逃了。

(五)批判“海瑞罢官”我偶然逃过一劫

“文化大革命”正戏开演之前，有一个序幕，就是姚文元批判京剧《海瑞罢官》。

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又“反右倾”

“拔白旗”。此后全国已经是万马齐喑，没有人敢于提什么意见了。可能毛泽东也感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1959年春天的上海会议上，提出了“学海瑞”问题。

他说：海瑞虽然骂过嘉靖皇帝，但他对皇帝是忠实的。嘉靖死时，海瑞哭得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我们要学习海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而且要“五不怕”：不怕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等等。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话，毛泽东讲过多次。那时毛泽东已经是一言九鼎了。

既然毛主席号召“学海瑞”，于是全国文艺界响应领袖号召，一时兴起了学海瑞、写海瑞、演海瑞、研究海瑞的风潮。北京有《海瑞罢官》，上海有《海瑞上疏》，辽宁有《海瑞背纤》……“海瑞戏”纷纷出笼。北京的《海瑞罢官》是马连良演的主角。毛泽东还请马连良吃饭，席间对马倍加表扬。在中国文艺界，没有毛主席的号召，谁也掀不起这股风潮。

可是到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说《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个地方报纸,不经过中央批准,发表这样的文章,他们吃豹子胆了!？全国各级地方党委，新闻媒体，都觉得此事不凡。姚文发表后，新华社没有发通稿，《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小报纸均不转载。同时通过各种途径打听“上面”的动向。

我看了姚文后，也觉得此事违反常理。打电话问《辽宁日报》副总编邢真（他是我的河南省老乡，好友）：“怎么回事？你们报纸怎么不转载？”

邢真的答复是：中央没有文件，我们不转载。

过了好多日子，全国各省报陆续转载。《辽宁日报》是在40天之后才转载的。但转载时加了“编者按”，说是“作为学术问题，可以百家争鸣”发表不同意见。

这中间，《辽宁日报》文艺版编辑，多次找我约稿，希望我表态。我写了一篇短文，批评姚文元无限上纲，随便扣政治帽子，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会带来无穷后患。是邢真爱护我，文章压着一直没有发表。暂时免除了我一场灾难。

在这个“序幕”中，凡是卷入“海瑞风潮”反对姚文元意见的，都没有好下场：《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含冤自杀；演过海瑞的马连良自杀；在《海瑞背纤》演海瑞的沈阳演员徐菊华，悬梁自尽……就连《辽宁日报》写前述那个“编者按”的编辑，也受到了批判斗争。

（六）文革中，我被毛泽东文艺思想彻底打倒了

文化大革命是从“5·16通知”正式开始的，这时毛泽东把陈伯达派到《人民日报》当了总编辑，开台锣鼓是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接着是“必须清算大连小说反党黑会”……

按实际情况说，土地改革我发表许多作品，算是“农”；抗美援朝，我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燃烧的土地》，算是“兵”；社会主义建设我出版了长篇小说《浪涛滚滚》，算是“工”。这样看，我尽写工农兵了，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呀。可是我摆脱不了的几项罪状是：一，我参加了“大连小说反党黑会”，会上我发言讲“三年困难人祸是主要的”，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二，我在辽宁作协任党委副书记，是当权派（按当时的“政策”界限，农村公社书记以上的，工厂车间主任以上的，机关处长以上的是当权者，是当权派，当权派就等于走资派，不然全国怎么能打倒2000多万人呢？）第三，我发表了近百篇寓言，都是反党“黑话”。我必须深刻认识“罪行”，才能“解放”我。而且检讨必须“沉痛”。

全国打倒那么多人，怎么处理呀？这时毛泽东“开恩”了，要解放干部。到了1969年，“九大”开过，毛泽东觉得要“稳定”，我的“解放”列入了日程。

我记得辽宁文艺界开解放我的大会那天，个别好心的造反派给我做工作，说你的检讨，一定得表现沉痛。这样“解放你我们才好说话”。

人毕竟是要生存的。为了生存只要不伤害别人，我违心了。现在说来有些好笑：那天，我在酝酿“沉痛情绪”，我想我大半生都执行毛泽东思想，现在却要承认反毛泽东思想，越想越委屈。我是大哭着走进会场的……我按照造反派审定的检讨稿，哭着念了一遍……

我被解放了，他们称我为“同志”了，我很荣幸……

从此“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名

曰“走五七道路”，我被流放到康平县当了农民。我和全家到乡下住进草房那一天，我对爱人说：“别人忘记我，我就安全了。以后我们有了孙子，也不能让他搞文艺！”

（七）文革中我是怎么被“抓”搞创作的

我虽然下决心有了孙子也不让他搞文艺创作，可是形势比人强。我下乡的第二年，领导又找上门来让我搞创作了。

有一天，《辽宁日报》发表了豆腐块大小的一条新闻，说是康平县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这当然是上面对县革委会一个“政绩”的表扬。为了宣传这个政绩，我这个原“走资派”荣幸地被召到县革委会，任务是创作一出歌剧，歌颂康平县实现了机械化。

按照当时的创作原则：工农兵是领导阶级，不仅领导各行各业，也能领导文艺创作。我那时是被改造对象，不敢推辞。根据当时普遍推广的创作经验是“三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领导连剧名都想好了，叫《铁牛赞歌》，歌颂全县实现机械化。他们给我找了一个老农，为我“出生活”，我管吃管住。我让老农给我讲讲他们实现机械化的生活。这老农没有文化，耳朵还有些聋。对于我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什么机械化？我没有见过……”

我立即明白他给我出不了“生活”，只好编将起来。主题歌是四句：

毛泽东思想像明灯，
照得（那个）大地一片红。
丰收了不忘继续革命，
机械化走向新征程。

故事梗概是：一个村支部书记，是党的领导的象征，丰收了还要继续革命——为实现机械化努力奋斗；而村主任则有保守思想，两人发生了矛盾，为了“添油加醋”他们的儿女在谈恋爱，两个老头越吵越激烈，两个年轻人越恋越热乎……

过了几天我拿着草稿，读给县革委会领导征求意见。

革委会主任很重视，特别召开了革委会常委和工农兵代表人物参加会议，对初稿提出意见。

革委会主任批评说：我认真读了稿子，加个恋爱故事不严肃，实现机械化是一场继续革命和保守主义的严肃斗争，故事要修改……

县工会主席说：“党支部书记，要写他是工人出身，以表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县妇联主任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不仅要在劳动中表现积极性，实现机械化也应该是半边主力军……”

此外还有许多县领导发言，不一一叙述。我原来是“走资派”，现在接受再教育，对红色政权的领导和工农兵代表们，谁的意见都得听，一一做了记录。

我拿着草稿，回到家里，按照他们的意见，“综合平衡”。过了一个多月，拿出个新稿，面面俱到。县里通过了。按规定，拿到铁岭地区革委会审查。地区革委会没有开会，一位副主任看了，对我说：现在农民积了肥，只上在自留地里，公家的地里却不上肥……在农业问题上，主要矛盾是实现“满粪化”，你把主题改改……

我又把歌剧的主题改成“满粪化”。主题歌词也改了：

毛泽东思想像明灯，
照得（那个）大地一片红。
丰收了不忘继续革命，
满粪化走向新征程。

我回来向县革委会汇报，下级服从上级，要我按地区革委会领导意见修改。

第三稿改完后，再拿出到省革委会审查，省革委会领导的指示是：现在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没有阶级斗争，主题思想是要在狠抓阶级斗争中实现机械化。你应该增加一个阶级敌人搞破坏……

我从省里回来，再向县革委会汇报，还是下级服从上级，要我按省革委会领导意见修改。

这个歌剧折腾了大半年，我知道故事成了一堆垃圾。谁的指示我都得听，歌剧的命运只能以失败告终，但我不敢提出意见。

那一年对我的好处是没有挨斗，坏处是给我“出生活”的老农，在我家吃了半个月的饭，没有给粮票，我得节约粮食了。

（作者为中国作协书记处前书记）

（责任编辑　黄　钟）

《讲话》前后的延安戏剧

○ 王克明

每逢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会以延安文艺"'大洋古'统治舞台""与抗战无关""不切实际"等不合理性,来说明《讲话》产生的历史合理性。笔者从史料观察《讲话》前后延安文艺情况,却得不出同样的结论。

一、延安没有出现过"大戏洋戏"统治或充满舞台的情况

多年来,人们被告知,"大洋古"(大戏、洋戏、古戏)一度错误地统治或曰充满延安的舞台,是整风和《讲话》改变了这种局面。这成为后人认可毛泽东《讲话》的重要理由。

"大戏"是指抗战期间国统区剧作名家的"与抗战无关"的多幕话剧作品。延安是在毛泽东的倡议和支持下,演出这样的大戏的。1939年12月6日,当时的报纸报道,经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和支持,延安剧协"工余剧人协会"加紧排练曹禺名剧《日出》,实际上是组织鲁艺排演。由此,从1940年元旦上演《日出》开始,延安进入了演"大戏"的阶段。在毛泽东秘书胡乔木的关怀下,不同的单位又排演了《雷雨》《钦差大臣》等一批"大戏洋戏"。

1940年到1942年三年里,延安上演的国统区名家剧作,一共有10部。其中6部属于"与抗战无关"的"大戏",它们是:1940年演出的曹禺的《日出》《雷雨》,1941年演出的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夏衍的《上海屋檐下》,1942年演出的曹禺的《北京人》、陈白尘的《太平天国》。另外4部国统区剧作是以抗战现实为主题的作品。那三年,延安上演的多幕话剧,一共有29部,这6部"大戏"在其中占21%。延安时期有过广义的"大戏"概念,指多幕多场的艺术价值高的大型话剧。现在的批评不只是针对艺术和规模,更突出针对非抗战主题,使用的不是以前的广义。

"洋戏"是说外国名家的艺术经典剧作,后来批评所指的是:1940年演出的俄国果戈理的《婚事》和《钦差大臣》、法国莫里哀的《伪君子》、俄国契诃夫的独幕剧《求婚》《蠢货》《纪念日》,1941年演出的莫里哀的《悭吝人》。这7个剧目,被诟病了七十年。不过从史料可知,果戈理和莫里哀的4个多幕剧,占那三年延安上演多幕话剧的14%;契诃夫的3个独幕剧,只占那三年延安上演61部独幕话剧的5%。

13部"大戏洋戏",表演水平高,艺术感染力强,具有新文化的冲击力,在延安影响很大,很受欢迎。但统计表明,延安那三年演出的大小话剧剧目总量是90部,这13部只占其14%。而且,当时的话剧演出都有舞台背景的设计、制作和布置,演出场次有些受限。

1940年元旦延安鲁艺公演话剧《日出》时的剧照

洋戏的演出集中在1940年,一年6部,占当年20个话剧演出剧目的30%,大戏占10%。1941年只演了1部洋戏——之后就没了,占当年33个话剧演出剧目的3%,大戏占6%。1942年《讲话》前,演了大戏2部,占那几个月18个话剧演

出剧目的11%，那几个月没演洋戏。

综上观察，无论是《讲话》前的六年里，还是1940年后的三年里，还是距《讲话》最近的1941年和1942年前五个月，都没有发生过“大戏洋戏”统治或充满延安舞台的情况。

那几年延安上演的其他外国话剧，主题多是反法西斯现实斗争、苏联“十月革命”、苏联国内战争、苏联集体农庄的。如《带枪的人》在延安舞台上出现列宁形象，《讲话》之后七天，毛泽东在鲁艺作报告时肯定了这个戏。近年对“大洋古”的批评中，大部分不涉及这些“红色”剧目。

二、不是“专门化”导致了大戏、洋戏的演出

近年对鲁艺前期的批评里，说1940年开始，鲁艺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批评者把“大戏洋戏”的演出纳入这个鲁艺“关门”阶段。这是把时间搞错了。此外，也有谎说鲁艺1939年就强调“正规”和“提高”的。

1939年鲁艺没有强调“正规”和“提高”，而是强调否定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方针。当年2月鲁艺副院长沙可夫对全院报告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以培养大批普通干部为第一位。”同年4月罗迈关于鲁艺的教育方针的报告，也否定偏重于培养比较专门的干部。鲁艺当时为培养普通干部调整了课程。那年因战事情况，鲁艺全院曾编为一个纵队，设司令部，下分三个连，进行军事训练，无暇“正规”。

实际上，“大戏洋戏”的集中演出是1940年，“专门化”“正规化”则是1941年6月才开始的事情。鲁艺的“专门化”和“关门提高”只有半年多——跟“大洋古”并无关系，就被整风和《讲话》终结了。大戏、洋戏的演出，不是“专门化”导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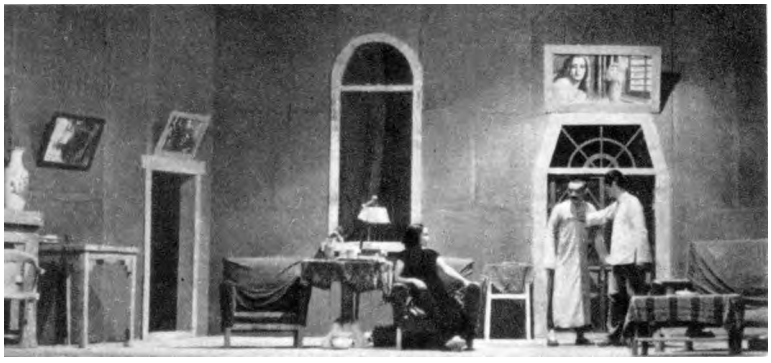
“大戏洋戏”的演出，是毛泽东及其秘书等人建议、支持、关怀所导致的。1940年7月，为适应毛泽东推动的这种变化，鲁艺曾重提培养专门人才，延长学时，但未建立起正规学制，也未提出“专门化”。到全延安“大戏洋戏”已上演9部，其演出高潮过去后，1941年4月28日中宣部副部长罗迈在鲁艺三年工作总结大会上说：“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要专门化。”他指出，鲁艺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学院，当前任务重在专门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积累文艺工作和艺术教育的干部”。第二天鲁艺就调整机构，很快确立了正规化的学制。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消息：“鲁艺确定正规学制基础。”这是对鲁艺正规化、专门化的首次报道。1987年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也记载：“一九四一年鲁艺全面地检查和总结了第三年的工作，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制订了趋向‘专门化’提高的计划。”不过，鲁艺在正规化、专门化后，没演过一部今人批评的“大戏洋戏”。

史料显示，1937年到1942年的六年间，延安共演出话剧195部，戏剧事业呈繁荣面貌。而1943年到1948年，共演出话剧38部。前六年的平均数字是每年演出约33部，后六年平均每年约6部。相较起来，后六年呈萧条面貌。

三、《讲话》前，延安文艺没有“脱离抗战”，而是鼓舞人民积极抗战

多年来，《讲话》前的延安文艺，被传说为没有为抗战服务，批评的话语有“不合抗战时宜”“不适应抗战需要”“脱离抗战现实需要”“偏离了抗战的方向”“基本上不反映抗战，与抗战无关”“不顾抗战的现实”“不切实际”等。

延安演出的与抗战无关的13部“大戏洋戏”，只占1937年到1942年除古装戏外全部307种演出的4%。而那六年，有十数家团体、单位在延安演出话剧，剧目总量是195部，其中抗战反法西斯内容的约115部，占总量的59%。包括21部多幕话剧，如：大丹河、血祭上海、冀东起义、九一八前后、塞上风云、蜕变、中秋、法西斯细菌；和88部独幕话剧，如：侵略、卖国贼、放下你的鞭子、察东之夜、蹂躏与反抗、汉奸的子孙、捉汉奸、东北之光、汉奸的末路、保卫卢沟桥、抗日先锋、皇军、八百壮士、“八一三”的晚上、林中口哨、军火船、顺民、梦游北平、台儿庄大胜利、反战潮、游击队的母亲、东京双曲线、天皇的恩惠、棋局未终、九一八、良民、第五个、保卫马德里、渡黄河、妮笛卡和两个德国兵；以及6部国外反法西斯剧作，如：婴儿杀害、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今晚九点钟、前哨。



1941年新年“西青救剧团”在延安公演话剧《雷雨》的剧照

那六年，延安上演过18个京剧现代戏，其中16个是抗日内容的，占89%。如：逃难图、松花江上、松林恨、刘家村、赵家镇、白山黑水、清明节、教子参军、夜袭阳明堡、钱守常、平型关、大宁城、摩擦鉴。还上演过18个现代地方戏，其中9个是抗日内容的，占50%，如：好男儿、中国魂、一条路、回关东、查路条、中国拳头、干到底。

抗战反法西斯内容的演出，还有大小歌剧、歌舞、活报剧共40种演出，占同期同类76种演出的53%。

前六年间，延安演出抗战剧目最少的是1940年，为7部话剧、1部地方戏、1部京剧现代戏，占当年22种舞台演出的41%（古装戏曲除外）。1941年，演出了19种抗战反法西斯题材的剧目、节目，占49种舞台演出的39%。毛泽东推动文艺繁荣造成了抗战剧目的减少，但1940年抗战剧目的演出量，并不少于《讲话》后抗战内容的年度舞台演出量。

总起来看，1937年至1942年，六年间，延安共演出180个抗战反法西斯的剧目、节目，占除古装戏曲以外全部各种演出的59%。其他的演出内容，有西方经典，有苏俄革命，有反对封建，有揭露黑暗，有生活百态，也有边区现实的。

从这些数字分析和59%的比例中，得不出整风和《讲话》之前延安文艺“脱离抗战现实需要”“基本上不反映抗战，与抗战无关”“不顾抗战的现实”“不切实际”之类的结论。

四、《讲话》后，没有创作出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文艺作品

在普遍批评延安文艺“脱离抗战”的同时，普遍传说在延安整风和《讲话》后创作出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文艺作品。真实情况如何呢？

整风和《讲话》后，1943年到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抗战类的话剧，全延安演出过2部多幕剧；8部独幕剧。一共是10部，占那阶段28部话剧演出剧目的32%。演出过抗战题材的歌剧、歌舞、活报剧9种，占同期29种同类演出的30%。上演过6个京剧现代戏、8个现代地方戏，没有抗战内容。那阶段抗战内容的文艺演出量，1943年8种，1944年7种，1945年4种，总共占除古装戏曲以外全部72种戏剧等演出的26%。史料可见1943年初到抗战胜利，文艺单位和一些业余团体共表演了255个秧歌剧，其中抗战内容的不超过18个，约7%。

总起来看，《讲话》后，从1943年到抗战胜利，除古装戏曲外，话剧、现代戏、歌剧、歌舞等，再把史料可见的非舞台艺术的小秧歌剧节目也算上，共演出了327个剧目、节目，其中总共只有37个属于抗战内容的，占11%。比之前期59%的比例，这个11%反映出，动员抗战的力度被严重削弱了。单与1940年或1941年比较，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鲁艺情况类同。从学院成立到1942年，鲁艺演出了68种抗战剧目、节目，占除古装戏曲以外所有98种演出的69%。其中1941年7种，占当年除古装戏曲外全部17种演出的41%。而1943年往后，连同32个小秧歌剧，鲁艺三年共演了38个剧目、节目，其中抗战剧目只有3个，占8%。从69%到8%，也反映出动员抗战的力度被严重削弱了。

鲁艺在抗战期间排演的《白毛女》，演出很成功，但与抗战无关。1940年抗战最艰苦年代，晋察冀边区河北省阜平一带出现过一个“白毛仙姑”民间传说，其后几年间，“经过群众口头创作，故事日益完整”。1945年1月，为了向中共“七大”献礼，开始用这个素材创作剧本。在否定了“神怪”和“破除迷信”的题材处理，想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后，忽略了地主士绅那时也是中国抗战重要力量的史实，把这个传说改编成了没有抗战背景的故事，敌人从那时期的日伪变成了地主。进入创作

时，抗战还在相持，形势尚不明朗，6月10日为“七大”献演时，战争还很残酷。6月11日，毛泽东等领导人经中央办公厅向鲁艺传达他们的指示：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二、艺术上是成功的。三、黄世仁应当枪毙。在未知抗战终结之时，这个剧却离开抗战，发动阶级仇恨，提前动员内战了。

抗战题材减少，有重要的经济原因，但传说《讲话》后“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优秀文艺作品，是不真实的。实事求是的客观数字说明了这一点。

五、“新秧歌运动”里，也没有“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作品

“新秧歌运动”的内容，一是在春节期间组织秧歌队像群众一样地上街闹秧歌，与民同欢乐，二是陆续涌现出大批小秧歌剧。小秧歌剧被称为新创的艺术形式，载誉70年。

秧歌剧不是鲁艺新创的。它起源于1937年甘肃宁县南仓村农民刘志仁，第一个剧是他编排的《张九才造反》。1939到1942年，他编排了许多小秧歌剧，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以他是“群众新秧歌运动的先驱与模范”，授予他个人特等奖。另外，1937年，延安的乡土剧团也在舞台上自创演出了《有办法》等秧歌剧，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了用秧歌舞改编的《打倒日本升平舞》。

鲁艺等文艺单位上街闹秧歌，虽然剔除了传统的低俗内容，但娱乐化倾向突出，大受群众欢迎。从1943年春节参加闹秧歌开始，鲁艺在刘志仁《新开荒》《改造二流子》《读书识字》之后，创作了《兄妹开荒》《二流子转变》《夫妻识字》等供场地围观的小秧歌剧。同时，西北文工团、边区艺术干部学校等也搞出了《好光荣》等小秧歌剧。秧歌剧一男一女的传统对唱形式，符合当时民间的娱乐化审美需求。从此，延安的文艺单位疏远了舞台。到1943年入冬农闲后，小秧歌剧遍地开花了。但主要在冬季农闲季节开展这项活动。

所见史料中，抗战胜利前演过小秧歌剧的专业文艺团体，包括鲁艺，共有10个，他们那期间演出的小秧歌剧，目前记载可见84个。其中鲁艺的32个：兄妹开荒、四季生产、妇纺、李桂英纺线、栽树、夫妻识字、妯娌吵架、二流子转变、刘二起家、李七哥搬家、张公赶驴、赶毛驴、拥军花鼓、挑花篮、七枝花、有吃有穿、夫妻逃难、推小车、减租、减租会、全家光荣、李凤莲、郝家桥、王家坪、阎开增、下南路、黑板报、拖辫子、张丕谟除奸、赵富贵自新、保卫边区、地雷阵。其他文艺团体的52个：打黑龙寨、攻打石门塬、抗日英雄洋铁桶、女战士、好光荣、徐海水锄奸、张海水锄奸、群众除奸歌、抓特务、回头是岸、边区自卫军、郑铁匠自新、马金祥转变、好同志有错就改、王大娘上吊、刘顺清开荒、向劳动英雄看齐、张治国挖甘草、妯娌争光、婆媳纺线、二媳妇纺线、织好布、麦收、军民一家、军爱民民爱军、军民互助、甩炸弹、烧炭英雄张胜德、人民英雄刘志丹、老支书和一营、王木匠进城、裴金章回家、裴庆辛回家、鲁进保的灾难、张学娃过年、白大嫂、养娃娃、算账、巫神坦白、识字运动、赵占魁、沈工程师、女状元、王四和练兵、慰劳八路军、民兵偷枪、边区好、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卖瓦盆、跑红灯、十五项大任务、汤灾。这些秧歌剧中，有关抗战反法西斯内容的约占7%左右。

一时间，很多单位和地方纷纷成立秧歌队、宣传队，史料可见单位名称的有54家。它们的业余表演形成了“新秧歌运动”的庞大主体。抗战胜利前它们自编自演的小秧歌剧，目前在记载中可见到171个，其中，有关抗战反法西斯的约7%左右。

连同抗战胜利后专业文艺团体和业余秧歌队又演过的47个秧歌剧，全延安在《讲话》后的六年里，文艺团体表演的秧歌剧是118个，发动群众业余搞的是184个。

一场载誉近70年的“延安文艺运动”，已知的主体成就是这302个秧歌剧。由此可以回顾对比而知，《讲话》之前的延安文艺，真正是出现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作品。

六、“新秧歌运动”时期认为秧歌是宣传，不认为是艺术

“新秧歌运动”落幕后，能保留了几年的秧歌剧节目约六七个，到如今只有1个《兄妹开荒》还知名，占已知全部秧歌剧的0.3%。再就是如《夫妻识字》里的郿鄠调等少量唱段，还有人唱。如

1943年初鲁艺王大化、李波表演秧歌小演唱《拥军花鼓》。画白眼圈是民间秧歌传统丑角形象。

果把新秧歌运动视作与抗战关系不大的政治宣传工作，它应该是成功的。但如果把它作为艺术工作，以0.3%的节目保留率和接近100%的遗忘率观察，则是全面失败的。如毛泽东在《讲话》里所说："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毛说的这个"有力量"，是指其艺术力量。政治力量强但缺乏艺术性的作品，自然呈现出宣传广告的特质，很难属于文化艺术。艺术缓慢而深刻地影响人的精神，广告即时而浮躁地影响人的行为。1944年9月延安市文教会议艺术组召开秧歌座谈会，一些单位的秧歌组织者与会，鲁艺的贺敬之等三人出席。会议主张，秧歌是宣传，内容第一，提出"劳动为本"的原则。创作方法上主张"照实情编""要演得像""要又短又好又红火"，叫人看到热闹处就完了，让人还想看。编剧方式上主张集体创作。这个会议不认为秧歌是艺术，因此给秧歌提出的不是艺术的标准，而是会议所主张的宣传的标准，不主张艺术家个性化的自由创作，而以集体创作取代之。

胡适有一句话说得到位："文艺运动要由大作家领导。"由大政治家领导的整肃大作家的运动，和发动城乡群众参加的运动，一定不是文艺运动，而是政治运动。

七、延安戏剧从繁荣走向了萧条

现在能统计到的延安时期十二年以戏剧为主的各种文艺演出，不分艺术类别，不论规模大小，共658个剧目、节目。包括话剧233种，戏曲308种——其中古装戏250种，另有歌剧、音乐歌舞、活报等共117种。按当年鲁艺分期，把延安前六年和后六年分开比较：话剧，前期195种，后期38种，后期是前期的19%。戏曲现代戏，前期36种，后期22种，后期是前期的61%。歌剧、歌舞、活报等，前期76种，后期41种，后期是前期的54%。综合计，前期共307种，后期共101种，后期是前期的33%。另外，古装戏，《讲话》前，年平均27.5个，《讲话》后年均31.3个，后期是前期的114%。虽然《讲话》后没有出现"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作品，但传承数百年的古装传统戏曲有了更大的空间。

此外，就是后期的秧歌剧302个。这些广场节目，后来上了舞台的只有几个。那时文艺团体搞了秧歌剧118个，多于他们自己的专业文艺演出。从总体数量上说，他们的101种文艺演出，仅为302个秧歌剧的33%。

这是整风和《讲话》之后，延安的文艺团体从专门化向业余化转变的现象之一。其现象包括：一、教育上以自学为基础，师生互学，缺少了文艺专门知识的学习。二、演出上主要是搞秧歌剧宣传活动，缺少了专业基础的训练和艺术表演的实践。三、组织上部分取消文艺团体建制，改以宣传队名义，突出业余性。如取消了鲁艺实验剧团的演出名义，改为宣传队、秧歌队，把青年艺术剧院和部队艺术工作团这两个重要专业文艺社团合并成了一个宣传队。

那时期，文艺社团74%消失，文艺期刊100%停办，而古装传统戏曲无法代表"延安文艺"，小秧歌剧不属于文化艺术。综合观察这些变化，可以比较全面地认识到，延安文艺从繁荣走向了萧条，艺术殿堂从此变成了政治会堂。从整风和《讲话》后的主要成果——那些小秧歌剧，可以观察到，那时期的延安文化呈现空白状态。文艺和文艺工作者必须从属于政治的需要，为政治服务了。

八、鲁艺曾确定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这件事应特别纪念

延安文艺创作从相对自由到不自由的转变

过程不长。1939年4月罗迈在鲁艺作报告，批评那种“要求艺术直接服从于政治，还原于政治”的“‘左’的偏见”。但《讲话》后，这种偏见却成为全党上下必须接受的唯一文艺思想。由此可知，中共党内本有对文化艺术的常识性认知，存在对创作自由的常识性认可，但因组织制度给了毛泽东一言九鼎的条件，他一个人的认识，或他与少数人的认识，无论偏正，都得成为全党共识。

鲁艺1941年确定了教育专门化后，1942年2月再公布教育方针：基本方针是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之专门人才，以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艺事业；教育精神是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专家均可在本院自由讲学并进行各种艺术活动；具体目的是培养适合抗战建国需要的文学艺术之理论、创作、组织各方面人才。其中“抗战建国”一语，是指战后建立宪政国体。

《讲话》之前，鲁艺确定的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和创作自由的文艺原则，与民国时期其他大学——包括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并无二致。这是鲁艺教育成就最高的时期，是中共文化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重要事件。

整风和《讲话》后，1944年5月21日公布的延安大学及鲁艺的教育方针改变为：培养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的实际工作干部；培养学员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学与用的一致。实施方案是教育与生产结合。学习上实行以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教员与学员相互学习，书本知识与实际经验互相交流。教学上发扬民主，提倡辩论作风，培养独立思考与批判能力。

这个方针把为建立宪政国体培养人才，改成了为党培养干部；把培养文艺专门人才，改成了培养革命立场；把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改成了“理论与实际的统一”。那种规定立场和政治正确的“辩论作风”“独立思考”，培养的只能是大批判的能力，而不是独立思想的能力。这些东西在后来的“文革”中都曾重复实践过。

九、《讲话》的主要影响

一种颂扬整风的理由是，其后几年，中共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因此，“延安整风对于夺取中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讲话》是整风的一个指导性文件，通过它，可以观察这种“决定性的意义”的真实性。

延安文化界的变化说明，整风和《讲话》对于中国民族革命——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无积极意义，更无决定性意义。而“民主革命”的本义是建立宪政民主国家。由于中共那时是以推动建设民主宪政的面貌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实力政党，对外宣扬自由精神、高举民主旗帜、公开宪政主张、告示土地私有，因此那个时期它在大陆建立民主政权，成为历史走向。在延安保持个性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言论自由，不会影响这个走向。因为中共取得政权的根本条件，不在于内部改造思想、肃清异己，而在于当时公开坚持的自由民主和宪政治国理念。这是“决定性的意义”所在。没有这些，中共不可能得到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那时政治权重很大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而取得政权。全国自由知识分子支持的，是本义上的“民主革命”。

《讲话》的历史作用在于，在延安整风中增强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的服从性、依附性，由此进一步地“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个“掌握知识分子”，是毛泽东1939年12月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文中表述的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毛的目的是培养“忠实”的驯服工具，使知识分子按照他的意志去创作和发声，包括高声大语地歌功颂德、反目成仇地构陷批判等。实现这种“掌握”的方法，就是“思想改造”。后来，以《讲话》建立的标准为工具和武器，毛泽东反复地夸大“工农兵”的政治权重，用“思想改造”的方法成功地拿掉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权重，从而结束了自变法维新、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政治协商以来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建立起了符合党国体制的政治文化。

几十年来，中国文化艺术界甚至思想理论界、教育界，几乎无人不受《讲话》影响，而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的存在与否，决定着民族文化的历史走向。■

（责任编辑　黄　钟）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硬伤

○ 施滨海

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以下简称傅著)自去年下半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香港推出中文版之后,今年元月在中国大陆出版,首版50万册。《人民日报》元月16日率先在要闻二版发布《邓小平时代》出版中文版消息,6天后又发表记者对傅著作者3000字的专访《告诉西方,一个真实的邓小平》。出版当日,新华社发文《"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让西方世界更了解中国》。24日,《光明日报》紧接着也发表了记者的访问记《傅高义:哈佛大学的"中国先生"》。《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竞相报道一个外国学者的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如此盛况,可谓空前。

不管怎样,傅教授自己有言在先,"如果书中史料有误,愿意改正"。为此,笔者想就傅著中提出并贯穿全书主线的"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见傅著第194页、第246页、第247页、第248页)和"在中国人眼里,三中全会标志着使中国转型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开始"(见傅著第246页)以及"中央工作会议不但为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提供了推动力,而且成为一个高层干部更坦率的检讨以往的错误,思考未来新路线的论坛"(见傅著第239页)等若干重要环节的史实问题与傅教授商榷。

徘徊就不存在前进

邓小平有没有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中央工作会议有没有为邓取代华提供了推动力,以及在中国人眼里是不是可以说,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开始,这涉及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的诸多事实和评价问题。

影响至今的说法,认为这两年是徘徊的两年,直到1978年年底才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究竟如何看待三中全会以前的这两年?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曾经有过一个基本看法,他说:现在回过来,应当如何估计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呢?我的意见是不是这样说: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的大事,我们是在艰难复杂的条件下前进的,或者按小平同志说的,我们是在徘徊中间前进的。我们的许多老同志,许多地方党委,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也还是遇到不少的阻力、干扰。这个话究竟怎么说好,应该斟酌。我觉得,把这两年估计得不恰当,可能全党不赞成。(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卷,第74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可见,对于1977、1978这两年如何评价,"徘徊中间前进"也不是一个明确的定论。只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华逐渐淡出权力核心以后才形成了"徘徊"论。

其实,胡耀邦后来还说过:"77、78这两年的工作是比较顺心,比较打得开局面的",又说"怎样评价过去的两年?77、78年是政治大搏斗的两年,是翻天覆地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见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第157页)笔者以为这是胡耀邦放开胸襟无意中的自然表白,也是真实感慨。换句话说,没有这两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最终不可能形成三中全会的历史贡献,即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扫除了改革开放与平反毛泽东时代大量冤假错案的意识形态障碍。尤其是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真正贯彻了党内民主政治生活原则,而党

的三中全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工作重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不说正是这两年“扭转乾坤”作用的逻辑结果。

处于当时最高领导地位的华国锋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主张党内思想有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不同观点的交锋，直至斗争，又强调要从团结愿望出发。胡耀邦同志1978年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印证了华国锋同志的亲力亲为。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见《胡耀邦思想年谱》，第212页）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又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根据胡德平同志的回忆，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见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第109页）

笔者在认真阅读傅著中，不仅没有见到上述（包括下文要谈的）这些时间早于2013年元月的史料，相反的是一些由作者编织而成的“解读”。傅著第366页至367页上，为了说明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连续召开的9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是否免去华国锋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个主要职务引起辩论时，作者引用了胡耀邦在11月19日的部分讲话，而这些“讲话”被修改后，都归之于胡耀邦之口。比如“党和人民绝不会忘记华国锋在逮捕‘四人帮’上做出的贡献，尽管他夸大了自己在这一成就中的作用；由于‘四五’示威活动后形成的政治气氛，逮捕‘四人帮’并不是难事”。

事实上，胡耀邦的讲话是：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出来工作的小平同志，是写了一封信的，说国锋同志至少可以搞二十年。这个话是真诚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他还讲到：我们反复说，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起了一些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减少了我们党和人民的损失，而且处理得很果断，从这一点上讲，是有功绩的。但是，为什么能够不费一枪一弹，一举粉碎“四人帮”呢？这就是当时国锋等同志顺应了党心、民心，再加上粉碎“四人帮”以前，人民群众起来了，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四人帮”当时已经是孤家寡人了，粉碎他们如同摧枯拉朽。说天安门“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这是唯物主义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过来说，为什么毛泽东同志不能够摧毁所谓“刘、邓司令部”，搞了十年，摧垮不了呢？不是说他老人家的本事不大，而是因为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同志在这件事情上违背了事实，违背了党心、民心。所以，说是“英明领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个看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错误的。

又比如说到“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继续执行错误的阶级斗争路线，他没有广泛征求意见，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胡耀邦的讲话实际是：国锋同志确实另搞了一套，叫做继续批邓，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急急忙忙建立毛主席纪念堂，急急忙忙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急急忙忙号召广大干部为“文化大革命”要三个“正确对待”，不分青红皂白地追查“谣言”，等等。

傅著接着还说“华国锋对待老干部都非常粗暴。尤其是他拒绝为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平反，害怕老干部复出干扰他的统治……”。

而胡耀邦的讲话却是：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

197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同大家一起合影。

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我就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很果断，解放老干部就那么顾虑多端，顾虑重重？我看，确实是有一种心理状态，讲得客气点，我看有这么两点：这一批老家伙总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这些人出来以后难领导。

对照耀邦同志的那次讲话，傅著中的“引用”，可以说有些是曲解，有些甚至是无中生有。而被作者认为是“一份关键性的文件”，几乎面目全非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令人疑惑的是，本来像胡耀邦1980年11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作者完全可以照搬照抄更安全可靠一些，不知作者为何没有这样去做。所以，笔者也只好推想，傅著有意贬低华国锋同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个人作用。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而“不积极、不热情”同傅著中引用的“对待老干部非常粗暴”“害怕老干部复出干扰他的统治”就不是一回事了。据戴煌的著述，华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另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国锋批准的。

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可谓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对他们“非常粗暴”，也看不出“害怕老干部复出干扰他的统治”。

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主持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对邓小平的处理方针，毛泽东称赞邓小平的地方有十几处，原来全部删除，现在一概保留不删。这样做，是对邓复出的支持还是阻挠？

在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产生分歧意见时，华倒是表现得宽容、克制或者说是息事宁人。比如，傅著中关于华国锋从朝鲜回国后打算在东北停留并想在大连举行一次有120艘军舰参加的海军检阅的内容。邓利用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取消了检阅。（见傅著第230页）二十年后，1998年12月7日，苏振华的夫人梅迪伦去看望华国锋时，谈及当年阅兵的事情，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任军委主席，但我对部队情况了解很少，刚粉碎“四人帮”时，工作太忙，也顾不上到军队走走。1978年初，叶副主席和军委常委都劝我到部队走走看看，以利以后工作。因此，我先在杨村看了空军飞行部队的汇报表演，当时军委领导同志差不多都去了。所以我打算在访问朝鲜后，回来顺便去旅顺看看海军部队，但日程没定。苏振华同志要到部队蹲点搞查整改运动，离开北京时间比较长，按惯例政治局同志离京时间较长，都要向中央报告。在他向我请假时，我顺便告诉他我拟看望海军部队的打算。后来访朝回国后，工作安排太紧，也就没去成。当时，我是军委主席，去看看海军部队，是完全正常的。有人说苏振华同志到我这里告状，根本就没那回事。（见《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第43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显然，倘若当时没有不同看法，也不会有事隔二十年后，旧事重提，华国锋坦露“当时，我是军委主席，去看看海军部队是完全正常”的心迹，以示自

己磊落。所幸傅著已有结论，无须笔者赘言。

没有叶，邓会受孤立

傅著为使“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的立论能站得住脚，进而推断出中央工作会议成为邓取代华的推动力的结论，在书中披露了一个与其说是鲜为人知的“史料”，倒不如把它看作是作者自己对当时政治风向的“解读”。中央工作会议是由华国锋召集的，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自己意识到这次会议将对他本人意味着什么，而邓小平在11月14日访问东南亚归来之后，听说北京的气氛已改变，又让他的笔杆子为他写了一份完全不同的讲话稿。紧接着，在写到“叶剑英很快意识到了环境的变化已经大大削弱了对华国锋的支持度”之后，作者发挥想象力，用了“于是在11月11日叶帅和数位高级官员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小型会议”的爆料。傅著是这样描绘这次私底下的密谈的：会议内容甚至没有向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公开。他们决定，华国锋不能胜任担当最高领导权的工作。他不敢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对他们委以重任，他没有得到高层干部的衷心拥护，而他们的支持对于领导党和国家至关重要。他们一致同意给予邓小平比华国锋更大的权力。但是他们反对单独一人就能做出重大决策的想法，同意让陈云重新进入政治局常委，与邓小平一起掌握党内实权。这一天稍后，叶帅与华国锋谈话，劝他准备一篇讲话，表示他也接受这些变化。关键的戏剧性一幕发生在11月11日到25日之间。当邓小平15日开始参加工作会议时，会议的焦点已从经济转向政治，而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作者为了证实自己的“解读”就是“史实”，借用一些党内老领导后来的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见傅著第231页）这个所谓“小型会议”结果自然而然成为傅著贯穿于全篇的一条主线，如此，邓成为“头号领导人”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在1978年的历史上有没有这样一次由叶帅和数位高级官员参加的“小型会议”，笔者在傅著中文版推出前不曾耳闻，出版后几经寻找也未能目睹。在这里，笔者可以断言，无论从目前官方已经公开的档案中，还是相关当事人口述、回忆里，都无法证实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的两年时间里党内高层有过解决华国锋问题的任何动议。

这里，我们再来看一段叶选基的回忆，应该有助于我们对傅著“小型会议”爆料的辨伪。邓小平当年从新加坡出访回京后，曾到军科二号楼与叶帅畅谈，他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十分满意。但邓也提出：“现在的宣传有问题，宣传华国锋，抬轿子都抬过河去了，我们现在要强调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党是集体领导，要吸取‘文化大革命’把主席抬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教训。”叶表示完全同意。两个老聋子说话，声音很大。（见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畅谈”的内容与时间，在《叶剑英年谱》也有所记载，大致与叶选基的回忆相吻合：11月中旬在住所同出访归来的邓小平谈话，就中央工作会议上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两人还谈了中央要加强集体领导，反对突出宣传个人问题。（见《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卷，第11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邓小平回京的时间是11月14日，按傅著所言，叶与高层的小型会议是发生在11月11日。邓与叶“畅谈”，竟然未能谈及“小型会议”，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诸多疑惑。从历史看，叶对邓是情高义重，更视其为“千秋知己”。“畅谈”中只有邓讲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强调集体领导，云云，而叶仅是附和、赞成，对发生在仅仅几天以前的“小型会议”只字不提，不同被自己视为“千秋知己”的邓交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华和叶帅在邓出来工作前后的讲话和态度。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回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

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而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见韩钢《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至于叶的历史作用，叶选基认为可引用陈云12月10日在东北组的发言，当时陈云针对汪东兴的错误说道：“现在党内议论纷纷，就怕常委出问题，许多同志因叶帅年老了，怕将来要出事，就怕邓小平被再次打倒。”（见《陈云传》）这段话是否可理解为邓当时还不到“一言九鼎”的地位，叶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呢？叶选基的结论是，没有叶，邓会受孤立，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应是陈云同志讲话的本意。（见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读了陈云这段话的内容，我们还能对邓小平在1978年已经成为中央头号领导人再说些什么呢？

华、叶、邓是三驾马车

近年来有人想把邓小平理论的起点溯源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并不赞成。他认为，因为那时邓小平没有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他明确指出：“邓小平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领导核心，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见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210页）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笔者以为，傅著中所指的“头号领导人”应该与龚著中的“实际上的领导核心”意思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似乎还有必要来摘录一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最后一段话的最后几行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之所以要引用三中全会公报的最后几句话，表明华国锋在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党内的地位是稳固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他是当时的头号领导人。公报的表述是不容置疑的。更何况，三十多年以来，我们党从来没有对三中全会公报有什么评价上的变化。而起变化的倒是，华国锋去世后，过去广为流行的说法，如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被经官方审定的新华社的生平统统推倒重来：

比如，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和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见《华国锋同志生平》，《人民日报》2008年9月1日）

值得注意的是，傅著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香港中文繁体版出版于2012年，而大陆中文简体版出版于今年元月。光从时间上看，作者有足够的时间去发现、去梳理、去考证并“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

笔者最后认为，不论是三中全会决策，还是改革开放的启动，都是由党的领导集体顺应时代趋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共同发起和推动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如果从恢复历史真相的意义上讲，在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华、叶、邓是三驾马车，谁也离不开谁，而叶至少起着平衡的作用。回顾历史，我们讲叶、邓等人的功绩，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有华国锋的贡献。■

（作者为原《中国经济时报》编委）

（责任编辑　黄　钟）

读《苏共亡党之谜》

○ 王 进

苏联亡党解体已经过去二十三年了，可是关于苏联亡党解体是非成败的争论和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这个题材，在中国的社科领域几乎成了显学。究其原因，无外乎有三：一是中国文化历来有以史为鉴的传统，特别善于从历史巨变中寻找王朝更替的经验；二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着天然的联系，过去我们经常讲“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随着苏联解体后，很多重要机密文件解密，我们渐渐明白了：早期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主要的背后推手是苏联共产党。如今，母体不复存在了，那么子体如何生存？自然成为关注的话题；三是当下的中国，面临着很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很多问题与苏联解体前的状况惊人地相似，譬如官员的腐败、社会风气的堕落、利益集团对权力的垄断、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异化等等。

如何真正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行政技术方面的措施删减、民生问题的微小改善，来掩饰体制性、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屏蔽当下中国迫切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对于清醒者来说，除了借鉴西方的先进理念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些因素的存在，决定了对苏联亡党解体这个历史问题的研究，需要厘清是非，汲取教训，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寻找崭新的方向。

李永忠提出过“有条件赦免贪官论”的主张，曾经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致力于政治制度和反腐败学说研究，著述颇丰，他和董瑛最近出版了《苏共亡党之谜》一书，从权力结构和制度设计方面，解读了苏共亡党的原因。

在很多学者专家看来，苏共一个有着七十多年历史的老店，轰然坍塌，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有“权力垄断说”“体制弊端说”“改革失败说”“蜕化变质说”“精英叛变说”“党群脱离说”“腐败亡党说”“和平演变说”“斯大林模式说”“民族矛盾说”“军备竞赛说”“舆论失控说”等等将近二三十种。

在社科领域，越是一门显学，研究的人就越多，研究成果就不一而同。况且，中国现在的学术环境不好，急功近利者很多，垃圾成果遍地都是。但对于苏共亡党这一特殊、严肃的命题来说，如果任由劣质成果在研究领域占据主导位置，一旦运用到实践领域，那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仅起不到警示借鉴作用，反而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在对待苏联问题上，就有几种理论非常值得警惕。

一种是“舆论失控论”。有人错误地认为：苏共起家和亡党都与舆论有关。早期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建立红色苏维埃，打败德国法西斯，就是因为很好地抓住了舆论工具，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主导了苏联人的意志。而晚期之所以失败，就是放松、失去了舆论控制，被敌对分子钻了空子，失去了思想阵地。他们认为，中国也存在这种危险的状况，要避免苏联的败亡，首先要加强舆论控制，加强对思想战线工作的领导，时时刻刻提防和平演变。受这种思想的引导，国内的思想舆论阵地，除了领导的画面和声音，就是娱乐，民众的呼声成了点缀。

另一种说法是“军队失控论”。党指挥枪，是列宁军事思想的精髓，斯大林时代把这项理论发挥到了极致。到了苏联后期，接连出现“病人治国”的状态，管理松懈，思想混乱，军队失控。特别是改革派领袖叶利钦与当政者戈尔巴乔夫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刻，军队明显保持中立，这样一来，克里姆林宫成了不设防的阵地，反对派轻而易举夺取了政权。这种说法，目前在中国很有市

场，他们主张中国共产党改革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只要枪杆子握在自己人的手里，江山就会永不变色。

“舆论控制说”显然不能解释中国历史。国民党时代实施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一些主张言论自由的进步人士被迫流亡海外，有的人还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如此严格的新闻制度下，为什么国民党政权还垮台了？道理很简单：顺民者昌，逆民者亡。一个执政党存在与否的标志，是顺民心还是逆民心的问题，而不是表面的舆论控制的问题。

“军队控制论”也不足以解释中国历史。北洋时代好几届都是军政府。每一任总统上台，靠的是跟随自己多年打天下的子弟兵，各省督抚都是自己人。可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不是军队倒戈易帜就是士兵哗变，军政府败到了自己的子弟兵手里。什么原因？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军队不是拿枪的木偶，士兵也是由人组成的，只要是人，他就懂得是非成败、民心所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主张加强舆论控制和军队控制的人，并不是少数，林彪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他曾提出过著名的“二杆子”理论，只要控制好笔杆子和枪杆子，就可以平安坐天下。可结果怎么样？

此外，腐败亡党、权力垄断等等理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一座辉煌的共产主义大厦为什么顷刻土崩瓦解。李永忠先生在《苏共亡党之谜》一书中给出的答案是：“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是苏联模式的两大核心标志，也是导致苏共亡党的两大“谜底”。

“议行监合一”的行政体制，不需过多解释，大家都明白，是决策、执行和监督三项权力的重叠，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在权力运行上“既当运动员，也当裁判员”。中国从隋唐建立文官制度之时，就一再倡导：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离分设。世界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也是“三权分立”。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却运用了落后的“议行监合一”制度呢？究其原因，就是在落后的地方短期内实现剧烈变革，没有强制性的执行力和控制力是办不到的。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威权体制”成就经济繁荣。因为经济繁荣了，人们错误地认为“三权合一”是个好制度，殊不知这个制度的坏处，远远大于它的好处。

李永忠先生如此计算：“专制制度，它的好处遇上明主以后，可以发挥到百分之九十；可是一旦遇上昏主，它的坏处就可以发挥到百分之百，制度的优劣性完全决定于人本身，而不是制度本身，与百姓切身利益更是毫不相干。民主制度的最大好处，无论明主还是昏主，它的好处可以发挥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它的坏处丝毫不会高于百分之三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从制度上做文章总比选择昏明君主要可靠的多。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遇上后期斯大林，苏联制度就是封建暴政的翻版。要想避免历史的悲剧，关键在制度上做文章，而不是在人选上做文章。

“等级授职制的”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上级通过公权私授这种形式，把被授人变成自己的驯服奴隶。古往今来，权臣都是通过人身依附来控制局面，形成帮派，左右权力的。《苏共亡党之谜》中揭露道：自斯大林开始等级授职制，苏共培养和固化了“克格勃集团”“军工集团”“第聂伯罗帮”“太子党”“秘书党”“官二代”等各种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最终垄断了国家权力、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渐行渐远，最终被人民所抛弃。

李永忠也为当下中国开出了“党内民主制”的药方：

借鉴小平同志在经济改革方面搞四大经济特区的办法，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要选定一些成熟的地方设立政改特区。在选举方式上，摒弃过去老套的等级授职制，特别是要砍掉操纵选举的幕后组织黑手，实施自由公平的党内民主选举；在制度建设方面，推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精神文化领域，让自由民主的旗帜高高飘扬；在社会建设方面，创造公平民主的社会氛围等等。如果试点特区改革成功之后，推广或者克隆到其他地方，这样就可以以点带面，以下促上，全方位推动停滞的政改，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带来的震荡，确保持政权稳定，最终顺应人民群众对民主政治的真心诉求。■

古今“罪己诏”

○ 侯宜杰

“罪己诏”指皇帝责备自己而下的诏令。颁发的原因，大致有二，一因灾异而发，二因做错事情而发。

灾异多属自然现象，如水灾、旱灾、蝗灾、地震、彗星、日蚀、山崩、冬天打雷、春天降雪等等。出现这些现象皇帝为何要下罪己诏呢？因为皇帝相信“天命”之说，以为自己是上天之子，代表上天治理人民，若是出现这些现象，给人民带来灾难和死亡，他们认为都是自己不好造成的，所以上天向他发出警示，往往引咎自责，下个罪己诏，检讨一下自己的过失，做点好事，或命官员直言朝政得失，以求补救。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每个朝代均有，如晋武帝在太康七年（286年）下诏说：“比年灾异屡发，日蚀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善，实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用袋子封缄的上书），极言其故，勿有所讳。”北魏孝文帝在太和九年（485年）下诏说：“数州灾水，饥馑一再遇到，致有卖鬻男女者。天之所谴，在予一人，而百姓无辜。”宋太宗因为大旱和多次出现彗星，在端拱二年（989年）下诏说：“朕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亦未足以答谢天谴。当与卿等审刑政之阙失，稼穑之艰难，恤物安人，以祈天佑。”

有些官员认为灾异属于自然现象，并非人事得失招致，劝皇帝不要相信上天示警。另一些官员则极力反对，其主要理由不在于不相信上天示警，而是认为这是关系到皇帝纳谏和治乱的重大问题。如富弼得知有人对宋神宗解释灾异皆是自然现象时，就说：“皇帝所畏惧的只有上天，若不畏天，还有何事不能干的！说这种话必定是奸人想进邪说，摇动君心，使谏争之臣无有所为。此乃治乱之机，不可不速补救。”当即上书，进行批驳。正因如此，每当灾异出现，常有官员借机上书，请求皇帝上畏天戒，下修人事，痛自修省，讲道论德，进贤退奸，省刑薄敛，惩治贪官，节约开支，减轻力役，招抚流民，散财以收民心，爱民以植邦本等等，以回天意。皇帝畏惧“天命”，听从采纳了，人民的疾苦就减少一些。对于高度集权的专制皇帝来说，只有“天命”能够约束他不敢过多作恶，所以他畏惧“天命”虽属迷信，却也有有利于人民的一面。

因做错事情，造成人民疾苦死亡而下罪己诏的，史书中也不乏其人。如汉文帝在后元二年（前162年）下诏说：四边之外的戎狄不安其生，京畿之内的人民不能安居乐业，都是因为他德薄造成的。汉武帝在征和四年（前89年）六月下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过去每人增赋三十钱，使老弱孤独陷于重困；对匈奴用兵，军士死亡离散。汉元帝在永光二年（前42年）二月下诏说：由于他的不明，政事治理得不好，以致百姓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甚感羞耻。汉成帝在永始元年（前16年）七月下诏说：他没有与多数大臣商量，误听将作大匠解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可是营建了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完工。天下为此虚耗钱财，百姓因之疲劳，终不可成，十分忧伤不安，此项工程立即停止。东汉光武帝在建武六年（30年）十月下诏说：我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凌，百姓失所。

天成三年（928年），京师洛阳巡检军使浑公儿向后唐第二个皇帝明宗奏报说：“外面有百姓二人，用竹竿当武器练习武功，图谋不轨。”明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交给石敬瑭（明宗的女婿，七年后投靠契丹，推翻后唐，自己当了皇帝）处理。石敬瑭不问清楚，就将二人杀了。第二天，枢密使安重诲上奏说：“昨天逮捕的两个人，实际上是在一起玩耍的幼童，并不是练习战斗的百姓。”明宗听后大吃一惊，知道杀错了人，马上下诏向全国人民检讨滥用刑罚，减少自己十天的食品，以向冤魂谢罪。并且处罚了不细心审理的石敬瑭一个月的俸禄，把诬告陷害的浑公儿杖打后流放到登州。非但如此，明宗还赐给两个少年每家五十匹绢，一百石麦，一百石粟，让官府出钱为两个少年隆重地办理了后事，弥补自己的过错。为了防止今后再出现此类事件，又下严令，州府官吏以后对所有死刑案件，必须仔细审理，决不

能随便滥杀无辜。

宋徽宗和宋钦宗因为金兵长驱南下，无力抵抗，均下过哀痛之诏，罢除害民的花石纲，改革弊政。逃到杭州的宋高宗也下诏说自己有不知经邦大略和戡难远图等四大错，命将诏令在朝堂榜示，遍告天下，使人民皆知其悔过之意。

崇祯在最后的十年中，曾三次颁发罪己诏。

清朝前期有几位皇帝下过罪己诏。顺治在临终之前下的一道罪己诏，胪列过错十四款，其中有关国家大政的有：没将国家治理好，没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生日子；姑息庸劣不称职的大臣；营建殿宇，糜费太多，不体恤百姓的艰辛；自恃聪明，不能虚心纳谏；自知有错，不能及时改正，过错越积越多等。

到了清末，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执政，同样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过罪己诏。慈禧是因为纵容庇护义和团打洋教，引起八国联军进京而发的。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她知道为国家民族招惹了大祸，对不住反对开战的光绪和全国人民，脸面丢尽，在西逃的路上，即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说：造成此次事变，“负罪实深”，“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相隔两天，又发布上谕，承认自己没有及时觉察祸患，要有奏事之责的官员，对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随时直陈无隐。在1901年10月2日和12月2日颁发的懿旨中，她都将自己犯了错误和“引咎自责”之意公开告知大小官员和天下人民。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云南相继宣告独立，载沣追悔莫及，同月30日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诏说，执政三年以来，用人不当，治理无术，高官多用亲贵，显违宪政，铁路国有及向外国借款修筑朦于小人，动违舆论，以致引起各省之乱，全国沸腾，人心动摇，“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罢除。”

皇帝握有无上权力，可以独裁一切，为所欲为。由于个人的理念和品德等方面的原因，各人的表现又不相同，既有秦始皇、隋炀帝之类的独夫民贼，以为自己永远正确，怙恶不悛，不会公然向天下臣民承认错误，损害自己的形象。又有些犯下过错，勇于向天下宣布，做出检讨。此类皇帝，无论是因为畏惧“天命”，还是认识到确有错误，是为了挽救王朝的厄运，还是为了长治久安，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出于自觉自愿，能够公开“罪己”，都说明他们有几分悔过诚意，有向善的一面，有一定的责任心。像后唐明宗由于错杀两个少年而向全国认错，妥为处理善后，很有仁心的皇帝，尤属难得。只是由于承认过错的时机和采取的措施各异，其结果也大不一样，有的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人民所受痛苦减轻，混乱动荡的局面渐趋稳定；而宋徽宗和宋钦宗却没有挽回丧失的大片领土，被金人俘虏，最终落得个惨死于异域的可悲结局；载沣的罪己诏同样没有挽回大清王朝灭亡的命运。

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做了错事，特别是危害全国人民的错事，敢不敢公开承认，向全国人民深刻检讨谢罪，彻底改正，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品质和素养问题，而是关乎国家兴衰存亡和人民祸福生死的大事，不能有丝毫的轻忽。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皇帝退出了历史舞台，罪己诏也随之消失了。但类似的申令、布告还延续了几年，虽然颁发者并不一定真有诚意。如1916年3月22日洪宪皇帝袁世凯在撤销帝制的申令中说：“万方有罪，在予一人。”1918年总统冯国璋因发兵攻打湖南、湖北，也颁发过一道布告，承认此举错误。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无论做错了什么事，犯下了什么罪，对人民造成多大的危害，却再也见不到哪位总统和执政像颁发罪己诏的专制皇帝那样，公开地真诚地向全国人民认罪检讨了。

走笔至此，不禁想起外国一些领导人对错误的态度。外国有些领导人做错事，哪怕是极小的错事，都公开向人民道歉。如立陶宛总理基尔基拉斯在酒店接待贵宾时抽了一支烟，违反了公共餐饮娱乐场所禁烟令，不仅支付了罚款，向酒店经理道歉，还通过电视台，向公众表示歉意。有的虽然自己没有做错事，由于是国家行为，也代表政府承担责任。如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1971年访问波兰时，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纪念碑前下跪。1885年至1923年期间，加拿大政府曾强行向华人征收“人头税”，此后又实施排华法案。对此，加拿大总理在2006年即代表政府正式向全加拿大华人道歉。2008年，美国国会也正式通过决议，为二百年前美国实行的奴隶制道歉。

不久前巴拿马总统里卡多·马蒂内利·贝罗卡

尔为护照出错而公开道歉的事，亦颇令人钦佩。2010年，巴拿马国家护照管理局设计并制作了护照样本，得到里卡多的赞赏。10月3日，里卡多忽然发现护照上有一个非常细微的错误，即将巴拿马国徽中十字交叉的铁锨和丁字镐印成了铁锨和长柄方锤。他认为国徽出错是个大事，首先要求护照管理局立即更正，用最快的速度赶制新护照，统计出投用的错护照数量。护照管理局统计出已用错护照四万份。里卡多又要求用最快的速度把这四万个人的名字打印出来，他要在第二天发表电视讲话，向这四万人道歉。

10月4日晚上，里卡多准时走上演讲台，先介绍了道歉的原因，然后拿起手中的名单说："这四万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曼格艾尔·阿马多加·雷亚罗……"一个接着一个地念下去，念了三个小时，仍在继续。

他的电视道歉打动了整个巴拿马，也打动了身在国外的巴拿马人，他们纷纷从海外各地打越洋电话回国，劝告总统停止道歉。

里卡多对他们说："如果连具体名字都不念，那还谈什么尊重与道歉呢？如果连一个道歉都无法具体地落实到一个人的身上，那还指望我为你们落实什么呢？如果我连为自己承担错误都做不到，谁还能指望我来为这个国家承担什么呢？"

二十二点五十分，在道歉进行了将近四个小时的时候，有一位海外巴拿马人在电话里说："总统先生，如果你对民众们的建议如此不在意，我们还能指望你今后能听取我们的什么建议呢？"

这虽是一句普通的问话，但在里卡多听来，却深感分量很重，于是郑重地抬起头来，对着与电话连线的麦克风问道："你们真的可以原谅我的这个过失？"

电话连线那端的听众肯定地回答说："总统先生，我们原谅你！"

直到这时，里卡多才停止念名字，真诚地向着镜头鞠了一躬，说了一声："谢谢我可爱的巴拿马民众！"然后才走下讲台。

国家领导人做了错事向人民真诚道歉，非但不会失去什么，反而能够获得人民的信任和尊敬，有利于化解民怨，促进社会和谐，比死不认错者的形象高大得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苏俄的新闻审查

○ 李玉贞

本文介绍的，是《严厉的新闻审查——苏维埃国度里的作家和记者（1917-1956）》（Большая цензура — писатели и журналисты в стране Советов）一书，它是大型档案丛书《二十世纪的俄国》中的一本，2005年在莫斯科出版。

一、鲜为人知的《出版法令》

本文介绍《严厉的新闻审查》的第一部分《列宁同我们在一起》，因此，了解十月革命后的政策产生背景是十分必要的。

斯大林发出严厉的声音。1917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掌权，在那个震惊世界、决定俄国命运的11月7日晚间－11月8日凌晨，布尔什维克派与其多年的战友孟什维克派领导人、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坐在斯莫尔尼宫的会议桌旁举行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刚刚发生的起义，退出会场。就在这个夜晚，列宁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多数派组成了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的政府”。这个政府捍卫的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利益。”（《列宁选集》第3卷第370页）这个思想决定了新政权对于非工农阶级的排他性。符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卡列林是社会革命党成员，属于还可容忍的左派，他拒绝列宁的主张，认为这个政府仅仅代表布尔什维克一派，并非真正的苏维埃政府。他不仅不参加这样的政府而且在许多问题上与列宁、斯大林发生了激烈争论。

就在那个夜晚，当讨论具体政策时，昔日互为战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发生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分歧。具体问题之一就是对待新闻自由和所谓政治犯。卡列林持有的是孟什维克的观点，认为应当马上做的是：释放所有政治犯，实行言论自由，不仅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纸，所有资产阶级的报刊全应享有自由出版的权利（《严厉的新闻审查》，第1号文件，以下只标示文件号码或页码）。

斯大林认为：“这些条件完全不可接受。”（第1号文件）

迄今为止广为人知的是十月革命后昭示布尔什维克新政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这两个重要文件，而斯大林的上述发言却鲜见提及。事实上它与前述法令几乎同时产生。11月9日布尔什维克正式颁布了《出版法令》，规定了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或曰反革命报刊的措施：凡号召公开对抗或不服从布尔什维克劳农政府的，明目张胆地污蔑新政权、歪曲事实以散播混乱的，号召人们采取明显的犯罪性质行动的报刊，一律予以查封，取缔。

《出版法令》一经宣布，政府便雷厉风行，到1918年1月，120家反对派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刊物被封，最大的非共产主义报纸《俄国的话》《新时代》《言论》《股市信息报》等都在其中。

《新生活报》这份被列宁称为“更多地倾向于资产阶级方面的报纸”，曾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随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大喊大叫”，说十月“起义破产了”，布尔什维克党“瓦解了”（《列宁选集》，第3卷第371页），这份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的报纸1917年曾被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封闭，后更名《自由生活报》再版，对十月革命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封闭。

布尔什维克掌权初期，俄共（布）领导人中就新闻的性质确实存在过分歧。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认为报纸应该客观报道各类消息，应当允许针砭时政。列宁则认为报刊不应该仅仅是客观报道政治新闻的机构，而更加重要的是要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喉舌，成为党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然而随着国内反苏活动的加剧，特别

1918年，列宁在克里姆林宫

是1918年苏俄国内战争的发生，俄共（布）领导层持不同意见的各方鉴于局势的极其严峻性，感到必须抱团取暖，在保住布尔什维克政权这个基本前提下消除了分歧。列宁观点占了上风，大家达成共识：报纸应该具有鲜明的布尔什维克党性，它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组成部分。从此“党性”成为苏俄新闻事业不容置疑的铁定原则。

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他在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重要的后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圭臬的题为《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于其中猛烈抨击资产阶级的“纯粹民主”和“一般民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享受民主。他批评资产阶级的所谓集会自由和平等。列宁把“出版自由”归于资产阶级的“纯粹民主”范畴而加以反对，他宣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列宁选集》第3卷第719－720页）对于所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势力，不管他们以什么形式活动，明火执仗地用枪杆子或用笔杆子宣传资产阶级“纯粹民主”和“一般民主”的人，都应被视同资产阶级反抗无产阶级和苏维埃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列宁选集》第3卷第723页）用革命的“暴力”镇压资产阶级思想和言行就这样纳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之中。

为执行上述法令，对于国内资产阶级刊物除了采取政治上封杀的手段，苏维埃政权还把它们的印刷厂，数量相当可观的印刷设备、纸张等，通通作为“敌产”予以没收，使之“断粮”而无法印刷出版。新政权的《真理报》《消息报》《士兵真理报》《贫农报》等也有了物质支持。到1918年6月有150家印刷机构被没收。列宁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即官吏，还有财富特权、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列宁选集》第3卷，第606页）后来，即使有一些“非共产主义”刊物改头换面再行出版，也因其依然不能让布尔什维克满意而遭查封。

同时，俄共（布）或直接或间接通过共产国际派遣赴各国使者宣传苏式革命。布尔什维克报刊力图告诉全世界，俄罗斯大地上出现了新气象，一个社会主义者向往已久的大同世界似乎已经出现。到中国来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使者有充分的自信，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最优秀的社会制度，他们自认给中国人民送来了“普罗米修斯的天火”。从1920年起俄共（布）远东组织的党员吴廷康，远东共和国的优林使团，都负有鼓动中国“革命”的任务，他们带来了大量布尔什维克出版物，北京政府因优林使团在北京鼓吹俄式暴力革命，进行敌对中国政府的过激派理论的宣传，而认为他们违犯了两国关系准则。

还是转回苏俄，在那里《出版法令》和政府的做法引起普遍愤怒和反弹。被称为“国家良心”的著名作家柯罗连科于1918年在《俄罗斯信息报》发表文章抗议列宁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说布尔什维克这个法令对出版事业的压迫在一定程度超过了沙皇的做法，“甚于专制时期，更加苛重”，“是最为恶劣最具侮辱性的新闻审查”。他批评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权利为了一党的狭隘私利”而剥夺公民出版的自由。一度与布尔什维

克合作的高尔基也在《新生活报》撰文，对苏俄政府的政策表示强烈不满，他说，布尔什维克可以“挥拳让《言论报》和其他资产阶级报刊闭嘴”，说他们“反民主”，可这样的做法恰恰才正“是民主的耻辱”。他激烈抗议“新政权”利用沙皇“老办法”，称这种“剥夺言论自由的做法乃是在实施强暴”。

1918年1月底，苏俄人民委员会通过了更加严厉的《关于出版界革命法庭》的法令，据此法令，凡一切反苏的、有悖新法律的言行，通通要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开启了以言治罪的先例。非布尔什维克报纸的被封已经引起相当大一部分人的不满，因言获罪者越来越多，打击面越来越大，这个做法虽然一度在许多地区实行，但是由于普遍的抵制和反抗，审判并不顺利，有的地方革命法庭在审判被告时，后者据理力争为自己辩护，振振有词，反而利用了这个场合来争取群众，有的地方，如在哈尔科夫，对社会民主党的审判受到工人抵制，且庭外工人以罢工表示抗议，结果法官反被吓跑了。这类革命法庭在1918年5月被迫取消。

如果说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人被布尔什维克视为政敌，那么列宁的战友，苏维埃制度的拥护者和实践者，著名的罗莎·卢森堡的看法应当具有一定客观性。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布尔什维克做法持有异议。例如，针对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她说“列宁－托洛茨基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他们所说的自由，“仅仅是拥护政府者的自由，仅仅是一个党的成员的自由——不管这个党的党员人数有多少——这不是自由。自由永远应当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她十分担忧，苏俄没有选举制，没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各派思想不能自由竞争，任何一个社会机关都会没有朝气，“苏维埃的生机”必然受到“压抑”从而势必导致“社会生活的野蛮化——谋害、杀人灭口等”现象的发生。罗莎·卢森堡指责布尔什维克“把贫穷当善举，现在又想从理论上全面肯定自己在这些命定的条件下实行的策略，并且将其当作值得效仿的社会主义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

更有其他敌视这场革命的人猛烈抨击布尔什维克，说该党鼓动流氓无产阶级造反，它实行的政策是对俄罗斯乃至人类文明的“野蛮践踏”。列宁则予以猛烈回击，他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共产党宣言》所说：“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列宁要创建的是无产阶级的新文化。他于1920年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否定一切超越阶级的道德，我们说的道德，应当是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务的。我们的道德是以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为出发点的。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列宁固然说过“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但又话锋一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299页）

二、关于《严厉的新闻审查》一书

书中计473个文件，按时间顺序分编为五个部分：列宁与我们在一起（1917－1924年1月）；斯大林——今天的列宁（1924－1929）；大转折（1930－1939年9月）；和平，战争与和平（1939年9月－1953年3月）；早期的“融雪”（1953年3月－1956年）。前有序言一则。

所录文件介绍了从列宁开始对所有形式的出版物、可疑人员进行全面控制、监督和处理的情况：从作品的酝酿到创作过程到出版，从创作者——文学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主办人员的身份到他们的命运乃至其生死。这项工作主要由苏共中央的宣传部门负责，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它控制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舆论导向。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是新闻审查制度的筹划者，斯大林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充当了最大的审查人，编纂者、批评家和苏联国家级的“模范”作者。

现介绍书中有关内容。

《序言》以季米特洛夫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一段著名论述开始。季米特洛夫说：

同志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3次全会

[1933年]说的很对,法西斯主义掌权,就是金融资本最反动的、沙文主义特性最强的、最顽固的帝国主义分子公开的恐怖主义的独裁。德国法西斯主义乃是法西斯主义最反动的变种。它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却无耻地自诩为国家社会主义……这是一种政治匪徒的国家体制,是为对付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革命分子而实行的一整套离间和迫害的制度。这是中世纪的野蛮和残暴。

该书编者把上述定义稍加改变,用来界定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掌权(没有政权机关就没有斯大林主义),乃是俄国沦落的小市民和流氓无产阶级中最反动的、沙文主义特性最强的分子公开的恐怖主义的独裁。它用自吹自擂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蛊惑来掩盖其好战的大国沙文主义,掩盖其政治匪徒的国家政策,为对付工人阶级,农民,首先是知识分子而实行的一整套挖空心思的离间和迫害政策。"斯大林主义——"这乃是'中世纪的野蛮和残暴'以半农奴制的形式复活"于昔日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上,并以户籍制度,劳改政策等而**"带上具有特色的补充"**。

《序言》作者认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当年希特勒极其重视宣传部,视之为维护统治的利器,而他的左右手戈培尔等则高举作为"元首"希特勒的旗帜,不仅对军官而且对全体德国人实施洗脑即所谓"政治教育",事实上充当着血腥恐怖的头号刽子手。希特勒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关于"政治教育"的讲话画龙点睛地勾画出国社党这种"政治教育"的实质:**"我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武装力量,就是因为党对德国人民进行了思想教育。"**

《序言》作者认为,在苏联国内,斯大林正是坚守这样的立场,通过对思想领域和各种传媒的控制,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

第一单元《列宁与我们在一起》,共收录68个文件,介绍的是列宁时期俄共(布)控制舆论的措施和理论依据,它们构成了1956年前俄共(布)-苏共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和指导思想。

宣示新闻政策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党性,是苏维埃政权控制舆论的第一步,在这方面《斯大林在全俄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的发言》,最有代表性。它产生于1917年11月6日即占领冬宫之时。卡列林提出了革命后大赦天下的建议,这主要指处理政治犯和开放舆论,保护言论自由。斯大林当即表态:**"不能接受毫无例外地释放政治犯和出版(整个出版业)自由的条件。"**(第1号文件)

军事委员托洛茨基

11月9日,布尔什维克颁布了《出版法令》,已如上述,它形成了判定"政治犯"和对待他们的基本政策。该政策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新闻、文学、艺术、音乐、出版等等,政策制定者们后来还把这样的做法通过共产国际连同关于世界革命的宣传一道推及到世界范围。

接着就是通过媒体广泛宣示布尔什维克坚定的革命措施。例如对待"政治犯"。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所谓"政治犯"是一个大箩筐,各类人物都往里装,什么是"犯",为之下定义者是列宁和斯大林。列宁在世时,"政治犯"有两类人,一类是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他们有非无产阶级的原罪,革命后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另一类人是真刀真枪的"反动"军官。

按照斯大林上述表态,被关押者不能释放。那些尚在自由状态的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

人，也不能乱说乱动，否则就是“反苏”。这类人被剥夺的不仅仅是言论自由，还有人身自由。当莫斯科发现了针对苏维埃政权的传单时，季诺维也夫就此事给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写了报告，1921年2月28日，政治局决定“首先委托列宁同志评估形势”。其次是“委托托洛茨基同志”摘录传单中关于莫斯科凶杀案的内容“供各报报道，并拟定书面指令”，为报刊文章定调。至于那些“非共产主义”的党派，政治局决定“不能释放孟什维克。委托契卡加紧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搜捕，个别折腾厉害的工人也同样予以逮捕”。鉴于当前“反革命活动”猖獗，还“要立即责成契卡报告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非苏维埃党派的活动”（第11号文件）。

另一类人是真刀真枪的敌人——反苏的官兵，报章杂志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告诉社会，说镇压这些人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需要，另一方面这样做还可取杀一儆百之效。例如1918年间的彼得格勒守军，许多人不赞成布尔什维克，而被当成“害群之马”，布尔什维克认为这种人处处都有，红军行列里也有，斯大林说“有些王八蛋参加红军是为了出卖我们”。媒体传达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胆敢向白军表任何微小同情者，一律就地枪决。”对于投敌“变节者毫不手软，下令全国将其就地枪决”。对旧军队的眷属和“变节”投敌者满门抄斩，被认为是当然的革命行动。对于社会上的不满乃至反抗，俄共（布）当局先将其定性为反苏势力的猖獗和“反革命活动”，接着就立即颁布：“投降至白军的官兵家属，不管其地处何方，一律予以逮捕。”鉴于“这些变节者”已经属于敌我矛盾，按照《土地法令》处理他们的财产也就顺理成章，即把他们的“土地全部予以没收，永不归还”。（第3号文件）文件针对的是彼得格勒军队，但是问题在于“投敌”是什么概念？对苏维埃共产主义新政不满者比比皆是，思想与行动没有区别，“红”与“白”的转变几乎是瞬间发生的。

由于契卡的介入，因言获罪者基本没有生命保障。苏维埃政权认为红色恐怖是为了保住政权而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符合列宁观点的。早在1918年1月列宁就说过，“我们一向就知道，并且反复地说过，社会主义是不能‘制定’的；社会主义是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最紧张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助产婆。”（《列宁选集》第3卷，第389页）

控制舆论的再一种手段是安插可靠的人担任传媒的掌门人。这并不是什么独创。问题在于，片面强调阶级性，否定人之常情的种种政策，本身就排斥了有良知的人。高尔基的情况便是一例。

十月革命后苏俄建立了国家出版社，这是新政权的王牌出版部门，是出版部门的“国家队”。该社的世界文学社也属于“国家队”，其负责人就是高尔基。鲜为人知的是，他虽被称为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在十月革命后却并没有得到信任。如上所述，他1917－1918年在《新生活报》（孟什维克的报纸，高尔基是编者之一）发表过《不合时宜的想法》等文章，对十月革命前后的红色恐怖、普遍的暴力行为等表示非议，提出批评，为此同列宁发生过争论。

1918年8月《新生活报》被关。在此前后，针对俄罗斯相当多地区发生的霍乱、痢疾、饥荒等，高尔基多次致函列宁，主张“博爱、平等”的普世价值，他批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发动和依靠愚昧破坏文明，他说“干革命不能靠坏人，不能不要知识分子”。因为“大多数工人却在产生坏人、混入党内的‘共产党人’，等等!”列宁批评高尔基“得出”的“结论”。说他发出的是“一种不健康的怨言”，让人“听来却像是这样的意思：这个被围困的城市的、困苦和疾病，都是共产主义的过错”。他向高尔基指出这种“不健康”情绪产生的原因，在于高尔基接触的是那些“抓住任何一件小事来发泄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深仇大恨的‘贵族残余分子’”。列宁提请高尔基注意，正是这些人的“情绪有害地影响”着他，同时鉴于高尔基生活在彼得格勒这样的地方，在“几十个”资产阶级分子的“包围”中，列宁劝他离开彼得格勒，克服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列宁选集》第4卷，第58、59、60、61页）

作为世界文学社布尔什维克的总管，高尔基“应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并掌握该部的方针和工作进程”。（第12号文件）但是因他最终也没有接受列宁的观点，解除他的职务理所当然。所幸的

是他没有成为红色恐怖的刀下鬼，仅仅被认为“不适合”留在苏俄，便在1921年离开彼得格勒，后到柏林。在那里与一些同仁办了一个名为《谈话》的刊物，由柏林的时代出版社印行。安全部门调查结果是，这个出版社同情孟什维克，杂志本身的政治倾向也“令人厌恶”，其撰稿人是苏联不共戴天的敌人，白卫分子和孟什维克。他们用杂志收入支持孟什维克党的秘密活动（第73号文件）。在当时的思想意识中，排除了这些人，联共（布）的宣传部门就纯洁了，就能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了。

托洛茨基揭示了高尔基不受欢迎更深层的原因，他认为“高尔基作品里的共产主义性质大为可疑。充斥其中的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小市民的狭隘，公开的故弄玄虚等，”这不利于对无产阶级进行教育（第70号文件）。高尔基的行踪一直在安全部门的监控中，1923年他在布拉格住过一段时间，1924年后就长期侨居意大利索连托。1932年回到苏联，1936逝世。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个谜。

监控国外的反苏出版物也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宣传部的职能，这一工作得到安全部门的有力配合。

《路标更替》（Сменавех）杂志是一例。这是俄侨于192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一本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哲学政论文件集，它与此前一份性质基本相同的《路标》（Вехa）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才取名《路标更替》。这种带有“亲苏”色彩的政治倾向受到时任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注意。此人虽然在1918－1922年间参加了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但与新俄其他领导人相比，他更加强调俄罗斯文化的传承，由于他的提携，《路标更替》一书得以在苏联几次再版。

此外还有一份与《路标更替》同名的杂志。俄共（布）想利用其影响并通过它“争取”侨居国外的俄罗斯精英，起初从经费上支持过杂志的出版，这份杂志发行了近20期，它表露了编者们的努力：设法“自我改造”，深入思考知识分子在新政权条件下的作用，力图重新认识、接受这场“不合时宜的”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制度，希望达到“保存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和国力”。文集和杂志带有些许中立的立场引起俄侨的关注，形成了一

马克西姆·高尔基

个“路标更替派”。俄共（布）开始通过共产国际控制这个刊物，托洛茨基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建议安排共产国际的一个委员会具体从事“国外出版物的”监督，从中摘录涉及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等的资料（第29号文件）。著名的白卫军军官弗朗格尔反对这份杂志的政治倾向，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调和”的立场，并建立了“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的组织。俄共（布）当局感到势难再行利用《路标更替》杂志，便秘密主持在柏林创办了《前夜》杂志以取代之。该刊物一度得到莫斯科资助，因它对苏维埃政策取中立立场，在俄侨和欧洲中影响很大，布尔什维克中央希望它保持“亲苏”倾向（第67号文件）。但是俄共（布）的宣传部门认为其主编克留契科夫“在国家极其危急的时候”未能支持苏维埃的政策，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和社会革命党人、神甫们一起背叛了苏维埃国家（第57号文件）。杂志本身在实际工作中很难维持真正“中立”的基调，经常无意间“偏离”布尔什维克党的意图。主编克留契科夫被召到莫斯科，不得不离开主编位置，另谋职业。刊物本身则因德国的经济状况不佳，俄共（布）经过激烈争论也决定不再资助其出版，最后被迫停刊。

至于苏联如何利用共产国际为其国内外政治服务，可以从托洛茨基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封信中看出。为对付孟什维克和其他国外敌对势力，抵消他们反苏宣传产生的影响，共产国际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委员会，收集国外报刊的情报资料，凡涉及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一切反苏势力的活动等，都在共产国际派驻各国代表的工作范围之内（第29号文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在中国究竟起了什么作用。1920年共产国际发给其赴华代表的指令中第一条就是："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立足于让日本、美国和中国发生利益冲突，即利用各种手段激化他们的矛盾。"（《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台北，1997，第4号文件）而争取和支持甚至资助"亲苏"的及他们称之为"左派"的势力，反对北京政府乃至建立亲苏的政府取代之，以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则为重中之重。

禁止某些外国书刊的进口，也是俄共（布）控制舆论的手段之一。这类书刊中首当其冲的是宗教类图书，如福音书、圣经等，这些东西不得进口。即使在苏俄国内，对这些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也要严格掌握其出版和发行，把印数压缩到最低限度（第62号文件）。

在本单元所述期间，受到严控进口的是"白卫"分子在国外的出版物（如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导报》，米留科夫的《新闻报》，右翼立宪民主党的《舵手》等），其中一些影响面广的刊物在1922年5月列宁患病前都送到了他的手中。由主持契卡工作的捷尔任斯基的帮助，俄共（布）中央通过外交和共产国际系统，对国外反苏势力的出版物了如指掌，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予以抵制或分化（第36号文件）。这些刊物及其创办者不仅了解布尔什维克的"底细"，而且了解俄国国情，无论在苏俄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为维护苏俄的国际形象，政治局决定成立由侦察总局、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苏俄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组成的委员会，以对付在苏俄的外国机构，统管对外宣传，印制材料等（第64号文件）。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最明显的莫过于乔治·奥维尔的《1984》在苏联的命运。西方讲到苏联的新闻审查制度时，总拿1949年斯大林限制乔治·奥维尔的作品在苏联翻译说事。原来在斯大林眼里乔治·奥维尔《动物庄园》乌克兰文版（1947）的序言中已经"犯科"，他写道："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确信，如果我们想使社会主义运动恢复生机，就必须摧毁俄国神话。"1948年乔治·奥维尔在他的新作《1984》中虚构了一个专事歪曲事实的宣传机构"真理部"，把负责战争的机构称为"和平部"，还虚构了一个权势部门的代表、时时监控人们行动的"老大哥"。书中内容太容易使人产生"联想"，所以斯大林不仅将其列为苏联的禁书，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出版其译本。

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报道原则。为了维护布尔什维克的形象，新闻的客观性在党性原则面前黯然失色。俄共（布）关心的是维护党的领导，党性原则压倒了一切，压倒了"民生"。试以关于1921年苏俄大饥荒消息的处理为例。

1921年席卷苏俄的大饥荒导致饿殍遍地，许多地方出现人食人的现象。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163，案卷231，第10页）存藏有1920年（从下文推断可能应该是1921年）12月27日从萨马拉发来的一封密码电报，内称该省发生人吃人的现象："一个女人杀了亲生女儿，吃了她的肉。"对于吃人者的描述是"他们极富攻击性"。显然因类似现象多发，1921年12月29日最高法院请示政治局，是否对吃人者或以吃人为目的而杀人者提起诉讼或判刑。12月30日政治局开会，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加里宁、莫洛托夫等在会议上对此事的看法和处理产生分歧。看看讨论过程，或可深入了解新闻的党性原则和民生在高层决策者们心中孰轻孰重。

托洛茨基的建议："很清楚，饥饿难耐时才吃人，对这种情况不宜判刑，而要像对待极度精神病患者一样采取预防措施。"

斯大林的建议："不反对吃人者有精神因素作祟，不过我认为，如果对这类犯罪（特别是为吃而杀人）不予法律追究，就会导致滥用'精神因素'杀人谋利、报复等案例的多发。所以我建议：被认定吃人者和为吃而杀人者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委托司法人民委员制定相应的法令方案或通

函。”

加里宁主张：“不起诉，不经审判，把他们当病人隔离起来。”这个建议得到加米涅夫、莫洛托夫的支持（第41页）。

1921年的饥荒造成的惨状毕竟是难以遮掩的，1922年1月14日《真理报》的“俄罗斯各地·饥荒地区”栏目中发表了一个署名“Яр-в”者的报道。内称在一向盛产粮食、肉类的萨马拉省的某些县里“普遍发生从未有过的令人发指的人吃人的现象。”1922年1月27日《消息报》第二版也出现类似报道，称一个家住乌法省别列别耶夫县老苏民斯克村的男孩说，“他被杀的兄弟的骨头现在还在自家房顶上腐烂”。（第41页）

时任卫生人民委员的谢马什科就人吃人现象的报道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他首先认为这两家报纸不应当如此详细报道这种可怕的现象，再就是认为有些报道失实，有悖常理，还在这份报告里就两个事实予以“甄别”。

针对报道中提及的那个“农民吃了妻子的肝和肺”，把遗体留了下来，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做出的甄别是：“要知道，谁都明白，死人的肺和肝是最让人恶心的部位，这个饥民吃的应该是妻子的肉。”

至于报道提到那个男孩说“被杀的兄弟的骨头”正在“自家房顶上腐烂”一事，谢马什科甄别说：“骨头是不会腐烂的，这是常识。”

卫生人民委员特别指出敌对势力趁机大肆活动，说“白卫分子的报刊对”苏俄发生的人吃人的可怕现象“津津乐道”。况且我们的报刊根本就不该触动这些敏感题目，“而应该强调劳动人民的团结一致和纪律性。”他建议政治局从党的系统“给各级机关下令：1.更加严格地控制关于饥荒地区容易引起强烈反响的诸事例的报道；2.停止发表任何人吃人的消息”（第31号文件）。

1月30日政治局讨论谢马什科的报告，与会的斯大林、托洛茨基、加里宁等，对他的报告均表示“完全同意”或“赞成”。于是做出决议：1.更加严格地控制关于饥荒地区容易引起强烈反响的诸事例的报道；2.停止发表任何人吃人的消息（第41页）。

不得报道负面消息的规定也适用于身在苏俄的外国记者。美联社驻苏记者古林格因向美国发的多封报道述及苏俄没收民间财产特别是教会财产的情况，而不止一次受到警告，最后被驱逐出苏俄（第34号文件）。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派往一些国家的代表还通过经费支持等帮助外国的亲苏势力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争取国际上的支持。

列宁档案中有一个名为《关于出版政策》的文件，是1922年6月25日托洛茨基写给国家出版社麦谢利亚科夫的，它概括了布尔什维克党对历史的看法，赋予文学的社会职能，以及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决心：

目前文艺作品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几乎每天都有诗集和文学评论类的书籍出版。就其倾向性说，实质上这些出版物中99%都充满了反无产阶级和反苏情绪。当今的文艺作品和文学批评是资产阶级思想对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青年产生影响的最畅通无阻的途径。目前无论在我国还是欧洲都还没有能够培育革命意识的巨著，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学，其创作技巧固然高，却对青年工人产生着影响并毒化着他们。

我们必须不仅在新闻审查的意义上，而且在出版方面更加关注对文学和诗歌作品的批评。需要大量地而且尽快地出版充满我们时代精神的作品。（第42号文件）

然而，“大量”出版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谈何容易。十月革命后许多沙皇时代的优秀作家、诗人、音乐家或遭到镇压或流亡国外，留在苏维埃国度里的文艺人才为数寥寥，他们不可能“大量地”“尽快地”创作出符合布尔什维克时代精神的作品，像高尔基那样的作家也未能和布尔什维克“同心同德”而侨居国外。

俄共（布）选中了布留索夫（1873－1924）、马雅可夫斯基等人。布留索夫被委以重任，从1918年起就负责报刊登记，1919年加入了俄共（布），主管教育、文学艺术，参与编纂第一版的苏联百科全书，后来获得奖章等。但是列宁在世时这样可信的文艺工作者屈指可数，新政权培养新一代无产阶级作家和记者的政策及其实施是本书第二单元“斯大林——今天的列宁（1924－1929）”的内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	资中筠	29.00	7.00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内部发行）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280.00	12.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中、下)	陶菊隐	148.00	18.00
共同的底线	秦　晖	48.00	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78.00	9.00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88.00	12.00
走进怀仁堂(一)(二)	董保存	70.00	11.00
我眼中的改革	[德] 汉斯·莫德罗	45.00	8.00
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李慎明主编	59.00	9.00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	58.00	9.00
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雷　颐	32.00	7.00
观念的水位	刘　瑜	36.00	7.00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42.00	7.00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孙越生	35.00	7.00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金冲及	32.00	7.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黄道炫	48.00	8.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蒋介石初上台湾岛(1949—1953)	李庆　根志优	58.00	9.00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金　雁	68.00	10.00
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左凤荣等	246.00	20.00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	48.00	8.00
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马立诚	39.00	7.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陈布雷与陈伯达——历史转折点上的两个"秀才"	张希贤	56.00	8.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	148.00	18.00
孤舟独树	康国雄口述　何蜀整理	38.00	7.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著	29.5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转折》《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吴思　李晨主编	72.00	12.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11.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	张聿温	32.80	6.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19.00	12.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国家记忆(一)	章东磐	98.00	10.00
国家记忆(二)	章东磐　晏　欢　戈叔亚	88.00	9.00
可操作的民主	寇延丁　袁天鹏	28.00	7.00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	窦应泰	38.00	7.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	48.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著公	46.00	8.00
黄埔恩怨	王晓华　张庆军	38.00	6.00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吴　思	28.00	7.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七册)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216.00	26.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　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	埃德温·J·丁格尔	36.00	7.00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龚小夏	2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1943　一盆红红的火(谢韬日记选编)	谢　韬	49.00	8.00
高岗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黄宗良等	246.00	20.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Ⅰ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Ⅱ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	25.00	7.00
军事学院在南京(1951-1969)	钟德东　张利娜	498.00	30.00

图书介绍

《古拉格：一部历史》： "古拉格"是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同时代表着苏联的镇压体系本身。它有一整套被囚犯称为"绞肉机"的程序：逮捕、审讯、用没有取暖设施的运牛车押解、强制劳动、毁灭家庭、常年流放、过早及无谓的死亡。从1929年到1953年的斯大林时代，古拉格死亡的囚犯达270余万人，这个数据仍然没有反映斯大林时代司法制度的全部受害者的情况……。

这是一部古拉格的历史，是一部苏联集中营的历史。无论承认与否，它也是一部斯大林统治期间的镇压史和清洗史。

《共同的底线》： 本书的宗旨是从"主义"、"文化"和"部门"的分析中，结合我们特定的问题来论证持守底线的意义。

社会应当倡导文化多元、文化宽容和文化间的取长补短，因此每个文化和宗教都应当反对异端审判、异端镇压，这就是作为文化多元共存基础的"共同底线"；在左右和资、社主义之争中，需要有一个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国家"，国家权力产生于社会契约，来自民主授权并对公民负责，权责对应的民主体制才是现代左右派必须坚守的共同底线；对于政府部门和企业营利部门和公益组织之争的问题，基于权力只能用于公益，而私利只能通过自愿交易和以志愿求公益是三个部门共同所需要的前提，也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自治公益三者的共同底线。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由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从战争、政变、暗杀、政争、学潮、工潮，什么事情都发生过；共和制、总统制、联邦制、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样样都试过；17年统治，13位总统，46届内阁，军阀混战，武夫治国，千年帝制难于转型。本书刻画出军阀与政客的群体形象，揭露隐闻秘史，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冷暖，处处是活生生的历史和发人深思的话题。它不是教科书上定义好的历史。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个人出书　家族出书

——订制型小数额出版文集自传、家史家谱

2008年10月，北京家谱传记出版传播机构首倡“三千元五十本起订制型个人出书、家族出书”模式，五年来编辑、出版个人文集自传、家族家史家谱三千余种，使民间订制型小数额出书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时尚!

个人出书，历史见证；家族出书，文化传承！我们呼吁老同志们重视自己的人生总结与家族精神提炼，把我们的求索、磨难、感悟与期盼载诸文字、传诸后世，成为我们人生价值的证明!

家谱传记出版机构
family tree & biography publish agency

服务电话：**010—6252 5116　　6892 0114**

编印单位：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80

展示接待：北京中关村海淀图书城25号“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网　　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人人出版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代理出版：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三千元，3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千元，300页印刷100本6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较(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 “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A类出版作品展示

B类出版作品展示

服务热线：010-57223540　58426176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7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自费出版网）www.51isbn.com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eijing Memo99 Culture & Media Co., Ltd.

听您讲述人生经历
为您撰写回忆录

我们已为千余位主人公撰写了个人回忆录

您的回忆录是这样诞生的

◎历史顾问与您共同制定采访提纲
◎访谈人员和您一起回忆人生故事
◎专业撰稿人将您的经历凝练成文
◎资深编辑三审三校
◎设计师为您量身制作精美图书版面

回忆录咨询热线 400-653-6199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歌华大厦B座11层
传真：010-84186201 邮编：100007
公司官网：http://www.huiyi99.com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2013年第5期

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两类矛盾”理论在中国的实践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硬伤

《讲话》前后的延安戏剧

“林彪信稿”的本来面目

陈水扁这面镜子

ISSN 1003-1170
05>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元